



发电五十年

——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

北京出版社

发电厂里五十年

潘芷汀编写 乔治等插图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1/32·印张：7 6/16·插页：5·字数：151,000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700册（内平装本13,400册）

统一书号：10071·414^{*} 定价：（6）1.30元

目 录

小引.....	1
一、蔣御史奏本参庆王.....	1
二、李太监設計哄慈禧.....	5
三、惊人的营私舞弊.....	8
四、待遇是这样悬殊.....	10
五、工人首次罢工.....	12
六、确定西郊建厂.....	15
七、光着脚巴了兒的姑娘.....	17
八、飞出一里多路的房頂.....	20
九、鍋爐搗泥.....	24
十、駱駝跳舞.....	26
十一、青年工人进厂.....	29
十二、“灤州会馆”演戏.....	38
十三、大革命的余波.....	43
十四、鍋爐房的怒潮.....	47
十五、紈袴子弟胡作非为.....	51
十六、老实工人大显身手.....	56
十七、盧溝桥的抗战炮火.....	61

十八、地下道的工人生活	65
十九、游击队夜襲发电厂	69
二十、八宝菜暗藏字紙条	73
二十一、八路军二次进厂	79
二十二、日本鬼最后投降	84
二十三、来了接收大員	86
二十四、坏了五号汽机	90
二十五、怠工运动	92
二十六、进步歌声	96
二十七、《陞官圖》沒有演出	101
二十八、黑山头燃燒起来	106
二十九、神槍八勇士	109
三十、灯光特別輝煌	112
三十一、粮食堆成山	115
三十二、最初的印象	118
三十三、和职工打成一片	125
三十四、大放光明	128
三十五、放声歌唱	133
三十六、連家屬都举了手	136
三十七、“別落下我！”	139
三十八、修复“半个天”	145
三十九、三件大事为了一个主题	168
四十、工人干部陆荣芝	171
四十一、鍋爐房里捉特务	189
四十二、最好的献礼	195

四十三、一架噴气式.....	205
四十四、人变了机器也得变.....	211
后記.....	230

小 引

你想知道咱們北京从什么年代开始有电灯的吗？

你想知道首都发电厂创办和发展的情况吗？

你想知道电業工人在旧社会惨痛的生活经历，刻苦的生产劳动和英勇的斗争故事吗？

如果愿意的话，请到首都西郊美丽而繁荣的石景山来访问退休的或在职的老工人吧。他们会笑吟吟地接待你，让你坐在他们雅静而舒适的房间里，拈着银灰色的胡须，兴奋地讲给你许许多多生动有趣的故事。只要你不说“好！您累了。回头谈，再见！”他会给你谈上三天三夜也谈不完的。

或者，你感到不方便的话，就请看一看下面他们谈话的记录……

一、蔣御史奏本参庆王

从前，在清朝末年，这话谈起来已经五十多年了，北京没有电灯。人们用的是菜油、煤油灯，或者蜡烛。连皇宫里也是这样。后来，后来就有了电灯了。

开始，电灯也不像现在这么亮，有的跟香火头儿似的，

跟小紅虫兒似的，簡直不像話。以后，慢慢地發展，改進了。甯，不容易呀！

凡事得搜根兒，才明白它的根底緣由，來龍去脈，咱們發電廠還是清朝“慶王爺”的四十八萬兩銀子開辦起來的呢，這個故事石景山的老人們都還記得。

那是前清光緒年間，有一個翰林，名叫蔣世興，這人原籍是京東玉田縣鴉紅橋地方的人。長的样子滿魁梧：高個兒，胖呼呼的，長瓜子臉，留着兩撇黑胡須，鼠瘡脖兒，走起路來有點毛腰。官職做的是北京南城御史。

御史，你知道是個什麼官兒嗎？聽說不管什麼高官大臣，要是貪贓枉法，為非做歹，當御史的就有权向朝廷參奏他一本（至於當御史的稱不稱職，咱就不管他了）。

有一天，蔣世興下朝回府，東交民巷英國人開辦的匯豐銀行老板派人向他告密：說是慶王奕劻在他們銀行里私存白銀一百万兩。這事本來就是犯法的，如果叫皇上知道了那還了得！

蔣世興聽到這個秘密，就暗打主意，想和匯豐老板合謀，吞掉這筆款項。他的官職是“南城”御史，東交民巷正歸他管。可是，誰不曉得慶王爺的官高勢大胳膊根粗呢！蔣世興雖是當朝御史，可也還是畏懼他幾分。

這一天，他回到家里，獨自關在書房里面，悶悶不樂，坐立不寧。“哎呀，這事情，”蔣世興想：“會落到如何下場呢？慶王十之八九不敢承認事實，那麼，我就落個參奏不實和誣告的罪名，必是立刻革掉官職的！反過來，設若慶王承認了事實呢？那百万兩銀子就會被朝廷沒收，也落不到我蔣

世兴名下分文，只是从此开罪了庆王爷，将来的官兒也做不稳当了！……然而——”他的思想在“然而”之后又轉了个弯子：“还是那話，十之八九庆王是不敢認帳的，那么，我的官职虽被革掉，而銀子就落到手……不过……”

他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了。夜深的时候，他的太太——京东宝坻县王啓深的閨女——徑自走进来了。看着蔣世兴毛着腰兒，迈着四方步子踟躕过来踟躕过去地想心事，便坐在一旁，說了几句閑話，就探听他的口气：“您这几天好像有心事似的，可不可以說出来共同……”話沒說完，蔣世兴就从馬蹄袖里伸出手来摆了摆，又輕声囑咐她：“小声說話！”这位太太机警，觉得事关重要，更想追問。蔣也曉得他的太太还聪明能干，有主心骨兒，就把心腹的話講了出来。

完了，太太沉沉靜靜地說：“請問，您居的是什麼官？”蔣世兴一時摸不透太太的意思，眼睛瞪得圓圓的、大大的，順口回答了句：“御史啊——这个，您还不知道嗎，夫人？”

“这就对啦。”

太太說了這話便动身走了。可是走到門口，又回头笑迷迷地添了一句：“老爷，時間不早啦！……”

“哎哎，好好！”蔣世兴一



边答应着跟了出来，一边用心琢磨刚才太太的话語和动作。

当他睡在床上的时候，蔣又犹豫不决了。太太知道他的脾气，也深知他的顧慮，終归是貪爵恋位，便想出一句話問他：“御史老爷，您多大岁数了？”蔣觉得問的奇怪，可是順口回答：“已經五十了！”太太立刻跟了一句：“对呀！您还能居五十年官嗎？既然有这样好的机会，何不捞它一把，以享晚年呢？”

蔣世兴想了想，說：“好的，好的！”

第二天，蔣世兴就自个兒写了折本，坐上轎子到頤和园去了。

这时，慈禧太后正在頤和园游山逛水，召見了蔣御史，接收了他的奏折。

后来，慈禧又派了机密大臣到匯丰銀行去查对，無奈外国人的势力大，不管你什么太后的旨意、大臣的駕临，管事兒的外国人說：“你們中国人不能查我們的賬！”也就被擋駕回来。慈禧問到庆王奕劻的时候，奕劻咬口不敢承認，說：“根本沒有那么回事！”可是过了不久，奕劻又暗地派了心腹跑到銀行去說：“銀子，不要了。”

于是，百万兩銀子落到匯丰老板和蔣世兴的手里。从此，蔣世兴也就落个參奏不实的罪名，被革掉官职。用他分得的四十八万兩（除了对告密的和地面兒上一千人等花些賞錢以外，淨分四十八万兩）做了本錢，开办了“华商电灯公司”。時間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地点在正陽門內順城街路北，就是現在北京供电局的所在地。

二、李太監設計哄慈禧

革命史上講过：自从鴉片战争以后，受了外国資本主义的刺激，中国的資本主义也就开始發展了。是的，那时有些比較开明的人（朝廷的开明官僚在內）就漸漸开起工厂，办起企業来。南皮張之洞不是在汉陽开了兵工厂嗎？关于这方面，还有很多例子。咱光說蔣世兴參奕勳的这件事，不管他为了行使职权，还是为了个人發財致富的私欲，但是开办企業总不算件坏事情。

这是几句題外的話，咱再回到故事本身：蔣世兴有了資本以后，只是觉得人單力薄，便邀了几位友好，協同办理。电灯公司先是由三个总办掌管大权。这三个总办，除蔣本人外，还有史、馮二位。史总办名史康侯，是个进士底子，做过道台。馮总办名馮恕，字公度。能写能画（現在北京还有的买卖或住家戶保存着馮公度的对联、牌匾、或者字画呢）。馮为人談諧善談，人情世故懂得多，是个文混混，虽然沒做过官，憑着写画也頗有点名气。因此蔣世兴便拉他进来，做了电灯公司的总办。

三个总办对于开工厂、裝机器不用說都是外行，他們請了一位在这方面有些閱历，比較內行的人来，担任工程师的职务，負責技术業務领导。这人長的中流身材，四方臉龐，姓陈，名德培，字少安，弟兄們排行第五。曾在武备学堂畢業，后留学德国，也在海軍里服务过，参加过甲午之战。他一來就被总办們賞識了。可是他看到总办們所选的工厂地点狹

小，据说就一甩袖子走了。蒋等托人把他拉回来，说：“您先办着，咱以后慢慢设法。”他这才留下。从德国买来三台发电机：一号、二号都是150瓩，三号是60瓩的小机器。这可以说万事大吉，单等发电了吧？——不行。

电，谁知道是个什么玩艺啊！黎民百姓、买卖作坊，自古以来用的都是油灯、蜡烛，他们对那古老而幽雅的菜油灯盏，对那高贵的、亭亭玉立的蜡千儿，对那幌悠悠、颤抖抖的灯火儿都发生了极其浓厚的感情了。你猛孤丁地对他们说：“不要用那些东西照亮了。现在，你们可以用‘电灯’啦！”行吗？他们接受吗？

不用说商家百姓，连官面上也百般刁难，竭力反对呢。巡警局就不叫立杆拉线，说是妨碍交通，说是“于市面殊不雅观”，说是怕起火灾……。

这一下，倒使蒋世兴们为难了。他们商议对策，认为黎民百姓好办，比较难办的是官面上、皇上家。蒋等辞官不做就变成平民了，任何官府衙役也能辖治你一手，处处给你个小鞋穿的。不过，他们倒想出一个好主意来。俗话说“有钱能买鬼推磨”，拿出些银子来，事情就可能好办了。所以，有一次冯公度摇头晃脑，捋着下巴上那络长胡须说：“……而且，花钱要花到刀刃上啊！”蒋世兴接过去拉着调儿：“这叫做——‘宁塔城门，不堵阳沟’也！”

于是，下面出了一个有关西太后的故事。是真是假，甭去管它，反正有这么个传说。传说的来源，有说是太监传出来的；有说是蒋世兴的乳娘的儿子，后来在电灯公司看门房，他听他妈说了传出来的。传说是这样：

在蔣世兴他們开办華商電燈公司之前，北京沒有發電企業，市民當然還沒有使用電燈的。不過，在西郊慈禧太后常住的頤和園已經有了御用電燈。那是由於外國人費了九牛



二虎之力替慈禧打通思想以後才辦到的事。原來，慈禧也非常反對在“大清天朝”使用那些“外國洋玩藝兒”。據說外國商人花錢運動了慈禧喜歡的太監李蓮英，使了個花招兒才勸轉了西太后。

開頭，慈禧不聽。那太監偷着叫人安裝了紅、白、藍三

盞電燈，太監站在電門前面，請示慈禧太后說：“您想叫什麼顏色的燈兒點着，就說話吧！”

西太后心想：這是鬧什麼名堂？不過，他願意要，就跟他要一耍何妨。西太后順便說：“那，紅的！”

太監趁西太后仰臉矚望的時候，一手藏在屁股後面，撥弄了第一個電鈕，“啪”的一下，紅燈亮了。

西太后覺得奇怪，又說：“藍的！”



“啪”的一下，果然藍的着了。

西太后心里又惊又喜，但还裝得滿鎮靜似的，說：“那么，白的！”

又是“啪”，白灯亮了。西太后不知道是什么妖魔神怪在作祟呢！这时，太监走过来，笑嘻嘻地說了：“这不是别的，只是老佛爷您的造化大呀！”随后向慈禧太后宣傳了一番电灯的好处：什么又方便，又巧妙，又干淨……。

西太后这才答应了在頤和园試用电灯；但在北京一般市民商戶和官邸中暫不提倡。过了不多几年，华商电灯公司开办，遭到阻难，总办們便想起李蓮英来。他們不惜以重金行賄，李蓮英就在西太后面前說了一番好話，西太后才答应下达旨意：对电灯公司的立杆拉纜，不得阻碍。西太后这一关口过去，别的就好办了。

三、惊人的营私舞弊

电灯公司开办了。在組織机构方面，那时中国还缺少办企业的經驗，便仿照旧买卖家的办法：分成內賬房和外賬房。內賬房老板叫張懋堂，字庭甫，当时人們叫他張四爷；外賬房老板（别的买卖家有的叫做外水掌櫃的）叫張宗如；还有个二老板叫梁宏昌。这些人是營業方面的主要負責人。技术工程方面就是那个武备学堂畢業、参加过甲午之战的陈少安和随机器来的德国人負責。

在管理机构方面也仿照旧作坊傳統的習慣，用人非亲即友。除了几个外国人和少数的例外，都是裙帶关系。这样，

就使那种营私舞弊的風气暢行無阻。連个学徒工进来也不容易，不是投亲靠友，就得送礼行賄。在这里多少負点責任的人，就能發財致富。內賬房張懋堂，不到几年就买了好几处宅子。

誰不知道外賬房里的收發李尙友是个大搜包的呀！他們干的工作，职工們称他是“嗓子眼兒上的事情”（进出口的意思）。李去汉口买了一次杆子，到張家口买了一次小米；不用說他自己了，就說他的手下跟随的冯荣深吧，回来就盖了一处混磚到頂的四合院宅子。

耿汉成原在營業站工作。要安灯的就得和他联系。他的大兒子在前門外开华泰电料行。向他联系的電話来了。他回話說：“喂，你买灯泡、电綫、电表……嗎？好，到华泰去买吧！那兒和这里是‘一事’！”就这样，耿氏父子慢慢發了財。

外綫上的小头兒王五，一个手上戴三四个金戒指。人們說：“这家伙可足啦！”他管着几个工人給商店和住戶安杆子拉綫。开始是人們不願意安电灯，后来想安就困难了。因为机器少又小，不能滿足商民需要。所以又搶着安灯了。好容易登上記，交了錢，拉好了綫，裝上电表，可是拖延着不給接火兒——綫头兒从房檐上搭出去了，還沒和杆子上接綫。口說忙不过来，实际是要你給几个錢的意思。

“王头兒呀，怎么还不給接火兒呀？”住戶恳求地問。

“那，還沒下来条子嘍！”王五仰着头走过去。

安灯戶急着想用电灯，便邀头兒吃飯和送几塊現大洋。

“吃飯了沒有？……走吧，到館子里吃一点去！”

在这以后，你再催他的时候，他就会說：“条子才下来，

我叫工人来給接綫吧。”

就这样，王五手上的金戒指慢慢多起来了。

类似上边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市民、工人都看得清楚，可是在那时無法揭發和干涉。便背地咒罵說：“他們啊？長不了！錢来得容易去的快！屬电灯的，‘咄’着了，‘咄’灭了。就这么快当。俗話說‘金手銀胳膊。能掙能哆嗦’。哆嗦哆嗦就都哆嗦出去了！”誰知道这些咒罵竟成了高明的預言了呢！……

四、待遇是这样悬殊

据說，北京比較早的学电的是邓子安、馬子安等几个人。他們曾留学日本，学电气。那时日本已經鬧过維新运动。日本学西洋，中国留日学生就向日本学。但是他們回国以后，学非所用。开始，邓子安在前門大街做买卖，后来邓、馬合办《电世界》杂志。

蔣世兴、史康侯等开办电灯公司的时候，如果邀請邓、馬等来共事，会比陈少安好的多。可是他們看不起邓、馬等人。过了多少年，才經人說合，邓、馬帮着蔣、史开办了电气学校，並沒有請到公司里来加以重用。

可是，总办們非常信任外国人。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德国貨来不了，买英国机器的时候，隨来一个名叫巴宁汉的英国人。他立刻就成了公司的大台柱了。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从外表上看，也的确滿够派头兒的。高个兒，大鼻子，圓圓臉，穿一身黄呢子西裝，高筒

厚底大皮靴，走路“咚咚”的，腰板挺直，說話“嗚哩哇啦”的，有个冲勁。

关于巴宁汉的出身，有的說他是英国駙馬（女皇的姑爺），在英国也是很吃香的工程技術人員。有的說他原来是一个在倫敦市上卖青菜的，多少学得一点安裝机器，就跟随机器来到中国了。

且不管他的身份怎样，倒是很能为他們“祖国”拉攏生意呢。經他的手直接或間接使英国賺中国人的錢，的确不少。在他的西服大襟上“嗒嘮当啷”挂着七、八个、十来个子五光十彩的牌牌兒，据說那是由于替英国做买卖有了功劳，英国国王贈送的獎章，工人們說：“他媽的賺我們的錢沒数啦！”

且不管他的獎章怎样来的吧。可是，总办們对待巴宁汉也的确够慷慨的了。当时工人的工資每月几塊錢，有的只有五元的时候，巴宁汉一个人的月薪是一千四百多元。請算一算，一千四百多元等于多少工人的工資？上过二年小学的就会算这个賬的。不是等于三个五个、十个百个，而是等于二百八十多个！

“二百八十”这个数目說明什么呢？在軍隊上就是兩連多人！要



是二百八十個兵士在前綫作戰，二百八十個工人在工廠里做工，二百八十個農民下地生產……是怎樣大的一個力量啊？

這還不算，還專門給他一所最闊氣的洋樓居住，還給他最漂亮的汽車和高頭大馬。如果他高興騎馬就可以騎馬。汽車司機和養馬的就有三、四個，一兩個廚師，另外幾個男女听差（比方：擦地板、擺飯桌……用的，當時也叫“雜役”），另外，還有頭上纏着白布的印度巡警給他站崗。

你看！一個巴寧漢（英國駙馬或賣菜的）就這麼大譜兒。有人會問，這樣優待是因為他在公司里的作用很大吧？關於這方面，還是留在以後介紹吧，你們听了會更生氣的！

五、工人首次罷工

前面談了一下英國工程師巴寧漢和工人工資的比較，是那樣的懸殊。就是工人与工人之間的待遇，也有很大的差別呢！如果是按手藝好壞、技術高低分出等級，人們也沒話說。不是，大伙手藝都差不多，過去誰學過發電呢？工資待遇的標準是看誰“門子”硬，靠山牢；送禮送的勤不勤，多不多！

在那時，這個工廠的工人，還沒有人來組織領導，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但是，生活逼得他們必須起來鬥爭。1920年，從天津來了六個學習工人。大概由於是“陳五爺”的鄉，一來就按工匠待遇。這一下，激起了鍋爐房工人們的憤怒。他們是受累最大的，生活最苦的人們。他們用大鐵鍬鏟

煤，燒火。飯量大，穿衣費，但是工資掙得最低，除了維持個人最低的生活費用外就不能养活家庭了。怎么办？向管事人講道理，要求漲錢！人少了說話沒力量，聯合人！誰也沒教給他們这样做，他們自發地行動起來了。四十多個鍋爐房的工人，商量了一下，一張白紙鋪在桌面上，中間扣一個碗。寫吧，圍着這個飯碗，轉圓圈的寫上自个兒的名字。不會寫字的請別人代筆画押，按手印……。

一張轉圈的要求增加工資的聯名單子寫出來了。這樣，看不出誰是第一個簽名的，誰是領導者；這辦法多妙啊！工人哥兒們就是聰明、机灵、有辦法！

聯名單子
交給一位辦事
人滕頭兒。

這個姓滕
的名字叫滕煥
亭。中流身材，
胖墩墩的；大
眼睛，紅慘慘
的臉色。他原
在青島當工
人，學徒出身，
有些聰明能
干。德國人侵
占着青島的時
候，他學會了



德語和英語。電燈公司從青島買來德國機器，跟來德國技術人員，滕煥亭也跟了來。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德國人調回國去，公司里請來英國人巴寧漢（當時北洋軍閥規定，開電廠必須用外國人），會英國話的滕煥亭就留下來，他的本事除了會應付外國人，接近總辦們，還能掌握一部分工匠。

那四十多個燒火工人的圓圈形的聯名單子遞給滕煥亭以後，他一看，就找到一個可以擊破的對象。這人姓程，是個工匠，每月工資十二元，比其他工人多幾塊。滕便叫人把姓程的叫來，親切地向他說：“你不要跟他們一塊鬧哄了，嗚？你和他們不一樣……”

姓程的回答說：“咱不想干，咱有事到通縣去了一趟，回來呢，別人就給咱寫上名兒啦。”

這個姓程的工匠回到宿舍，並沒有瞞着大伙兒，把滕煥亭的話和他自己的話都說了出來。得到的反映是：

“嘿！好松包呀！”

“受大累的哥兒們也會出孬種的！”

結果怎麼樣了呢？結果只有這個掙十二元的程工匠被滕拉過去，其餘的抱得更緊，不答應就繼續罷工。這樣，管事人不得不讓步了。叫那四十多人推選代表，磋商條件，適當地提高待遇。

姓程的雖然得到滕煥亭的賞識，但終久受不住冷言諷語，便辭工不干，到別的地方找活隨兒去了。

滕煥亭由於對總辦們表現了忠心耿耿的行為，被提升為處長的職務。

六、確定西郊建廠

華商電燈公司開辦起來之後，先是大買賣家和大宅門里安上了電燈。後來，那些原來怕着火不敢安燈的也漸漸想安了，但是因為發電量少的緣故，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那時，當前半夜高負荷的時候，街燈就跟香火頭兒似的，表現那麼一副可憐相。

不論怎麼說，發電企業是越來越發展了。從1905年電燈公司成立以來，到民國初年就大量招收起股份來，不論多少都可以入股。這叫做“牛毛細股”，職員、工人也可以入股，只要你有錢就行。不過，小股東真是倒霉受氣，三年不分紅，五年也不見回頭錢，全叫大股東和管事人們給吞掉了。聽說當時的大股東有江朝宗（後來做了大漢奸的）、張勳等人。

企業擴大了，又添了幾台發電機，安裝了幾個鍋爐。在負責人方面，除了幾個總辦以外，又把一個叫渠祝華的拉進公司來當司理。這人是一個瘦高個兒。愛走動官府，會聯絡人，善於交際。北京不論換了什麼軍閥，比方：曹錕、段祺瑞啦，張作霖、閻錫山啦……，渠祝華一下就給拉上關係。段祺瑞甚至認了渠做干兒子。渠公館門口有警察給站崗，每天都有汽車來往，趕上他請客，汽車一擺就是一大躍。人們說：“嗬！渠司理的交往真廣啊！”公司里有的是錢，花就花到大衙門口里，對於工人（那時叫做“臭工人”）生活毫不照顧，這也是“寧堵城門，不堵陽溝”。

除了渠司理外，后来还添了一个当过警察总监的大胖子叫朱琛的（后来也当过汉奸），叫他当协理。还有姓朱的（他们称他“朱六爷”）当监理；宝三（满人）当襄理。

看吧！主要负责人就有蒋世兴总办、史康侯总办、馮公度总办、渠祝华司理、朱琛协理、朱×监理、宝三襄理、陈少安工程师、巴宁汉工程师，另外还有内外账房的老板、二老板……还有滕焕亭。这都是些大头头儿，建立个小国家都够了！

有了这些人，公司的势派就更大起来。过去有些官僚机关用电不给钱（前门车站就从未给过钱），据说公司里雇着几个律师专门打官司也不行，自从来了段祺瑞的干儿子渠司理，当过警察总监的朱协理，就什么都不怕了。

电灯公司渐渐发展、扩大。顺城街的地方太小，管事人们商议在别处购买地基，建设工厂。先是看中了外城天壇一带，后来又打算购买卢沟桥迤东那块空场。但是，巴宁汉和馮恕坚持要在西郊石景山区买地建厂。

为什么要在石景山地区呢？这里面有个缘故。馮恕在石景山北面有他的煤窑，叫“公利矿”。这样就凑合着用上他的煤炭了。巴宁汉呢，他是为了石景山接近门头沟的“中英煤矿”。这样，就和他们英国的买卖联系上了。再加上一个理由，那里有永定河流过，机器房用水方便。结果，就选定了石景山。

馮、巴说为了“彼此关照”；职工们说他们是“各有私心”。

听说因为选地基，蒋世兴和馮恕闹了很大的别扭，由于

馮总办在外国人巴宁汉支持下得到胜利，蔣总办好几年不进公司的大門（分了花紅自然有人給送去），最后还是大伙圓場，好說歹說地把他請了来，給他們又撮合到一塊兒了。

七、光着脚巴丫兒的姑娘

电灯公司选定的石景山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你出了北京城往西一瞧，要是个晴和的天气，就会看到在那天边兒上描画着一層層像云一样的东西，那就是一帶山脉。看来好像不大起眼，并不高大巍峨，但是它們却是来自世界屋脊帕米尔呢！它們屬於昆仑山系，陰山山脉，来到河北北部就叫做燕山山脉了。

你再走上二三十里，就会看見那一帶山脉的脚根，有一个黑堆堆，它的顏色比別的山色深，身量矮，远处看来就像被攬在后山的怀抱里，那就是石景山了。

石景山，的确是一座小山。但是風景优美。密叢的树林复盖着它的周身；永定河的激流在它的西面和南面紧紧貼着山根流过，奔向平原。在山上，古老、參天的松柏，掩映着金碧輝煌的庙宇；一座白色的石塔矗立在庙前。在山的东側，修筑了曲折的青石盤路，以供游人登山。在盤路的尽头，接近山巔的地方，有一口古井，从井口到水面，就有三十丈深。你要是到井边探身往下看一看看的話，一定会眼晕腿顛的！

也許因为这口石井的緣故，所說这座山原名就叫做“石井山”；但人們感到它的風景优美，就自动給它改名“石景

山”了。

在它脚下流过的永定河，本来叫做“無定河”，康熙年間才改的名。它在崇山峻嶺中奔流出来，繞过石景山，就是大平原了。因为地勢由高乍低，常常泛濫成灾，帶給人民無限苦难。河道屢次迁移，所以叫做“無定河”。惟其“無定”，才名取“永定”，無非是取个吉利的意思。

这無定河在古时，多年多代是个“国际河流”，在它的流域，常有南朝与北国的战争。南口、居庸关、万里長城等軍事要塞、重要关口，就在它的近旁，現在官厅还有烽火台的遗迹呢。

还傳說当年修北京城的时候，为了防备永定河水淹北京，便把流在石景山以北的河道堵住，讓它繞过南麓，这样河道就不直冲北京城。并在堵塞河道的山嶼处立下碑碣。人們就把那塊兒叫做“碑兒嶼”。关于碑兒嶼，在这一帶还流傳着一段神話故事。这兒，就不講它了。

石景山电厂，就建筑在山北麓、河左側、碑兒嶼的西边。

电厂北面，隔着京門（北京到門头溝）铁路，有一个小小的村庄，那时只有十八戶人家，村名广宁坎。因村西有明朝广宁伯的坟墓。居民为了省口，叫它“西坎上”。馮公度在民国六、七年間开的煤窑“公利矿”，就在这村的东北一帶。

小小的广宁坎，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其实不然。你問問这里的居民吧，他們对这一个村庄，对这一块土地，对这一帶环境，是那樣的热爱！那樣的夸耀！那样怀着深厚而神秘的感情！

你說这是山地吧，但是往东几十步远，就到了一馬平川

的大平原；你說是窮鄉僻壤吧，但是和多朝多代建都的北京城做了近鄰；你說它是大都市的郊区吧，但又的确是群山环抱的世外桃园。……

就在这村的西南边，永定河岸上，栽种着大片果园。每当春暖花开的时候，香气升腾，笼罩了整个山谷；春末花谢了，花瓣儿还随着微风在村路上



迴旋呢。当秋后果子熟的季节，孩子们嬉戏在园子里、河岸边，比拳头还大的蜜桃，皮薄汁甜，风雨过后，桃子坠在被雨水冲洗过的洁净而柔软的河滩上。桃子太重了，竟砸得沙滩一个坑儿坑儿的。孩子们跑来揀起，只要撕开一点点皮儿，就可以吸吮一阵又浓又甜的果汁。

铁路修筑了。火车打村前隆隆飞驰而过，在路旁嬉戏的孩子们，挺胸站立，三五成群地向火车呼喊。唱着他们自编的歌谣：

火车一拉笛儿，

拉到西直门儿。

西直门的姑娘擦着红嘴唇儿。

*

*

*

火車一冒烟兒，
冒到石景山兒。
石景山的姑娘光着脚巴丫兒。

多好听啊！多有意思啊！是唱的石景山和北京城的風俗人情嗎？是說的城鄉之別嗎？……誰還記得下邊的詞兒，再唱給大家听听吧！

这里的老人們，記得那么多古老的故事、傳說、神話，講給人們听。除了关于“碑兒爨”的，还有什么檀柘寺的“天上井、地下河，一边养僧一边养俗……”的傳說；还有什么妙峰山的神話；还有关于宋將楊六郎把守模式口（在广宁坎东北二里）的故事……是些多么迷人的故事啊！

这里的姑娘們，非常喜愛民間流傳的文艺活动：耍太平鼓。每逢旧历年节，一耍就是一个正月。她們对家長說：“不吃不喝可以，反正得粘个漂亮的鼓兒耍耍！”扭着、耍着、敲着，“叮叮咚咚”；听起来好听，看起来好看啊……

这就是石景山区簡略的輪廓。發电厂于1919年（民国八年）在这兒建厂了。1922年，鍋爐房的大烟囱冒起烟来；机器房的“馬达”，發出“隆隆”的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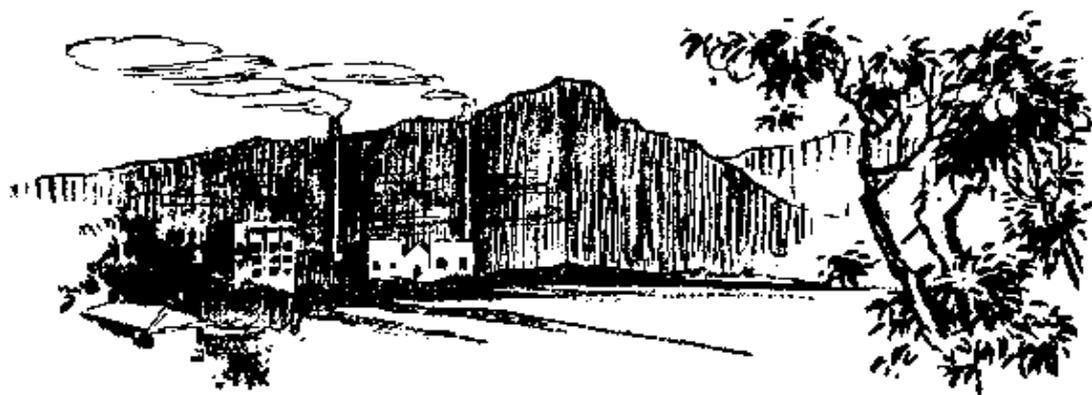
靜謐的石景山喧囂起来。
古老的广宁坎鬧热起来……

八、飞出一里多路的房頂

当华商电灯公司来石景山購買土地的时候，老百姓是有

对抗情緒的。这是一种極自然的情緒。广宁坎十八戶，刘、閻、李、梁都是老戶了，在这里种地多年。有的是自耕农，有的租种地主家的。模式口大地主薛厚田家就在这广宁坎附近有一大塊平川地，为閻、刘等家分种着，这村里的居民除种地外还在河边和山坡上經營果园，兼营运输副業。那时养着二、三十匹駱駝、二、三十匹騾子，十几头毛驢。他們利用春、冬兩閑的时候，到門头溝馱煤向北京运送。不仅他們这个村子是这样，方圆几十里以內的村鎮，差不多都以馱煤为主要副業。石景山东边二里地的北平安鎮曾經养着兩千多匹駱駝。它們在北京通往門头溝的漫長的山路上，浩浩蕩蕩地摆起了一字長蛇陣，伴随着从塞外吹来的凄厉的西北風，响着叮叮当当节奏匀称、声音悠揚的駱鈴和赶牲人嘹亮高亢的山歌……

前些年，京兆地区有一句諺語“东来一条繩兒，西来一条繩兒”，就是說东边一条繩給北京运来吃的米粮。經河道——杭州到天津的南运河，再由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运来南方的大米，拉繩的船夫摆成長長的行列，叫做东来的一条繩。西边一条繩給北京运来燒的煤炭。經山路从門头溝等煤矿馱来煤炭，駱駝繩兒联在一起，扯成長長的一大串，叫



做西来的一条繩。

后来北京的铁路四通八达，那两条繩才慢慢失去作用；那句諺語也就漸漸被人們忘記了。

話归正題，石景山、广宁坎的老百姓多年多代的生活方式就是种田和赶駱駝馱炭，他們不卖土地給电灯公司怎么办？那位以写字出名的馮公度——即公司总办之一，他没有去碰模式口的地主薛厚田，就找些中間人对农民进行了欺压和謊騙。他不說是盖工厂，而說是买了土地將用一小部分做塋地。还归这里农民租种。

“你們租薛家的地多少錢一亩？”問农民。

“一兩銀子，”农民答。

“那，把你們的土地卖給我們，还叫你們租着，你們只拿一塊錢的租价，可以嗎？”

官面上势力大，不卖也得卖，农民們只得用四十塊錢一亩（在当时是相当低的价格），南北騎着京門铁路，共卖给公司一百多亩。誰知道只种了一年以后，“得啦，你們这地別种啦！我們盖房修电灯公司。”

就这样，土地被招过去。1919年，便在这塊土地上开始修建楼房、安裝机器。京門铁路南边修的是机器房和鍋爐房兩座紧靠的大楼；铁路北边修的是修造厂。在石景山根根上，不大見陽光的地方盖了十几間平房，那是工人集体宿舍，那时候叫做“下房兒”；在广宁坎村里也修盖了十几間宿舍，那是为了帶家眷的小头兒們預备的。大头兒們都住在北京城里。

慢慢的，电灯公司算在石景山安家立業了。

如果你問起當地的老頭和發電廠的老工人，公司建廠的時候，什麼事情留給人們的印象最深？他們除了談總辦們如何買地、路元泰和元興木廠大包括活……之外，就會異口同聲地告訴你：“嗚，那年春天刮大風，刮得才邪火呢！”

是1921年3月里，一個下午，三點多鐘光景“呼——呼——”來啦！頓時天昏地暗，飛砂走石，對面不見人了。你听吧，“咣、咣”蓋房搭架子的杉槁一根根折斷。鍋爐房剛壘起四堵牆，還沒搭頂子，“轟”的一下坍倒了三面，只有依靠着機器房的那一面截住了。在別的屋里做活的人們，以為才立好的大煙囪倒了呢。那大煙囪十六、七丈高，五個人扯圓抱不過來，它要是倒了還了得。它只是幌悠幌悠，幌出老遠，可幸亏沒倒。修造廠十幾間大的大房頂是用厚鉛鐵板釘在一起的，一下子叫風掀起來，刮飛了。像放風箏似的飛出一里多路。這場大風，是多年來沒遇見過的，但是不長的時間就停住，到吃晚上飯的時候，連個風絲兒都沒有了。

電廠的建築者們傳出一個怪誕的故事。說是在刮風之前，一個六十多歲小鬚兒的老頭，背着錢袋子，到包工的路元泰木廠賬房里，要求給他點活渣兒干，被賬房先生斥走。那老頭兒不出大門，卻徑自鑽到火房里和鍋爐房里……

“跟着他！看他干什么？這個討厭的家伙！”賬房先生在後面追蹤，可是，一下子不見了。

於是，大風刮起來，怎麼也沒找到那小老頭兒。傳說是濟公下界。因為當時工人們多是農村來的，這個怪誕的謠言也就容易找到市場，而且還一直流傳下來。

九、鍋爐搥泥

狂暴的大風刮过去了。那位六十多岁、背着錢搭，行踪飄忽的小姓老头兒——“济公活佛”，不再發怒了，不再搗蛋了。石景山發电厂便在廉价而众多的劳动力的努力下兴建起来。

过程是这样：自从1919年8月开始兴建，第二年8月，铁路北的修造厂首先完成。到1921年的8月，低压第一、二、三号鍋爐安裝竣工。9月，机爐房也盖成了。10月初，二号發电机（2000瓩）安裝起来。确定10月10日正式向北京城里送电。这中間，也曾發生小小的阻碍，那是这么回事：从石景山向城里拉电綫埋杆子，要占用农民的一些土地。华商电灯公司到宛平县（这里过去屬宛平县管轄）衙門里办了执照，埋一棵杆子給土地屬主五元。不过官面上的事兒总有私弊，你吃我，我吃你的，就不一定給老百姓了。有的农民，当着在他的田地里刨坑兒栽杆子的时候，跑去，跳进坑里，气得小鬍子哆嗦着說：“我指着地吃飯呢！糟蹋地，我不能活了，要埋就埋我吧！”后来，巴宁汉从东交民巷英国大使館里搬来一队“馬队”跟着，才能繼續进行工作。

不知道为什么，10月10日沒有如期送电；改到陽历年，又沒成功，改到旧历年。結果，就在1922年2月开始發电了。最初一个阶段，還沒問題，五、六月間，沒下大雨，問題也不大。到七月中旬，就出了岔子。

那是个“前夜”，汽缸对口处忽然冒出一些水和泥来；盤

根也冒泥。机器上边就“噉噉”地冒汽，声音大的很。这是怎么回事呢？

晚上10点多鐘，滕煥亭已經睡下，鍋爐房的头兒大陈六（陈五爷的本家）从水箱里舀了一盆像芝麻醬似的泥水，端着去找滕煥亭。

“你看！不行啊！这怎么干？一碗水沉淀了多半碗泥，停机吧！”

滕煥亭这才迷里迷糊地爬起来，到机器房里去。机器停下来。你猜怎么着？落下汽篋子一看，十寸高的篋子只剩下二寸了，其余都叫泥糊住。汽机打开盖子，后边也全被黄泥糊住。只得全停，弄吧！工人们都来刮泥、擦泥。不論水管、汽管、汽包、干汽管……都填滿了泥。好在干汽管的泥还不太稠。拿压水泵向外压，像压餡餡面似的压出些泥条条兒来……

这样，停机鼓捣了二三十天。

这时，巴宁汉、滕煥亭們才知道燒鍋爐用混水不行！原来永定河里的水是混的！他們事前根本没有調查研究，沒有搜集足够的資料。永定河水一到冷天就清了。到夏天，落上几場大雨，便从兩旁的山嶺上冲些泥沙下来，既混又濁。这些常識，巴宁汉和他的助手滕煥亭好像不怎么懂得似的，这怎么不“搗泥”呢？！

怎么办？河水短時間不能用了，难道坐待冬天的到来，等候河水的自然澄清？当然不能！那还叫什么發电厂？！但是他們又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便乱折騰起来。滕煥亭看見石景山下有一窟水，是前兩天下雨积存的。他們却認為这是“老

天爷”賜給的，于是，巴、滕二人叫工人们抬管子的抬管子，拉电线的拉电线，安泵的安泵。可是，到安顿好了之后，“老天”又把那一窟窿水收回去了。别看巴宁汉和滕焕亭是总办们的红人，但是老天并不怜悯他们。

后来又說車站那边有一片水，还滿清亮的。于是又把水泵、电线、管子挪过去。誰知道刚刚挪好，那片水又悄悄兒地飞走了。本来嘛，它们（水）并没想到为了电灯公司的用途，为了营救巴、滕这些骑在工人脖子上作威作福的家伙們而来到世界上的；

在这無法可想的时候，只得从北京的公司里拉些水箱来，等下雨时接收房頂上流下来的雨水，接济一下；一方面在石景山西北角兒上、永定河边挖水池子。虽然还不太能解决问题，可是能够少發点电了。这样鬧鬧就鬧到九、十月間。气候漸漸冷了下来；落雨少了，河水清了一些。这样，湊合到第二年，在南泵房附近，挖了几个池子，才算解决了用水的問題。

十、駱駝跳舞

大乱子，像“搗泥”那种事；大笑話，像用水泵压“餡餡”那种事，虽然不經常出；可是另外的小乱子、小笑話天天不断呢。因为那时技术管理極其混乱；安全設備更是談不到；事故不断的有，那是当然的了。記得那时候，汽机經常燒軸瓦、掉油叶；鍋爐經常拔管子。至于“滿水”、“亏水”、發电机的燒毀，厂用电的开关爆炸……都不算稀罕。因而巴宁汉規定

了一条紀律：不論本厂职工以及外来參觀的人，一律禁止照像。

一次，兩個工人到鍋爐房里去看，正在赶火（長負荷）的时候，管子一下拔出来，水冲到燒紅的爐条上。“噗”的一下，連汽帶水、帶煤，撲了滿屋；鬧的屋里半个鐘头看不見人。他倆弄得滿身、滿臉的水、土，血肉模糊，养伤养了好久。

事故層出不窮，人們干着就胆怯；电死过几个人，人們更惶惶不安了。有个叫王振龙的工人，一上汽机大楼，腿就打哆嗦，簡直像上杀場一样。他最怕汽机解列，每次到解列的时候，他未曾拉閘先紧紧地閉上眼睛。“噠！”的一下，响完了才敢睜眼。

原来是广宁坎的农民、后来到电厂当短工的閻义順常說：“不管別的，反正心放在这里（指胸口窩正当中）电就碰不着我！”后来，閻义順也曾叫电打着过几次。一次，打了一个筋斗。当他向別人述說那种“麻苏苏”的感觉的时候，別人就反問他：“你不是說你心眼好，电不会碰着你嗎？”

“嗨，你淨說这！咱要不把心放在这兒（指一指胸口窩兒）——正当中，这一下，就該踹腿啦！”

确实，有閻义順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像王振龙上楼腿打哆嗦的也不是个別的。他們为什么会这样？是怪这些工人們胆小怕事嗎？怪他們無知嗎？当然不是！资本家們不关心工人生活，一点也不重視安全設備，拿着电死个把工人不当回事。他們有几个臭錢。“你不干，还有別人干呢！”

电灯公司的协理朱琛說过这样的話：“別看三条腿的蛤蟆

找不到，兩条腿的人可有的是。竹竿上插窩頭，到前門天橋一幌，要多少有多少！”朱琛還極力主張不給工人增加工資，他拿工人和他當警察總監時的警察相比。他說：“工人工資還太高了呢！警察才三塊錢一個月。”

工人們聽到這話，憤恨地說：“這老小子的餓主意，可把工人哥兒們害苦啦！”

另外一個使得工人哥兒們心中無底、精神不安、惶惶不可終日的原因，就是全廠上下真正懂得技術的人太少太少了；工程師陳少安老頭子雖然參加過甲午之戰，但發電技術方面並不高明，他連順城街總公司的幾個小發電機還照顧不過來呢，更無暇顧及石景山了。巴寧漢也是個“二把刀”，他偶爾到石景山轉個彎兒，管不了什麼事。滕煥亭雖然在下面住的時間較多，這個“半瓶醋”也是解決不了大問題。且陳、滕之間常鬧內訌，互相排擠，就顧不了鑽研和改進技術了。再看看從城里撥來的一些到機器房、鍋爐房負責領導具體工作的工頭兒們吧：鍋爐房的頭兒是陳少安的本家大陳六，以前根本沒燒過鍋爐，只是在外邊當廚師的時候燒過灶火，二頭兒吳長有蒸包子出身；機器房的頭兒也是外行。叫他們來搗鼓電，而且掌握重要技術部門，怎麼會不經常出漏子呢？本來，發電是這樣的一個現代化的企業：技術非常複雜，危險性也大。汽輪機一分鐘三千轉，掌握不好，機器能飛走。鍋爐燒的蒸汽，在管子里便老老實實地工作，要是出了事故，從管子里爆出來，一磅蒸汽（一磅水燒成的汽）等於一磅1500倍的炸藥……工人們一滴汗一滴血地把這樣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建設起來了；北京用電方便了；資本家賺了大錢。但

是对工人们的生产安全极不重视。把一些靠“门子”“窗子”钻进来的外行家伙，加以重用。他们只会喳喳呼呼，欺压工人，他们还懂得什么呢！

这里谈一个奇迹：那时候，机器房门口是条大路，经常有驮煤的骆驼，驮粮食的毛驴走过。赶上下雨天，骆驼走到那儿就乱蹦跳，连驮的煤都蹦下来。毛驴走到那儿就撒欢儿，像中了疯魔似的。赶牲口的还过去打撵。一打，自己也跳起来了。“哪，这是怎么啦？中了邪啦？”

两个工人抬着管子，走到机器房门口就迈不动步了。前头的骂后头的，后头的骂前头的：“你小子别捣蛋行不？”“你小子才捣呢！还怨别人！”

过了许多年月，人们才懂得关于“跨步电压”^①的问题。以前，许多必要的安全设备都没有，更谈不到合乎规格。

十一、青年工人进厂

石景山建厂以后，从城内华商电灯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搬来一部分职工；另外又招了一批新工人。开始的几年，全厂总共不过百十来号人。因为营业由公司负责，石景山方面

① 那时电缆接地设备不好，甚至没有接地设备。因而高压电附近常有漏电、跑电(即没有把这些漏电导入地下)。如果在下雨天，高压电附近淋湿了的墙面和地面上都会带电。一个人行走或扛管子经过，虽然也中电，但电量尚小。如果二人抬一铁管，或身体长的牲畜(如骆驼等)走过那里，接触地面的两点距离愈远，中电量就愈大，这叫做跨步电压。这是个复杂的技术理论问题，这里只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仅仅负责发电一门。所以除了工人之外，只有几个职员：建厂后第一个厂主任名叫曾昭权。据说是曾国藩的孙子。在大学里学工，但不是学电的。年纪很轻，人们背后称他“小曾”。他不大懂“人情世故”，和巴宁汉之流搞的不对头，所以没有待多久就离开这里。另外，在技术管理方面，除了滕焕亭半个人（他有时在公司管事）以外，还有一个只金成，他是兼管锅炉房和机器房的工头儿。这个工头儿放“印子钱”，借五还六，对工人进行极残酷的剥削。

在事务管理方面，也有个头儿，叫常海；他死了以后，继位的叫支祥，因为个子大，人们称他为“大支祥”。主要的职员就是这么寥寥数人。

不过，就这寥寥数人，却掌握了大部分工人的命运！那时长工不多，多的是短工。常海或大支祥不给你牌子，你就上不了工；只金成看你不顺眼，只要挑你个错儿就可以散（开除）你。没办法，有些没“门子”“窗户”的小工，不得不买些礼物，装个蒲包，送给他们。据说，头一天送了蒲包，第二天上工就痛快了。

“常大爷，我来上班啦，给个牌子！”

“行！”很干脆。

看吧，在那个重私情不重技术，看蒲包不看本领的时代，怎么能不把工厂搞个乱七八糟！？

这么说，工厂为什么没有关门反而慢慢扩大和发展了呢？那是因为工厂还有大批的工人们做了它的支柱和基石了。

有些工匠，他们在厂子里不声不响（不像那些大、小头

兒們总是喳喳唬唬，却没有实际本事），倒是真正老老实实地埋头苦干。他們曾經在别的工厂学过一般的錘、旋、焊、煨工……来到这里，起了很大作用。虽然没有專門学过發電，可是来到以后慢慢摸索，跟着安裝机器；坏了的地方，他們来修理；缺什么零件，他們来添配。他們是脚踏实地按部就班的用錘子、用搬子、用兩手、用力气、用腦筋来干活的！他們在别的工厂学徒的时候，吃过很大的苦头：曾經每天做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吃不飽、穿不暖，睡在拥挤的地板上或吊鋪上；給师傅立下“……如有寻死覓活、失足落水，概与师傅無关……”的字据，苦学四、五年的時間才熬出来的。这些人实际上做了生产上的主力軍，电厂的支柱。

不过，这些技工們也有自己的特点：在極其封建落后的私营工厂里学徒，把他們折磨的像長期受着干旱的庄稼，有些蔫萎了。再說，他們的工資多于小工和短工們，生活可以維持得过去，虽然也感到社会不合理，但看不到前途。

如果对总的生产來說，对于學習新鮮事物來說，对于工人弟兄們的集体利益來說，更大的希望必須寄托在更年輕的小伙子們身上。他們是后起之秀，他們是新鮮的血液、是新生力量。他們是自觉与不自觉地看到和尝受到老一輩的艰辛、苦难，接受了深刻的經驗教訓，学得机警了的青年們。这些人，对社会現狀更为不滿；在他們內心中間，慢慢成長和鍛煉着坚强的斗争意志。看他們的生活、生产、成長吧。

京东数百里的一个农村里，有个中年女人，死了丈夫。她便帶了她的不滿周岁的男孩子离乡背井地出来謀求生活，

因为家里房無一間、地無一壠。这娘兒倆曾經以討飯糊口，后来母亲給人家当了女傭人。冷酷的岁月熬煎着他們母子，孩子長到十四岁了。母亲到一位当會計的家里做帮工。孩子也不願吃閑飯，會計先生介紹他到順城街华商电灯公司里当杂役。这个少年長得中流身材，黃圓臉龐兒，一对聰明里透着老誠、老誠里透着聰明的俊气的眼睛，剃着圓光光的葫蘆头。穿戴不好但是干干淨淨，外面看来不言不語，可是和他的少年朋友們一起，就显得出他的热情、活潑和机灵来了。从小跟着母亲离家弃乡地过着流浪生活，閱历了不少的社会人情。他年紀虽小，生活知識却很丰富。在这个少年的面部常常表露出好像看透了任何人和事般的神气。——他起了大名，叫王文炳。

內賬房張懋堂这时在公司里正是吃得开的时候，日子过得蒸蒸日上，盖了几所闊綽的大宅院，娶了几房漂亮的小老婆。家里需要用些男工，女僕。因而把小王文炳撥到他的私宅里做杂役。

在張懋堂的公館里干了一年多，不用說，这个青年起了显著的生理上的变化（是一种合乎自然規律的变化），長高了身个；岁数也从十五岁長到十六岁多，按当时帶虛岁的說法，算是十八岁了。張懋堂需要他的聰明和力气，却不欢迎他增長年齡。張懋堂暗想：“十八岁，大小伙子啦。在內宅里干活兒有些不便……。”

其实，这种想法对这个青年來說是多余的，是誣蔑的。滿可以使張四爷放心。他不会喜欢內宅的主人們的。

王文炳既是过着多少年颠沛流离的生活，閱历了許多人

情世故，他心里就有个界限，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

“我为什么做这些事呢？”早晨，天空还闪着星星，王文炳就起身来。还有些睡意地拿着扫帚，“飒飒”地扫着院子。他看见张四爷和小老婆的卧室垂着窗帘，院里静悄悄的。这个青年心里活动着各种各样、奇奇怪怪、自己也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为了要活在世界上？……为了活动活动筋脉好长得结实？……张四爷为什么还不起床？窗帘为什么堵得那么严实？为了怕外边清早的新鲜空气吹进去？……为什么这么好的清晨的空气只有我们这些干力气活儿的才能享受得到？那些“爷”们却喜欢暗室和被筒里的臭气？……”

大概也是因为他爱想这么多吧？这一天张四爷把他叫到跟前，说：“哎，我说呀，你到京西学手艺去吧。公司在石景山成立个分厂，用人。你高兴去吗？你妈挺愿意。”

王文炳一听，心里立刻想回答“我也很愿意”；但是只说了一个字儿：“好。”

就这样，王文炳收拾了一下，带上比枕头大不多少的小铺盖卷儿；还有一个青年伙伴，是张四爷过去在一起做过生意的同事朋友的侄儿，叫李宝庆的。他俩搭伴。一路上欢天喜地的来到了石景山。这是1921年四月间，在那次刮大风以后的一个月的事情。

他们到厂以后，把张懋堂的名片儿和介绍信交给管事人。嗨，管事人一看是张四爷介绍来的，还不好好照应吗？那时工人们说：“张四爷在公司里顶打要啦，公司像他们家的一样！”

管事人也不管这两位青年人到底和张四爷的亲友关系是

否亲密，就說：“好吧，先找个住宿的地方，歇歇脚兒……”于是，他倆免于睡在澡塘、茶爐……而是住在集体宿舍里了。第二天，就在工人名單上登記，上班干活了。当然，由于管事人进一步地了解，这两位青年虽然沾点四爷的边兒，但不是什么至亲近友，照顧上也就冷淡下来。工价碼兒和別的小工一律看待，每天二角。这样一直下去了多少年月。

在那个时候，工人在工厂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和那些总办、經理們“爷”字輩兒的对称，工人們是“小”字輩兒的。不仅如此，上边还得加个“臭”字的帽子，下边添个“子”字的尾巴——叫做“臭小工子”。

除了少数的头兒們的至亲近友或者極个别的以外，大部分工人一进工厂就“臭”了。如果没有翻天覆地的大变動，那就要一直“臭”到老死的。好像把一堆磚瓦石块扔进粪坑似的，就那么“臭”了起来。

其实，他們都是有用之材，甚至里面还有不少的可雕琢的宝石、玉器！

再打一个比喻的話，那些小小年紀的工人們，好像在严寒的冬天，埋进沙地里的一些树栽子、柳竿兒，虽然还秃秃光光的沒有冒出枝叶，还干巴巴死塌塌的沒發出青綠顏色来。可是，它們本身却蘊藏着旺盛的生命力，也会尽力地吸取可以滋养它們的水分、肥料……將來長成栋梁之材、或参天大树呢！

可是，工人进厂一年二年的甯想跟师傅学点什么！因为，那时电厂認真鑽研技术的不多，即便有一点本事，在当时也不輕易掏給別人。“把貨卖光了，还吃誰去呢？”这是在那个社

会制度下面产生的一种相当普遍的想法。

王文炳进了厂子，正赶上安装二号机，他便跟着干些零七八碎的杂活兒。什么抬抬管子呀，紧紧螺絲呀，刮擦刮擦油泥呀，扫扫地抹抹桌凳、給师傅沏壶茶、拿拿老虎钳子呀……就干这些。过了几年自己摸索着干点，套个螺絲呀什么的。这时，他已經二十多岁了。

二十多岁，在人生中是多么宝贵的时代，多么重要的年龄啊！由青年向成年过渡，向壯年成長。每一个人在經過这段年龄时怎样想呢？怎样看待它呢？

由于资本家的压迫和剝削，生活真是像泥河一样地流。在上班做工之外，經常加班加点；累得筋疲力竭。下了班，大多数工人沒有家室，有的就鑽进酒館里，或者泡在賭場上了。他們感到生活的苦悶，但看不到出路，对资本家的仇恨也不明确；甚至有的还以为飯碗子是资本家賜予的。但也有些青年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他們对生活前途有某种說不清楚的向往；有着改变现实生活的欲求，只不过还十分模糊罢了。这部分人总是慎重地处理生活，不放松一时一刻地吸取知識、練習本領、积蓄力量，期待着工人哥兒們出头的一天。

王文炳和几个接近他的青年从不要錢，更不嫖妓。虽然他們沒有能力反对別人这样做。王文炳的精力和聪明用到学习手艺上。不論他在哪位工匠手下干活兒，不論工匠是如何隱隱藏藏、遮遮掩掩，也会叫这位聪明、爱鑽研的小工学到他的本事的。

調来調去。干了几年，就把王文炳調到汽机修理部門，跟一位叫郭玉奎的师傅干活。郭师傅干活有个特点，他經常

是动动嘴兒，站在一边叨着烟卷看着，工作却由王文炳一个人干。这样，郭师傅等于休息，王文炳則鍛煉出本領。有些工作上的新方法、新創造，是王文炳用心琢磨出来的，也写在郭师傅的功劳簿上，王文炳并不計較，郭师傅确实滿意。

所以，在一次什么獎勵中，郭师傅得到几十塊現大洋獎金，他在滿意之余，把一塊現洋裝进王文炳的衣袋里，王除了謝絕、退还之外，当然心里也产生一些感慨。



有一次，为了庆祝三号机安裝竣工，公司請客，滕煥亭处长代表資方做主东，請的是工头和个别工匠們。他們圍着摆滿了雞、鴨、魚、肉的飯桌，喝酒划拳，大吃大喝，好不熱鬧。讓一些小工們端酒上菜、打手巾把兒，站在一旁伺候。

此情此景，实在叫人不平。青年們內心里懂得，公司里賺錢是工人們的力气換来的；安裝机器时工人們流的汗不知多少。头兒們揮霍的实际是工人們的血汗。“媽的，这太不公平！”王文炳等几位青年乘那些在宴会上的人們酒兴正濃的时候，便想

出一个为头兒們助兴的节目：他們在靠近請客的屋里，敞开电閘，把兩条电綫往起一搭，“蓬！”的一下子，發出一声巨响，如鳴炮一般。

“怎么啦？怎么啦？”

“这是哪里的事？”

宴会的人們惊惶失措，騷乱了一陣。但是調查起来，又沒有蛛絲馬迹可寻。

公司里除了請客之風，还有送禮之習。上自总办下至小把头，都有受禮之权。禮品样式很多：酒肉点心、烟茶都可以，还有送錢的。

大头子只金成年年做寿。匠目、工匠們差不多都跟随送份禮錢，前往拜寿。王文炳一撥青年工人們沒有去过一回。有的人半开玩笑地問王文炳說：“你怎么不去呀？”

王倒不客气，回答說：“叫我去也行。我拿不起現洋，拿一卷燒紙（祭死人的紙錢）去可以嗎？”

有些匠目和工匠每月三几十大洋，每年又分花紅一百多。有的給只金成拍馬，拜寿送禮，洋錢往桌上一摆就是一戳。

“我掙五年也掙不到那么一戳兒，”王文炳說，“拜寿？去他娘的吧！”



那时候，王文炳和李宝庆、張永廉、佟惠清、王志邦……一些青年們要好，他們一塊兒住、一塊兒玩，一塊兒聊天、一塊兒干活……他們都不會送禮，不會把結上司。也許就是這些原因吧，他們入廠后好多年補不上長工，增不了工資。但他們不去注意這些，對待這些問題，抱着“去他娘的吧”的態度。

十二、“灤州會館”演戲

自從清末民初以來，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和軍事侵略，封建軍閥的連年混戰，地主、富農的高價地租和高利貸的重重盤剝，廣大的中國農村日趨貧困和破產了。譬如華北的一些省分，就有大批的農民攜家帶口的跑關東、出口外；許多青年子弟托親靠友，投奔城市的工廠或商店，學手藝、做買賣。人口慢慢向城市集中，農村呈現出蕭條氣象。

就發電廠來說，除了在当地廣寧坎、麻峪、模式口、北辛安一帶招了些工人之外，還有來自京東、京北、天津等地的人；保定附近安平等縣的人；河間附近交河等縣的人；還有遠道來的山東人。他們從四面八方，來到古都近郊石景山下、永定河邊，他們的口音不同、習慣各異，但是他們就生活和工作在一起了。這些人已經不是在田野里趕着耕牛犁地的農民，也不是挑着担兒串鄉的販賣者，而是產業工人了。

“工人”，請細細地琢磨琢磨這兩個字的意義吧！好像不太難懂。工人就是做工的人，用兩手、用智慧進行勞動、創造財富、為人類謀求幸福的人。可是，在舊社會，他們創造

的財富到哪里去了？謀求的幸福誰享受了呢？

电灯公司的大股東們，坐在家里，他們的銀元像母猪或家兔一样会生崽仔；总办、經理們的洋樓盖起来、腰包鼓脹了；外国工程师（其实是笨蛋）拿着280个工人的工資；机器房大头子只金成又置宅子又买地，还放“印子錢”，借五还六……

而那些披荆斬棘、流血揮汗、用劳动和智慧創造財富的人們哪，你看，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先不說，許多工人进厂连个住处都沒有。城內总公司的工人，有些睡在城牆根底，他們自称住的是“順城旅館”。石景山方面，有些住在爐灰道洞、茶爐房里。夏天好說，什么屋檐下、溝口边、走廊上、楼梯旁都还可以，無非叫蚊子跳蚤多咬几口罢了。一到冬天就难办了。茶爐間都四面透風，他們哪来的那么多鋪盖！冻的沒法，有些人挤到低压爐房里去，靠着鍋爐在地下鋪个草垫子，棉被上再找个破麻袋片兒压压脚，这样便凑合过去了。他們还自慰地說：“低压爐簡直像热炕头兒一样！”靠石景山根，只盖了一所低矮的潮湿的陰冷的集体宿舍（普通称为“下房兒”），早来几年的工人，可能优先“享受”到下房兒的待遇。那里每大間里住着七八个或十几个工人。睡在一个大通鋪上，每人只有一塊磚寬的地方。夜里要是起来解手，回去再睡下就很費勁了。冬天里也沒有爐火。据說，本来每个大宿舍里有一个爐子，因为工人們上班做工，沒人經管，常常熄灭了；再說，厂方不發烟筒，有一夜，整个屋里的人都中了煤气，差点都被熏死。他們便宁肯挨冻再也不生火了。你想吧，屋大、透風、不生爐火、被褥單薄，

真是“好难熬的冬三月啊！”

吃饭怎么办呢？北厂里（在铁路北，外国人和高级职员
的住处）有食堂。你打那附近走过的时候，会听到炒勺叮哐
山响，香气扑鼻，但是，工人即便有钱也不能问津的，那是
头儿们的食堂啊！

工人吃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工资较多的工匠，每月拿
十几或二十几元，他们嫌自己做饭太麻烦，就在街上吃饭铺
子。石景山自从建了电厂以来，渐渐繁华了。仅是广宁坊街
上，就有‘著名’的复隆居、东海居、天德和……几家饭铺；另
外还有酒馆、杂货店等。这些店铺的老板，是在公司的大股
东、总办、经理、外国人、大把头们把工人弟兄们的劳动价
值差不多剥削尽了之余，再榨一层油水。一般的工人，在这
里住上几年，就甭想再挪个地方去找工作了，除非被开除。
因为谁都会欠下些账的，小铺子的债务就把他们拴住了。

另一种方式，一般的小工、短工吃不起饭铺，便自己起
伙做饭。因此，工人哥们除了修机器、拉电线之外还学
会了蒸窝头的技术。当然技术高低不同，山东来的沈贤明，
刚来时才十四、五岁，做饭胡鼓捣，有一回把刚买的一包碱
面儿全搁上，蒸出来的窝头像石头蛋子那么硬。他说：“打狗
也能打的死！”这个小孩就天天啃硬窝头，嚼咸萝卜条儿。

自己做饭吃，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可难哩！中午统共个把
钟头，下了班不休息就忙做饭，有时窝头蒸不熟就到上班时
间了。那时候，茶炉间弄了几个火眼（高灶），去晚了就没
有地方，必须另外设法。那时管烧茶炉的姓张，是个瘦高个
儿，外号叫“黄瓜种”，人挺倔，和人们关系搞得不太好。工

人們端着鍋去做飯，往往把鍋放在火眼上，抽空去干点別的事，如洗臉、切咸菜。“黃瓜种”到添煤的时候，便把火眼壟得滿滿的，也許把飯鍋給換了地方。到你去吃的时候，水還沒熱，和別人的飯鍋換了个兒啦。像这样的時候，只得餓着肚皮去上工。

然而，生活的苦難，折磨不倒工人弟兄們！只要看看“灤州會館”的生活，就可以証明了。

“灤州會館”在哪里：如果有位好事或有考据癖的人在北京調查灤州會館的地址是找不到的。即便碰巧在×街×号有个这样名称的會館，你訪問一下，情况也將大大不同。怎么回事？原来这里提的灤州會館是工人們給集体宿舍的某某房間起的名称。正像城里总公司那些租不起房子住的工人，夜里睡在城牆根地上，却自称住的是“順城旅館”一样。

这个房間在石景山脚下，住着七、八个人：李宝庆、張秀臣、高季兴、張永廉、張庆丰……等。他們大部分是京東灤州人，很能說到一塊、拉到一塊去。

王文炳原来也在这里住，后来因为結了婚，便在村里租了一間房子住。可是还常到“灤州會館”来串門聊天。那些人們也都喜欢文炳，他的手工艺巧、知識丰富。人們說他“什么都会，什么都行”。他講故事，人們圍着他哈哈大笑。他們到歇班时一塊出去玩。說上哪兒，“走！”抬脚就去，还一塊到妙峰山去游逛呢。一路上說說笑笑，王文炳告訴同伴們奇花异草的名称和習性。

“你怎么懂这些事？”

“和我母亲走南往北，爬高山，越平原，多少年月，我母

亲講給我听的。”

“噢，你母子滿世界走，为了啥？”

“討飯。”

穷哥兒們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因为文炳談得那么輕松。

他們到妙峰山去，是为了对菩薩的一片虔誠心願嗎？还是他們这些青年旺盛的生命力無法宣泄呢？誰知道？

請看“灤州会館”的正面牆壁上，那里供着灶王爷的神像。恐怕不是当画兒貼着玩的，怎么还給它上供和貼着紅紙对联哪？到近处看看对联上写的字吧：左边是“你可来了”；右边是“正要拿你”；上边橫批是“該死該死”。真逗。在屋門上，也貼着一副意味深長的对联：“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出有門、入有門、借債無門”；橫批是“債主臨門”。对着“灤州会館”門口的牆上貼着“出門見喪”四个字。他們真外行，誰家不是写“出門見喜”，怎么他們願意“見喪”呢？至于



在神像面前供献的是什么东西，簡直不便写出来了。

这些工人弟兄們为什么不信神佛，不尊敬上帝？他們說：“老天爷是替资本家办事的，是咱穷哥兒們的对头！”再說，他們这帮穷哥兒們，不自己寻开心怎么办？莫非不活下去了嗎？發了工資有时还打点酒喝。文炳曾喝醉过。真怪，看来他是那么乐观的人，喝醉了就“啾啾”地哭起来，也不知道他心里悶着什么心思？

他們几个人还演过戏：《瞎子逛灯》《老媽开唠》《双怕妻》……有一次，文炳扮演《双怕妻》里的一个脚色，脑袋剃得錚亮，捏上个面筋鼻子。他老婆在台下看戏，都不認識自己的丈夫啦……

这些精力旺盛的小伙子們，开始还是漫無目的地、自發地进行一些業余活动，到1928年以后，便有了工人自己的工会組織了。

十三、大革命的余波

石景山建厂后的几年中，处在軍閥統治时代。在那几年中的各地工人运动，如上海的三次大罢工，長辛店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在石景山都沒有什么明显的反应。

本来，工厂成立不久，工人来自各方，絕大部分是剛离开家乡破产了的农民，当工人还不久。

1925到1927的大革命浪潮，沒有卷到北方就失敗了。但是它的余波在1928年夏天终于姗姗来迟。不过，已經失去了汹涌澎湃的气势，可是，也把北方潮潤了一下。

1928年夏，城內总公司發起，先組織了工会。不久，石景山方面也有了动静。在一个“前夜”，石景山电厂的两个职员，一个叫王朝楨，外号胖王；一个叫常进安，外号叫常不管；他俩到鍋爐房，找到一些工人談了談，以后就成立起工会来。

职员在当时厂子里被称做“先生”，他們多半是資本家的亲戚朋友，一向是看不起工人的，怎么忽然关心起工人来了？不用說，一定是別有企圖的。他們知道，在全国各地高漲的工、农运动的影响下，这里的工人也会漸漸觉醒、漸漸团結，为着自己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起来和資本家作斗争。在資本家方面呢，一时还看不透国民党蔣介石的真面孔。这时，就有資本家的亲信，活动起来了，也要投机搞什么工会，在这里成立工会还是第一次，工人們摸不清底細，既然是王朝楨和常进安出面組織，一来二去也便选了他們当領導人了。

当然，也有些工人懂得“先生”們不会为工人們謀福利，甚至于是資本家派进来搗鬼的。于是，設法选举了工人自己的代表：王文炳、朱桂庆、朱桂湘等参加工会执行委员会工作。

讓我們看一看，胖王和常不管是怎样領導工会，怎样認識工会工作的吧。有一次，胖王打發人把王文炳叫来，他抽着鴉片烟，对王文炳說：“我告訴你啊，有事要和常先生研究！常先生是有学問、有教养的人！”

王文炳未答話。本来以为有什么重要問題要談，原来是这。不过，心想还看不透常进安是怎样的人，只知道他是技术人員；并且外号叫“常不管”。因为他除了爱打太極拳以外，

就不大管事。聽見胖王說他有學問、有教養，那就聽下去吧。

胖王吐了一口烟，繼續說下去，并帶有極其尊敬和景仰的神情：“常的奶奶是蔣總辦的親姐姐！你想想！”

原來如此。王文炳素來是沉着穩健的，便只回答了一個字：“噢。”

不論領導機構如何複雜，到底還是在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委員們（工人）努力下辦了幾樁對工人有利的事：在工會倡議和監督之下，公司允許成立一個工人業餘補習學校和一個工人俱樂部。——當然，所謂學校和俱樂部也不過是給騰出兩間破爛不堪的空房子，应付一下而已。

在城里總公司方面，開始比較活躍，因為資本家都在城里，鬥爭可以針鋒相對、短兵相接（石景山無資本家可鬥）。但結果也并不怎么好，雖然小有成績。比方，和資本家算賬，就沒有成功。因為公司的資金由鹽業銀行掌握，這個銀行既有勢力、又能搗鬼，工會為這個問題鬧了多半年，也沒下場。而蔣總辦在這時期根本就不露面了。他們看到天空間露出微明，勞動人民開始覺醒，就像耗子似地躲進地窟里去了。你想揪住他們是比較困難的。

所謂小有成績，是指把公司里的“大拿”外國人趕出去了。把每月拿280個工人工資的“英國駱馬”（或倫敦賣菜的）巴寧漢到底攆走了。

“要他干什么？一月拿那么多錢！叫他滾蛋吧！”工人們氣憤地說。并且把他住的洋樓門口的花盆弄倒，別的擺設取

消。

被大革命的余波潮潤了一下之后不久，接着就又到了干旱的年头了。

华商电灯公司开始搞工会組織的时候，由于大伙兒沒經驗，宣傳动員工作做得不好，以及資本家和他們的亲信暗中搗鬼，因而参加工会的人很不普遍。工人队伍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工匠們，就沒有参加自己的工会組織；職員們更不用說，只有別有用心、打算窃据工会領導地位的職員除外。动員工作沒有深入到流动性較大的临时工里面去，甚至連在低压爐上煤运灰的那帮生活最苦、受累最大的工人，也沒能吸收进来。

总公司开始組織了几个委员会，檢查工作的时候，总办們就躲起来了。躲起来，不等于向人民低头，只是被开始的工运所鎮懾，不敢明目張胆地騎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而是暗地里搗起鬼来。同时，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蒋介石叛变和出卖了大革命，造成国共分裂以后，蒋介石还是打着“革命”的幌子来欺騙人民。他为了滿足統治整个中国的野心，繼續进行北伐战争。当时，他正处在“泥菩薩过江，自身难保”的时候，無暇以全力鎮压在大革命时掀起的高漲的全国工、农运动。而資本家們呢，一时也摸不透这种情况，只得先躲避起来，以观風色了。但是过了几个月，資本家嗅到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不是站在工、农方面，而是相反的东西，就从老鼠窟窿里鑽出来，抖抖衣衫上的塵土，神气十足地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眼兒，又唱起他們的老調子“宁堵城門，不堵阳

溝也！”意思是公司有的是錢，錢花到大衙門口里；對下邊，就不理碴兒。使出他們的拿手好戲：分化、收買、鎮壓……對付參加工運的活躍人物、積極分子。

總公司方面工會負主要責任的人就被收買過去，加入了國民黨。有的工人就被扣個“共產黨”的帽子，送到當地衙門里。

1929年夏，總辦蔣世興召集工匠們談話，要給他們增加工資，但對小工、短工們長期不動。使工匠與小工、短工之間的隔閡加深。並成立與工會對抗的組織“互濟會”。滕煥亭當了互濟會的头兒，抓高級工人抓的緊，除了增加點工資以外，也有些別的“油水”，例如分點白面呀什么的……

資本家這一套套鎮壓、破壞工運的做法，是拿大官僚政客在公司里當協理的朱琛做旗幟的，是通過積極為資方服務的職員：滕煥亭、魏希良……人來進行的，更重要的是背後有國民黨和他的反動政權撐腰。

不久以後，有些工人就明白過來：

“噢，原來是這樣！推倒工會，主要怨蔣介石！他不是真心鬧革命的！跟資本家勾着手兒呢！”

工人中間在議論、氣憤，並開始研究進一步怎麼干法

……

十四、鍋爐房的怒潮

1928年石景山電廠組織工會時，雖然由於上邊所說的種種原因，沒有廣泛而深入地團結起工人弟兄們來進行鬥爭，

但是，它的影响还是深远的。它在工人弟兄們心灵的土壤上埋进斗争的种籽；一旦遇着适当的机会，就会扎根發芽了。

1930年春，石景山电厂就發生了一次鍋爐房全体工人大罢工的事件。

本来，鍋爐房的燒火工人在石景山电厂工人中是工作最艰苦的。那时候燒低压爐（后来和高压爐相比，人們称它为“笨爐”），兩個人負責裝一盤爐；底下先鋪好了山西口泉烟煤做火底，这煤好燒。再裝上京西門头溝的硬煤（無烟煤，那时主要燒这种煤）。裝成桥式的，高处达到一公尺，一盤爐就得裝四吨。一个“前夜”要清四回爐，“后夜”和白天都要清兩回。那会兒也不講究燒火技术。把煤扔进去，打个滾兒就往下放，还冒着老高的火苗子，就“呼呼”地推到永定河灘上去。

这活隨兒累極了，干这活兒的都是棒小伙子。他們天天用大鉄鍬鏟煤，飯量大、穿衣費，每月才几塊錢。所以从公司成立以来，請願罢工事件，多是出在鍋爐工人中間。

总公司方面在1920年，四十多鍋爐工人轉圓圈地签名，要求增加工資的那回事，上边曾經談到过。在石景山方面，最早的一次是1924年間，鍋爐房的二十多位工人，他們一塊找了負責总务的吳永方去請願，結果被吳永方使了些花招兒欺騙和应付过去，沒有鬧起事来。

第三次罢工，也是規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30年間石景山鍋爐房全体工人罢工的事件。

当1928年組織工会时，鍋爐房的工人并没有參加工会。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搞工会工作的缺乏經驗，办法少；另一方

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是工人們受了工头兒們的欺騙、拉攏和阻撓。他們把希望寄托在工头兒們身上了。比方，工头当中有个叫吳長有的，前面曾經提到过他，就是那个原先在家蒸包子的人，小名吳四，中流个兒，大臉盤。因为他一說話三楞眼，爱發脾气，嗓門兒又粗，人們給他起了个外号叫“滾地雷”。滾地雷真是一跺脚四角乱顛。鍋爐房的“英雄”。他和滕煥亭关系不錯——在这里面也有个原因：滕煥亭拉攏一帮工头和工匠，在成立“互济会”之前，是为了对抗“陈五爷”那帮人的，前面也曾提到过。后来排挤走了陈派，就又对抗公司新来的技术人员魏希良（当然，成立“互济会”还有其主要目的：分化工人队伍）。魏是法国留学生，懂得些發电技术，他是1929年和资本家一道反对工会的职员之一。但他和英人巴宁汉不对头，工会撵走巴时，魏希良倒是贊同。这样，巴宁汉的老搭当滕煥亭对魏極為不滿。后来，魏到石景山負責技术管理，滕更嫉妒了，便拉攏紧了吳四一帮人对付魏希良。

因此，低压爐的一些工人，又被吳四拉住，好为滕煥亭和自己撑个架兒。那些燒火工人們呢，也就認為只要和吳四等人一起，大概就有办法：就保住飯碗子。这是他們不参加工会的想头兒。

不过，上边說的原因，在短時間內还能起到作用；但天長日久也会有变化的。离开农村到工厂过集体生活時間長了，严酷的现实給予人們教育，觉悟便会慢慢提高，对旧社会吃人制度的不滿，从内心不平就可能訴諸行动了。

蔣总办等人既然主張“宁堵城門，不堵陽溝”，当然对这

些螞蟻縫兒更不會看到眼里了。所以一直到1930年，工資還是沒有提高多少。燒火工人們為了要求增加工資和要發給工作上需要的雨傘、圍裙……而遭到拒絕，便商議進一步的行動。有人提出鍋爐房全體工人罷工的意見，不僅鑪煤燒火工人一致同意，就連吳長有、馬連有等工頭在表面上也是贊成的，而且表現很積極主動。這樣，工人們心里就有了底，認為罷工一定能夠成功。因為掌握鍋爐技術的工匠們離開發電廠，就像鐘表停了擺一樣，發電廠不能發電了，資本家就會讓步。

工人們懷着勝利的信心在宿舍里集議，約定這一天下午四點鐘，“前夜”班應該接班時，就舉行罷工，離開鍋爐房到大街上去。商量好了，工人們非常興奮，大個子高滿和于江等把宿舍里掛的照片（一張照的發電廠大煙囪，還有八大處的風景片）和胡琴從牆上摘下來，“乒乓”几下子砸碎了，以表罷工的決心。吳長有、馬連有等工頭兒們也跟着宣誓說：誰不走出去，怎樣怎樣。

四點鐘到了，上“前夜”的工人果然不去接班了。只金成報告給滕煥亭；滕一看也的確害怕了。裝出一副可憐像來央求大伙。他站在低壓爐平台上向人們作揖拱手，讓人們上工；有什麼要求慢慢再說。工人們再也不信他那套拖延戰術了，把燒火工具“叮當”一扔，走出電廠，堅決罷工了。

在滕煥亭和罷工工人講條件的時候，已經有人給城內公司打了電話去。史總辦的兒子史四（在公司當一名處長）所見信兒就立刻帶着十幾個全副武裝的憲兵，分乘三輛小汽車開到石景山。

工人們呢，三十七名燒火工人堅決罷工，但是曾經表現積極支持而且當眾宣過誓的吳長有等人却中途妥協，還有另外的“正火”、“副火”等沒有跟隨那三十七人走出發電廠的大門，他們抽后了，他們向資本家投降了，他們破壞了自己弟兄們的壯烈的罷工運動！

這一來，史四們的气焰更為高漲。宣布三十七人全部開除，一個不留。他們依靠那幾個出賣自己隊伍的工頭兒做鍋爐房的支柱，并讓滕煥亭、只金成等在推煤、出灰和做其它雜活的臨時工當中招了有些人，調到鍋爐房。從前用兩個人的工作，補的新人需多用數倍，資本家為了鎮壓工人運動，是不惜幾個臭錢的。

三十七名工人弟兄雖然被開除出廠，但是他們的壯烈舉動，在全廠工人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必將記載于鬥爭的史頁上！

十五、紈袴子弟胡作非為

上邊談了一些那時候工人的生活和罷工的情況，再讓我們換換口味，聽一聽另外一種人的生活故事吧。

大人物頭兒，如三個總辦、渠司理（1928年成立工會以前渠就死了）、朱協理……們的生活，人們見到的很少。誰能到他們的公館串門呢？不過，多少也有些傳聞，是根據他們的听差、保姆……傳出來的。如蔣世興的乳母口傳給她的兒子，她的兒子到公司來看門房，又傳播給同住的伙伴，再傳給別人……，但是，并不豐富，沒有什麼珍聞奇跡。比方，

蔣世兴的“賢內助”是京東宝坻縣王啓深之女，對蔣世兴參慶王起了“積極推動作用”；西太后受李蓮英太監的捉弄……等等，就得算比較珍貴的傳聞了。另外，什麼渠司理是個“外交家”，經常大請賓客，每于酒席完畢，就拉開桌子“噼噼叭叭”地通宵打牌。僅是抽的“頭”錢，除了賺回全部肉、菜、面、米的費用之外，還能賺到男工女僕的工資。其實這不是什麼新奇事兒，哪個大宅門里不會這一套呢！

另外，渠司理家的宅院多麼豪華；房頂子用的是“筒子瓦”（從前皇上家蓋宮殿才用的東西）……等等。

還有，某總辦有四房姨太太；史康侯在模式口置了大片土地；還年年帶了小姐到法海寺自己的別墅歇涼；蔣總辦的大兒媳婦在廣寧坎擁有大批房產……等等，這些零碎兒，並不怎麼引起工人的興趣。不過總辦們的兒子們却是工人們熟悉的人物。尤其是蔣總辦的大兒子蔣傳茲和史總辦的第四個兒子史立嚴——這一對閹秧子，都在電廠負過責任。

蔣傳茲外號叫“蔣大抓子”，是個窩窩囊囊的傢伙。雖然他的由官僚變成企業家而具有雄心的父親，對他抱着很大希望，送他到法國留學，但結果他對父親的“事業”沒有做出什麼貢獻來，就一命嗚呼了。關於他生前的“事迹”，只能記出下面的一點點。

他留學回來，預備來電廠當主任之前，先來參觀參觀。滕煥亭們領着他在機器房裏轉遊着。他們走過一些正在操作着的工人面前，表現出氣概軒昂、談笑風生的“風度”，大皮鞋叮叮啞啞，邁着斯文的步伐。工人們有些人知道他就是蔣世兴的大少爺，但誰也不表示什麼，低頭干着自己的活兒。

个别的邪楞着眼瞅一下蔣大爪子。

不会兒，他們轉到鍋爐房里，蔣傳茲走近吹風机入口处，想看一看的时候，嗚，一陣邪風把他的緊緊圍在脖子上的圍巾揪住了，并且猛力地向吹風机入口里吸去。蔣大爪子的力气有限，不由己地就要連腦袋朝里鑽。跟随的人們吓坏了，“大少爷这是干嗎呀？”滕煥亭領头，几个人把蔣傳茲抱住，才把那个腦袋揪出来。一看，他的臉上已經磕碰得有几处流了血。

真是不祥之兆啊！還沒当上主任，先受吹風机的欺侮，幸亏保駕的滕煥亭們手急眼快，否則連小命也得搭上。但是，他沒敢对他父亲說出实話。当他父亲心痛地問他臉上弄的乱七八遭是怎么搞的时

候，他支支吾吾地回答：“嗯——跘，跘的呀，爸爸！”

这个事兒很快就

就在工人当中傳开了。有人發表感想說：“嗚，吸風机筒是不会拍馬屁！”后来，蔣傳茲就来当主任了。他除了对吸風机非常警惕，到現場轉时，除了首先記住摘掉圍脖



兒以外，管理別的事情也是縮手縮腳萎萎孺孺的。等到1928年工人們鬧工會，他爸爸躲到老鼠窟窿里以後，他也就病了，不久就死去。關於死的原因，人們有幾種不同的說法：一說是由於工人們起來了，他胆小怕事，憂心成疾；也有說他是由於患了不可告人的髒病而死的；誰知道呢？也許兩者都有，工人們沒有興趣再去打聽。

活的長遠的是史總辦的兒子史立嚴。上面提過他，小名史四，號叫培之。長的个子不高，胖墩墩的，一臉絡腮鬍子，說話喳兒喊叫，是個毛包子脾氣，可不像蔣大抓子。自從那次低壓爐三十七位工人罷工被史四開除之後，過了不久，史四就搬到石景山來坐鎮了。這家伙真是個闊秧子，憑着他父親是總辦，他是個什麼處長，就把工人哥兒們用血汗所創造的財富任意揮霍起來。史四抽的煙是五元一大盒的，當時一袋洋面才二元，穿最好的皮鞋。——那會兒，公司有個修理三、四號機母綫的德國人，史四的衣飾就是模仿這個德國人的。比方，三色襪，帶穗頭的吊帶，尖頭兒皮鞋，淺褐色短褲……等等。史四一天價講究這些。他的皮鞋滿箱滿櫃，一高興或者一不高興，“唵啦”倒一地，全不要啦。專門有一個理髮的替他拾掇頭臉，掏耳捶背。听差的有好幾個。他養着十來匹馬，僱用三、四個馬伕。馬的飼料除了一般的草料、糧食之外，還有富於營養的胡蘿卜。當工人們吃雜合面的時候，他養的洋狗卻吃精米白飯。

史四叫花匠把他住的院子布置成花園一樣，一般工人不讓進院，變成了“禁地”。

史四對發電是外行，可是會開汽車。一次，他坐着汽車出

門，上一个大山坡，司机开不上去了，史四把司机扔出車外，自己开上去。还有一次，他想自己開車过瘾，便对司机說：“你上后面坐着去。”司机楞了一下，說：“我怎么好坐在四爷的座位上呢？”

“混蛋！”史四見司机居然不听他的話，急了，罵道，“你他媽的給我滾！”得，从此就开除了那个司机。

一个工人因为把發電厂的牌兒（工人帶在胸上的厂徽，菱形，兩头常刺手）的兩端磨光了一点，被史四看見，說：“嗨，不願意帶嗎？滾蛋！”

史四就是这样的不是东西，他看着誰不順眼，就开除誰。一次，勤杂工孙老头在扫院子的时候，直起腰来隔着矮垣牆向外看了看，被史四碰見。“走！給我滾！”立刻叫孙老头卷了鋪盖卷兒。他拿着散个把人不当回事，不知为什么，有一回，非散另一个杂工唐三不可。那时候工人要是被开除簡直不得了啊！人們把开除叫做“摘鳥食罐兒”，会立刻受飢挨餓的。但是史四不管那些。別人劝說也不行。唐三急了，把衣服上的符号一撕，擲給史四，史四低头去拾，唐三掙起袖子，捏紧拳头向史四打去。不巧，被一些人攔住。唐三憤怒地罵着：“小奶奶的兒子！赶馬車的生的！”就走了。

唐三罵的話里的含义，听說有人摸底，我們也不必过問了。

厂里有个職員叫史秀峰。有人称呼他一声“史先生。”被史四听见。史四生了气，說：“噢，这厂子里还有另外一个史先生嗎？除了我还有姓史的嗎？叫他滾！”

史四爱打獵。一次，他出門便冲着老槐树“当”的一槍。

“嗬！四爷的槍法真准啊！”这是跟在史四屁股后头滕煥亭的恭維語。那是个夜晚，史四毫無目的的乱放，什么也沒有碰到，滕煥亭只是根据“四爷放的槍”，就大加喝彩，別人听来，簡直是諷刺。然而“四爷”很高兴。

史四和滕煥亭、姜立宇、常不管等人常在一起喝酒划拳。他們一同騎着馬到黃村尼姑庵里去胡鬧。

史四，这个用工人血汗喂饱了的家伙，就是这样揮霍無度、任意混鬧、胡作非为的。工人們背后說：“这小子，得不到好結果的！”

十六、老实工人大显身手

縱觀石景山建厂以来的領導人員，比較正派和懂些技术的是太少了。听说在蔣傳茲之后有个王瑞森主任，是个比較正派和內行的領導人。他原来在电气学校当教員，后調石景山电厂做主任。据工人們反映，他倒是个“科学人”；而且对工人們也不大摆架子。可是，那时史四已經住在石景山了。王瑞森看不慣和管不了史四养馬蓄狗、为非做歹的作風，据说，一气之下，就辞职不干了。

王主任走后，修造厂的負責人石明俊就提升为發电厂的主任。有的工人無緣無故被史四开除的时候，就去請石明俊給說情。不过，史四对石主任的話也是愛听愛不听的。

与石明俊同时，發电厂添了个叫于竟如的副主任。这人長的个子不高，帶着副近視眼鏡，派头滿大。那时汽机“合車”（几个發电机并列运轉）的时候，于竟如不讓別人动，

只許他来干这一手兒。你看吧，在合車以前，他早就蹲个騎馬式的样子，拉着架兒裝腔作勢起来。其实，当时机器房的工匠們，像郭师傅、刘师傅、孟师傅、苗师傅……都能干的了。可是，于竟如只讓他們和其他工人們站在旁边垂手而立，看他的！

这位姓于的副主任来厂后，連工务处处长滕煥亭也吃不开了。本来嘛，滕煥亭是依靠英国人起家的。到于竟如来的时候，英国人早已离开厂子，滕煥亭的靠山崩潰了。再說，俗話講得好“一个槽上拴不住兩匹叫驢”。用文雅的話說，“兩雄不并立”呀！于主任排挤滕煥亭的手腕可算是相当高明的。他叫滕每月拿三百多元的干薪，不分配他工作，就是說不讓他管事。工人們私下看得清楚，議論說：“于把滕噲行啦！”这样一來二去的，滕煥亭自覺沒趣，因而憂悒成疾，便告老还家了。

且說滕煥亭回到家里，又赶上些不順心的事兒。他的大女兒正在交男朋友，常常帶上個小伙子到家里來。滕煥亭看不慣，三气兩气的就一命嗚呼了。

这样看来，滕的死确实有点冤枉；可是死后頗为光荣。为什么？連蔣世兴总办都亲身前来吊祭呢！

那一天，傍晚，滕的灵柩前面忽然熙熙攘攘地來了一伙大人物头兒。为首的穿綢裹緞，看来挺闊气，是个高个子、紅糝糝的長瓜子臉，背已駝了，鬚眉皆白。守灵的孝子賢孙們睜开泪眼一看，嚙，原来是蔣总办和一些跟隨的人。

再說蔣总办吧。在灵柩前比划了比划，做些吊唁的手續；看样子要下跪了，但行动迟緩，臉色忽然变得通紅，不知

是憋的还是生了气。結果，犹疑着跪了下去，勉强叩了三个头。于是，众喽罗上前搀扶，站了起来。接受孝子的拜謝以后，就哆哆嗦嗦地回府去了。据说，回到家就大发雷霆，把随从們臭罵了一頓：

“你們都是些混蛋！蠢貨！我何許人？滕煥亭何許人？我焉能給他下跪？你們戳在那兒，就不知道向前攔阻？！一个个僵尸！”

这段故事很快傳到工人們耳朵里，工人們沒有發表很多感想，也不会找些文雅而适当的語句加以評論，只是簡單地說：“这些人算什么玩意兒！”至于对滕煥亭个人的評論，則是：“看，給資本家干了一輩子，当了多年的忠实走狗，可是在資本家心目中占据个什么地位呢？！”

故事再轉回来講吧。發電厂的領導人虽然多是外行，但是由于北京居民商戶的需要，由于工人們的劳动創造、摸索前进，發電厂的規模还是逐漸扩大着的。

自从1922年2月發電以后，到1929年底，石景山电厂就安裝了四部發电机和12盤低壓爐。又过了几年，向德商西門子洋行購買了一部15000瓩的汽輪机。可是，这一回厂里管事人却作了难了。

1936年初，就把这部五号汽輪發电机买到，但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精通全部安裝技術的人員。于主任虽然在合車时会装出一副極其神气的样子；但是談到要安裝机器他可办不到。过去，安三、四号机时，是巴宁汉、滕煥亭等頂个名兒，实际是些老工匠領着青年工人們安裝的。老工匠們有的

走了，有的死了。这次安装机器必须另外物色人选。

于竟如问到跟机器来的德国人是否可以负起这个责任来，德国人不干。反过来问于：“你们这里过去就没有安装过机器的吗？这么说，机器房里的几部是谁安的呢？”

“他们都离开了厂子，”于说。好像有点惋惜似的。

“就没有别人了？”德国人问。

“我问过几个老师傅，他们没有这个勇气——有倒是有一个，叫郭玉奎，他是能干这个活的……”

“那就叫……”

“可惜，他死了。”

“莫非他没有带徒弟吗？”

“咳，我们这里谁也没有正正经经地教徒弟。”

“莫非没有跟郭玉奎一块工作的吗？”

这一提醒，倒给姓于的一线希望。“噢，”他说，“有个姓王的小伙子，我打发人把他叫来问问。”

姓王的就是王文炳，也就是自1921年来厂的那个青年工人。他刚来时，厂里正在装二号机，他就跟着做些打下手的活儿。比如紧紧螺丝呀什么的；更主要的工作是给老师傅们提壶水、递递工具、扫扫地……干些杂工，没有学习的机会。安装完了跟着运行。1924年文炳跟着安装三号机，完了又跟着运行。1928年安装四号机以后，文炳就被分配做汽机修理工了。当安装四号机的时候，老师傅只是在旁边动动嘴儿，实际工作全是文炳他们这帮青年干的。天天守着机器，爬上爬下，一身裤褂全都磨得稀烂。

衣服磨烂了，技术也熟练了。按理说应该是这样，其实

不然。在那个时代，一来因为当师傅的有货色不掏给人；二来人们对学技术不感兴趣——光有技术没有门子，不送礼拍马，连个“长工”也不容易补上。那时，发电厂有十多年的“长期短工”。即便补上长工，也只是当一名“小工”，很难提成工匠、匠目什么的。因此，人们对学技术就不感到兴趣了。即便磨烂了几身衣裳，也不见得学出手艺来。

自然也有例外，王文炳跟着郭玉奎干活儿的时候，郭师傅经常是在一旁叨着烟卷不动手，活儿都叫文炳干。文炳心灵手巧，有些技术活儿他就吃进心里了。尤其是1928年文炳在做工之余，上了工人补习学校，跟一位叫王巩固的老师学了些数学和物理方面的常识，这样对他提高技术有了很大帮助。后来，他对人说：“我过去连个圆形物件也不会用科学方法计算，师傅也不告诉我。自从跟王老师学了‘3.1416’，我才明白，原来这么简单。后来又学了‘钩、股、弦’，‘虎克定律’……什么的，心里就更亮堂了。”

但是，王文炳干了十几年，连个技工的名义还没有得到呢。五号机买来以后，没人领导安装，于主任叫人把王文炳叫来了，问他怎么样，能不能把这台极其庞大而复杂的发电机安装起来。王文炳看了看新买来的漂亮的机器，内心就产生一种感情。他笑模活儿地说：“试试吧。”

于竟如虽然并不满足和信任这个“试试吧”的回答，但是从这位小工的眉宇表情中看得出“也许有些把握”的样子。再说，他也不愿再费劲普遍地去搜求人材，就把这个重担放在说“试试吧”的工人身上了。

这是1936年2月间的事，王文炳就开始安装西门子的

“一万五”。打底座、吊纜环，安裝完机身接着就是化汽缸和其它零碎。說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簡單呢。就說打底座吧，連頭髮絲兒那么点也不能差錯呀……四个月的工夫，机器全套安裝完畢。



一試大車（机器），沒有一点毛病。跟着干活的德国人惊佩不止。在于竟如面前伸着大拇指夸贊說：“你們中国大有人材！那个人是了不起的！”

在这次安裝机器以后，工厂领导方面，不得不給来厂十五、六年的王文炳的工資“略加調整”一下。

十七、盧溝桥的抗战炮火

工人或工人的子女能够得到上学的机会，是件大事，也是件極不容易的事。历古来年，都是有錢的人才上得起学。中国虽然是有四、五千年文化历史的古国，然而，在旧社会，文化和穷人們是無緣的。

工厂里附設工人業余補習学校和职工子弟小学是經過工人們多少次的坚决斗争得来的。所以，很多工人爭先恐后地报名参加業余学校学习，而且有些具有坚强意志和毅力的工人，一直坚持学了几年。不过，在当时由于从实际生活中沒有感到学习的迫切需要和認識到学习有什么好处，过分繁重的劳动使得人們累得筋疲力尽，因而有些工人对学文化还是冷淡的。

发电厂从1928年成立工人業余補習学校之后，开始請的教員不負責任，而且呆不多久就走了。以后来了一位吳老师，对工人不錯，講些工人流血流汗的道理。可是也沒久呆。在吳老师以后，来了一位很受人欢迎的老师，就是前面曾提到过的王巩固，这人三十来岁，說話和和气气，安安稳稳，和人們能打成一片，在教課之外还講些报纸上的新聞和一些社会常識，連“五四”时代和大革命时代的一些新旧思想斗争情况也介紹給工人們听。因此，他就像磁石一样吸引住几位求知欲很强的工人，如王文炳、赵松林、張开成、高世英……等。

坚持学习的人們，在掌握技术方面有显著的提高。发电是现代化的極其复杂的工业，但是参加发电的人們，开始对于什么是电压、气压、热單位(大卡)、电流單位……都不容易弄明白；計算百分比、面积，也觉得困难的很。自从在補習学校跟王老师学了算术、物理以后，技术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此外，有了文化就願意看看書报，听听無綫电(发电工人自己配制个無綫电收音机还方便)，希望更多地了解自身以外的国家政治、經濟情况和世界大事。有几个工人經常在补

習学校里坐到夜十二点，学习之外，看报、闲谈。

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是集体的，彼此互有影响，一般工人都关心国家大事，所以当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的时候，工人们非常愤怒和激动。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在那以后；虽然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竭力压制抗日爱国运动，实行穷凶极恶的镇压政策，甚至在茶馆酒肆都贴着“莫谈国事”的字条；但是工人们还是常常私下议论抗日救亡问题。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前，日本兵在石景山一带演习过。一队队身量不高，但是粗鲁蛮横的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吼叫着“杀！杀！”的声音，演习攻击、冲锋……骑兵“踏踏踏”地卷着飞尘在中国土地上驰骋，搅乱了安谧的环境。山坡上锄地的农民们，下了班走在路上的工人们，用疑惑和厌恶的眼神瞅着那些在别国土地上耀武扬威的外国军队，内心感到极为耻辱和忿忿不平。

它们演习完了，有的骑兵向着空无一人的山巒、小径、丘壑、森林……拍照。显然是有什么企图和将要进行什么阴谋勾当。

不久，就爆发了“七七”抗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妄想要灭亡中国，在1937年7月7日的夜间，向北平近郊卢沟桥发动了进攻，当地驻军再也不能忍耐了。在全国各地人民万分高涨的抗敌情绪鼓舞下，便不顾国民党当局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抗战了。

抗战的炮声，又振奋了全国人心，爱国的人民，奔走相告，举国沸腾，一致要求发动全面抗战。石景山的工人们，

下了班就跑到山头上，向南面遙望。在二十华里以外的盧溝橋一帶；炮火連天，人馬翻騰。人們默祝：快快地打出日本鬼，替中国出口气！

老人們还記得：自从甲午(1894年)中日第一次战争，腐朽的清政府打了敗仗以后，日寇無时無刻不在企圖实行“大陆政策”以灭亡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寇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1925——1927)前后，制造数次惨案，如上海的“五卅”，济南的“五三”等惨案；到1931年“九一八”攻占了东北三省，接着在上海、热河、長城口(喜峰口等地)、察哈尔……多次寻衅，想要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中国的人民每次都掀起轟轟烈烈的抵抗运动，給敌寇以迎头痛击。然而每次都是被無耻的反动的国民党卖国政府阻止和破坏了抗敌斗争。

这一次，盧溝橋的抗战炮火响起之后，国民党当局再也阻止和镇压不住全国人民的抗敌决心和行动了。人民为了洗雪几十年来的国耻，使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立起来，宁願作最大的牺牲，以人力物力支援抗战。

然而，国民党反动政府仍然沒有抗日决心，企圖妥协。二十九軍当局指揮無力，虽然有些士兵們进行抵抗，平津人民及全国人民的支援；但終于因为领导者犹豫、妥协，坐失良机，使日寇能够从容地大量增援。七月底，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等潜逃保定，平津相繼淪陷了。

石景山工厂的工人們，有的就想和軍隊一塊退走。几年来他們常常听到人談东北淪陷后，中国人过的牛馬一般的生活，誰也不願意当亡国奴啊！但是軍隊退却得很突然，而且

毫無目的。工人們只得留在淪陷區了。人們想到有幾億人口
的中國，遲早要站起來的！……

十八、地下道的工人生活

石景山淪陷以後，發電廠就被日寇劫收過去了。強盜自
封為“主人”，真正的主人被強盜們看做奴隸、當牛馬一樣使
喚。他們首先規定中國人見了日本人要敬禮，稱他們為“太
君”。各科室部門，都有日本人當頭兒，監視着中國人，像獄
卒對待囚犯一樣，任意鞭打、斥罵。

運行工人上前夜班的，下班後，向家走着，如果遇上巡
邏的日本兵，就抓起詢問、痛打，後來，有些人不敢回家睡
覺。推爐灰工人住在爐灰道里，機器房的工人在機器旁邊或
者找個牆角落睡下。上班先找個草蓆子，預各下班睡覺的。

跟日本鬼子搞
電氣工作更是危
險。他不管你死活，
總是催着你“快快
的！快快的！”因而
常常電死人或者燒
傷人。

修大水池的時
候，除了電廠工人
之外，鬼子又抓了
一些農民來，他們



怕农民逃跑，給帶上鎖鏈子，用軍隊押着、鞭子抽着干活。叫人們住地牢，周圍用鐵絲網圍起來；門口架起机关槍，有逃跑的抓回來活活打死。有過路的老百姓，被鬼子碰上，不是當作逃跑的工人就當做八路軍的便衣偵探，施以酷刑：有的吊打，有的叫洋狗咬，有的澆辣椒水……。

凶惡、狠毒的日本鬼子在中國製造了數不清的慘無人道的事件。這些血債，中國人民會永遠地牢牢地記下的！

日寇在中國實行第四次“強化治安”的時候，糧食就緊得很了。按人口配給糧食，月底扣工資。家里人口多的工人，不但領不到工資，扣盡了，還得倒找給公司錢。

五次“強化治安”以後，就到了餓死人的年頭兒。連棒子面也不配給了，只剩下“平衡面”、“共合面”、“混合面”……之類的東西。

什麼叫做“混合面”呢？凡是吃到過的人們，一輩子不會忘記它的！是些豆皮子、花生壳子、玉米核兒……亂七八糟過去連牲口都不肯吃的東西，讓我們中國人民吃起來。甚至連這些東西也不夠吃，工人們為了生活下去，不得不黑夜白天打加班。

人們除了吃混合面還吃些：葱鬚子、蒜瓣子、樹叶子、水里生長的扎蓬草、白薯秧子、酸棗、糖糰……吃混合面時不就菜，拌點鹽水；吃樹叶子、白薯秧子的时候，叫開水一沖就算；吃糖糰，比醋糰還難吃，屙不出屎來；吃酸棗的时候連核咽，為了填飽肚子……當時河灘上的小柳樹，山坡上的小榆樹，叶子都采得光光的，野菜挖得淨淨的，凡是能往嘴里放的東西都吃了，有人還吃過滑石粉。這還不要緊，只要

能活着。可是狠毒的鬼子还在混合面里掺头髮、牲口毛和有毒的喇叭花子……。这样，人吃了就拉稀，被鬼子发现，就是“虎烈拉”，带着气扔到山沟里或者洋灰坑里，就是这样的惨无人道。山沟里的野狗，老鸦吃死人吃的都红了眼……。

在敌伪统治年代，工人生活的惨状如此；那么，工作条件怎样呢？看一看当时年轻力壮的刘光钧吧。

刘光钧从“七七”那一年十一月间，就来发电厂了。他那时才十二周岁，父亲刘超在低压炉烧火。按说，爷儿俩在一个工厂工作是件好事，合乎理想的事了。

正在修高压炉大楼，十二岁的孩子——短工刘光钧，做挑水的活计。沿着木板搭的馬道一步一步攀登上去，你想，这是多不容易的事！那时候，敌伪统治者管你的身体“吃得消吃不消”吗？照顾你是童工吗？适当的分配你力能胜任的工作吗？……

光钧这孩子只得咬着牙干，肩膀压腫了老高。磨破了，结成血疙瘩，像拉车驾轅的牲口叫鞍子打了肩（磨破了脊背）一样。光钧这样干了十个月。结果还是被裁掉。没事干了，托人介绍到钢铁厂选煤、看水泵。那时，经常有这样的工人，在风雨飘摇的情况下过日子：發



电厂下来到钢铁厂；钢铁厂下来到发电厂。都不要了就失业。要想安安稳稳保住一个固定的工作是不容易的。

光鈞在钢铁厂干了二年多，又被裁下来。在家闲住了一些时候，后来发电厂找人推炉灰，他就又回到发电厂。

推炉灰是怎么个活碴呢？在电厂的老工人，干过这个活的人真不少。谁提起来也会“谈虎色变”的：几盘锅炉下面的地下，是一层黑洞洞，是锅炉落灰的地方。好煤进炉，从来不使它烧透，有的进去打一个滚就往下放。炉灰积累老高，快顶到锅炉房的地板了。

向外运灰的人，从甬道里掏一条路，鑽进去，赶紧捨几铲，炉灰还“呼呼”的冒着一人多高的火苗子，就往外跑，人天天叫火烤着，烤的身上“滋滋”冒油；衣服经常着火，这里烧一个洞那里烧一个洞，头髮都被烤卷了，像烫髮一样。拉车的四分粗的麻绳烤得一扯就断；人跑出炉灰道，有的走几步就晕倒了。因为火苗比人高，駕车把的工人看不见前进的路，烟呛的睁不开眼睛。这样繁重的活计必须年轻力壮的人来干，必须吃得合适才能顶住。俗語說“人是铁、飯是鋼”呀！可是，他們吃的是什麼？豆餅面、混合面……

和光鈞一塊上班的工人，十六个人烤跑了十三个。光鈞那会儿真有个横劲，一直顶着干。有个工人叫安順，胳膊有毛病，伸不直，不能駕车把。别人不愿意和他一塊干活，光鈞不忍看着安順打掉飯碗子。“得啦，跟我推一个車！”光鈞說。每次推灰，光鈞駕车把，安順拉繩。安順当然心里感激，光鈞沒有說半句怨言。

到1941——1942年，光鈞調到低压爐燒火。爷兒倆一星

期領十八斤豆餅面，不管吃飽。到月頭算賬，倒欠廠里一百多元。有個叫王永泉的燒火工人，活生生的餓死了。光鈞的父親因飢餓勞累，得了肺病。

沒轍啦，想法打加班。光鈞帶上六個比燒餅還小的小豆餅上班。有計劃的吃；前八個鐘頭吃三個，後八個鐘頭吃三個。有時候還分給別人吃一個。他除了自己上班，還替父親上班（一個白天、一個前夜），另外還打加班。曾經四十小時沒出鍋爐房，黑天白日連軸轉。哪有力氣呀？只得扔兩塊煤就摟着肚子到一邊跳一跳。這般拚死拚活的干也填不飽肚子。

父親的肺病，越來越嚴重，不忍心連累孩子，就偷偷的拿了麻繩到永定河灘樹林里去上吊，幸亏被別人救了回來。爺兒倆相見，大哭一場。光鈞勸他父親說：“受罪，挨餓，咱一家在一起，您千萬別尋短見！安心治病，養病，您儘管借、賒。借的出來就花，賒的出來就吃。我死不了反正給您還賬。我這一輩兒還不清，下輩孩子們再接着還！”

父親說不上話來，心痛如絞。肺病一天天嚴重，還是病死了。死的時候，連買棺材、還債，又借了一百多元。這是在工廠干了半輩子的老工人的下場。汗流盡了，人熬干了，死後落不到一個裝身子的棺材錢……。

十九、游擊隊夜襲發電廠

日寇統治的年代，過着像劉超、劉光鈞爺兒倆的悲慘生活的人還多得很。前邊提過的工匠高世英，正式學徒出身，有手藝，但還是失了業。過了些時，托人介紹回電廠推爐灰。這

样一个手艺人，連累帶餓，就病了，在家里躺了很多天，只落得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了。要吃沒的吃；看病沒錢請医生，依靠十几岁的大女兒揀煤核度生活，幸亏工人弟兄們，如王文炳等湊了几个錢送給高世英，算是苦煎苦熬地活过来了。

有一个叫史同升的工人，就是在鬼子統治时进厂的。来时光着膀子、赤着脚，穷得連一件上衣一只鞋子也沒有了，只穿着一条破爛不堪的褲衩兒。他像許多工人一样，用洋灰袋子紙縫一縫当衣穿，走动起来嘩啦嘩啦的直响；天冷了披个草帘子或者麻袋片。赤着脚推爐灰常常叫炭火燙焦了兩脚。后来害伤寒，躺在下房里动不了，日本鬼就要把他抻出来，活活地扔到后山溝里。幸亏同住的工人弟兄們極力攔擋，还替他上工、加班，帮他做飯吃，才救活了他。

油漆匠肖鳳林，在發电厂当短工，老婆討飯。他們在村边上搭了个小窩棚住，女兒害了很严重的病，不但沒錢治，連吃的也沒有，做父亲的不忍心看着孩子活活的受罪，觉得实在沒办法了，就想背起孩子去扔掉，讓她快死免得受罪。可是，当父亲的怎么能下这样的恨心呢？

有的工人被日本鬼子要来当听差的，他們看見鬼子們吃剩下扔进泔水里的魚肉太可惜了，便撈出来預备洗洗煮煮給小孩去吃。叫鬼子看見，不仅拳打脚踢，还要他給鬼子的狗下跪，說是搶了狗的食物。

另外一个工人，在半夜里被日本鬼子叫了去，牆边立着木棒，門口臥着惡狗。鬼子誣賴这个工人拿了他的錢包。掙掙地說：“你的不还給我錢，叫狗咬死你！”兩只凶狗也凶狠狠地瞅着这位工人，想扑过来的样子。正在緊張的时候，鬼子

却从桌子抽屜里發現了那个錢包。这位工人实在难以忍受这样的侮辱、誣賴，恨不能一刀劈死面前的敌人！

仇恨、耻辱、血債……是写不完的！經受过的同胞們，請回忆一下，講給你們的孩子和你們周圍的青年听听吧！

强盜們这样殘酷地对待我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怎样？是不是逆来順受、甘心做鬼子的順民、亡国奴？請看，在广闊的中国戰場上吧。当国民党軍隊节节敗退，大塊大塊土地淪陷的时候，人民的子弟兵——八路軍、新四軍、游击队却長驅直入挺进敌后，展开游击战、运动战，为了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中，为了赶走帝国主义侵略者，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在到处痛击日本鬼子！

石景山淪陷不到一年，八路軍游击队就襲击了發电厂。在厂子里的工人們，也从来沒有被鬼子殘酷的压迫手段所吓倒。自淪陷那一天起，工人們就和敌人进行着尖銳而复杂的斗争：譬如，鬼子讓工人們出入大門給他們敬礼。工人們就不干。开始，單个或二、三人因为不敬礼被鬼子打了，以后再出入門的时候，联合一伙人，一齐出入。連看都不看鬼子一眼。一伙人昂着头或者說笑着走过去，好像門口什么东西也沒有，把鬼子当做一塊石头、一只狗一样地不去理睬。鬼子生气了，想打人，但是工人多，打不过来，也不敢打，知道工人們急了会揍死他的，便喳呼几声算了。慢慢地就把出入門敬礼的規定免掉。

綫路工人身上都帶着一根地綫，遇有不安全的时候，或者催他“快快的！”时候，先使电接地。工人們制造無电的电

網以欺瞞鬼子。遇見單獨和小日本鬼子一起干活的時候，同樣驅着鬼子“快快的！”有一回，一位姓韓的電氣工人，叫一個小日本鬼用改錐修綫，放了炮，把日本鬼燒壞了臉，住了好久的醫院。尤其是一些技術好的工人，經常把鬼子耍了，鬼子也沒辦法。

一個叫支士立的工人叫日本人打了，許多工人聯合起來找了他們的負責人去說理鬥爭，對他們用強硬態度，他們就會軟下來，向工人們道歉，說好听的。

在生活最困難的年月里，駐廠巡警長閻大鼻子鼓動工人和家屬到日本顧問那裏請願。人們餓的實在難受，就有幾個工人和家屬跟閻大鼻子一起去了。見了日本顧問，先進行說理，提出多發糧食的要求，日本人不答應。大家很生氣，閻大鼻子却軟下來了。工人和家屬們非常氣憤，嗤之以鼻，轟然而散，從那就罵閻大鼻子是無恥的漢奸！

至於石景山淪陷不到一年，八路軍游擊隊就來一次夜襲發電廠的那回事，更使鬼子們每一想起就膽戰心驚了。

那是1938年“七七”抗戰周年紀念日的黎明之前，四點來鐘的光景，有八路軍二、三百人從永定河西邊過來，指揮員帶着發電廠的詳細地圖——哪兒駐着日本人，哪兒駐着警備隊，哪兒是機器房……畫的都很詳細。當然，事前和電廠工



人就有了联系。

八路军的一部分首先包围了车站和广宁坟村，击坏敌人的一列载货火车；打死两个日本巡逻。从北厂掏走了几个日本鬼子。另一部分有一百多人，进了发电厂，都埋伏好之后，有两个青年小伙子，每人拿着两把手枪，冲进警备队驻扎的大屋里去。只是他们两个人的突然出现，只是提着手枪喊了一声“不许动！”就俘虏了警备队全部——一百多人，缴获了一百多支大枪和许多器材。在班上的工人们，争着替八路军弟兄们搬运胜利品。天不明，就回到了河西。一位推炉灰的工人，姓刘，背着几架电话机送八路军过河以后，叫他回厂，他却坚决要求参加了八路军。

那天早晨，石景山的工人和家属们拣到很多宣传品，了解到中国拥有雄厚、英勇的抗日力量，心里是多么兴奋和激动啊！

二十、八宝菜暗藏字纸条

在沦陷区，一方面是日寇加给中国人民身上的残酷虐待；另一方面，则是人民的反抗斗争。发电厂的人们，绝大部分是具有正义感和民族意识的，对于日寇统治下的凌辱和悲惨的生活忍无可忍，慢慢由自发斗争发展成有组织有计划的抵抗活动。这些活动，有的明显，有的隐蔽。这些活动和工厂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是有关系、有影响的。

“七七”抗日战争以后，在北平城内住的共产党员老杨（石景山的党员同志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据说全国解放

后，老楊同志調湖南省去工作了），到石景山發电厂發展組織，吸收了張开成入党。張是修理工，和王文炳很要好，他們从1928年上補習学校时就接近，彼此的思想性格十分了解。在一起的时候，什么都談。淪陷后，他們就商量怎样團結职工、对敌人进行斗争。

1938年的一天，开成和文炳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就探問文炳对共产党的認識，在这时文炳就提出参加党的要求。过了些天，文炳下了班，在門口抱着孩子玩，开成过来，問了問吃过飯沒有？好像还問了問吃的什么，又逗了逗孩子耍，見旁边靜無一人的时候，就低声說：“上級来了人，批准你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啦……”

文炳心里高兴的“噗通噗通”地跳起来。过一会儿，他問开成：往后做些什么？怎样联系？在什么地方碰头？开成一一告訴他。

就从那天起，王文炳做了光荣的共产党员。在那种环境下面，不能举行入党仪式；不能發生橫的关系。文炳除了知道介紹人張开成之外，就是一个經常提到却没有見過面的“老楊”。

老楊是住在城里的党的工作者，本来打算到石景山来住着工作，公开的職業是計劃开个小鋪。但后来这計劃又变动了。只是过些天来傳達一下上級的指示，或者送点學習文件。記得当时學習文件有《辯証法的唯物論与唯物史觀》……等几本書。

至于党员和党员之間的联系，是利用各种不同方式的。除了在門口抱着孩子耍的时候碰碰头，还曾在贈送八宝菜里裝过紙条兒；还有其它。

文炳入党后不久，甫成就要去延安学习，预备交代工作给文炳，但因故未去成。过了些时，开成的朋友（在城内某小工厂工作，是共产党员）被捕，开成回到京东自己家乡躲避，等他朋友释放出来，开成才又回到工厂。这样就有些暴露目标了。在那以后的一个阶段，不大发展组织；做工作的方式也更为谨慎。可是，电厂党的工作仍然遭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他的走狗们的大破坏。那是1942年春夏之交的时节，张开成从石景山被捕进城去。到八月里，文炳的大儿子王俊恒摔坏了胳膊，住在城里同仁医院。文炳进城看孩子，在同仁医院叫宪兵队逮走了。同时，在厂子里逮捕了朱桂湘、王云亭、张玉溪、刘同林、王治江等几个人。这里面有的是党员，有的是进步群众。

王文炳在监狱里耽了一年半的时间。这期间虽然受尽了肉体的折磨——各种残酷的刑罚；但是，文炳自觉是等于上了一年半马列主义的学校呢！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们给文炳请来许多难得的教员——一同住狱的八路军官兵和游击队员们。他们闲着就给一些没有到过解放区的难友们讲抗战事迹，讲革命道理，文炳便在这些同志帮助之下丰富了斗争知识，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更坚定了革命意志。

在被捕入狱的几个工人当中，王治江、刘同林最年轻，经过严刑拷打，敌人找不出证据，后来就释放回厂，共产党员朱桂湘和大批中国工人一起被运送到日本去当劳工，后来桂湘被折磨死在日本福冈了。文炳在狱里耽了一年多，但敌人也找不出真凭实据，只是施些酷刑，后来也就放了。

文炳回到石景山，当然就失掉了党的关系。他不知道找

誰来解决組織問題。心想慢慢地找吧，只要一心向着它，就会找得到的！

家庭成了什么样子呢？母亲去京东文炳的出生地，投亲靠友，妻回到她的娘家居住，家庭弄得七零八散了。厂子里日本人正鬧着宗派，管事人叫王文炳到琉璃河修机器，一个月后又回到石景山。这时厂里管倉庫的人名叫刘金山，文炳去領东西时，他們常常聊几句。思想一致的人，一下子就会膠在一起的。一天，刘告诉王：

“下了班，到北辛安小鋪吃点东西去。”

王文炳感激地答应了。于是，小飯鋪成了刘金山介紹王文炳重新入党的值得紀念的地方了。

刘金山在介紹王文炳入党同时，还看准了一个对象，就是王文炳的大孩子王俊恒。他和俊恒已經接触过好几次了。

王俊恒是怎樣的一个人呢？当你接触和熟悉了这样青年工人的时候，你会产生愉快、幸福和对人生抱有無限希望的心情的。俊恒出生在广宁女工人宿舍的一个杂院里。母亲为人端庄、勤儉，性情温和、賢淑，对婆婆孝順，对丈夫体贴，对子女慈爱，对鄰舍和睦、融洽，广宁坎街上沒有不夸奖的。所以撫育出来的孩子們，都是聪明、大方而能干。日本侵占中国时，俊恒正在小学讀書。他当时和一些小同学们普遍的存在不願做亡国奴和对日本人仇恨的心理。抗战初期；二十九軍前綫杀敌、平型关大捷，……对当时小学生們都有着鼓舞和深刻的影响。小朋友们做游戏也是“打日本”。

俊恒的父亲經常教育俊恒要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一天，父亲从工厂回家，在街上看到日本人給中国小孩糖果吃，沒

出息的孩子貪饑地接受了。他沒辦法去攔阻。回到家還一直在生氣。氣得把喝水的杯子摔碎在地下。一次，俊恒從學校回家，告訴父親：同學劉玉珍大罵日本人。父親連口稱贊：“好，好！這孩子有骨氣！”……這些，都自然而然地給俊恒一些影響。

家里常有工人叔叔大爺來串門，在他們那種爽朗、誠摯、大公無私的氣質影響下，俊恒成長起來。

他在小學畢業后就到發電廠做工了。這個少年工人，像他父親年輕時一樣的聰明而且求知欲很強。他在做工之余，也像他父親似的，從來沒有耍過錢，却自修數、理等自然科學，還找了個懂古文的老先生，教他古文。他在工人當中，喜歡和席長勝、劉玉珍、王治江、馮煥文、劉同林……等單純、勇敢的青年接近。

抗戰初期，從山西來了一位姓高的工人，帶來一些進步歌曲，如義勇軍進行曲、救亡進行曲、松花江上、大刀進行曲……。這些新歌曲非常吸引王俊恒和他的青年伙伴們。1942年，他父親和朱桂湘、劉同林、王治江等一些人被捕，俊恒的祖母、母親離開石景山，他留在工廠，受盡凍餓之苦，但他那顆像火似的追求知識、追求進步的心，絲毫沒有冷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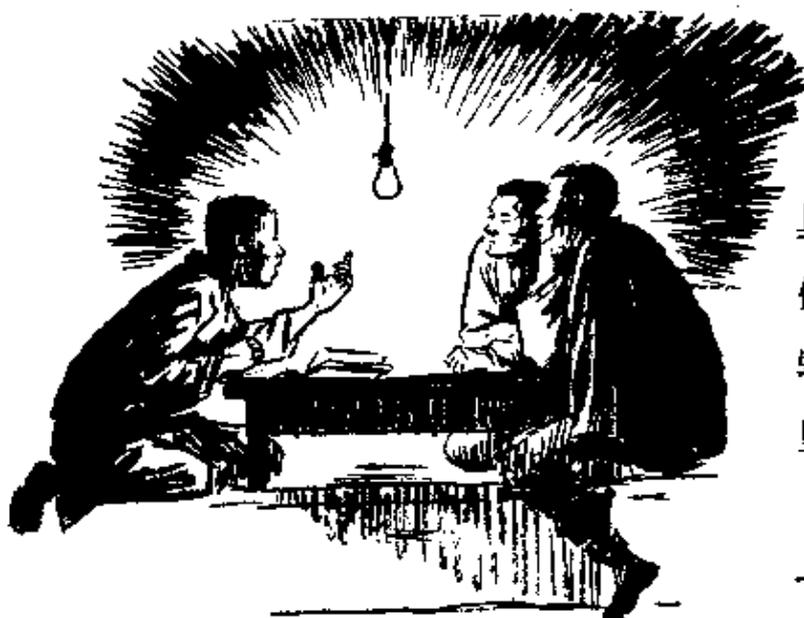
劉同林、王治江從獄里釋放出來以後，俊恒和他們很好，常在一起。這幾位青年雖有共同追求進步的心，但是找不到這樣的組織。不過，青年人真是勇敢的，富於創造性的。他們三人，商量着自發地組織了一個“共產黨小組”。這個小組上邊沒人領導，下邊也無人聯繫。就是他們三個人，孤零零的一個小島嶼。秘密地進行了將近二年的活動。他們自覺地

进行自我教育和做些合乎革命要求的工作。他们本来还想发展组织，但经过三人慎重讨论，没有通过准备发展的对象。

他们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和两年来做了些什么呢？

开始是刘同林的倡议，王俊恒和王治江立刻拥护。刘是冀中新安县人，抗战开始他才十四、五岁，从家里跑出来参加了八路军。当小宣传员，跟着文工团唱歌、贴标语……向群众进行宣传工作。因为年龄小、跑路多，在敌人的残酷“扫荡”中病倒了，部队把他送回家去。那时，他舅舅在石景山发电厂职工子弟小学当校长，接他出来治病，病好了就没有叫他回去，他自己也的确没有办法去寻找队伍了。便留在厂里做工。他当宣传员时，不到入党年龄，所以没吸收他入党。可是他来到发电厂，就无论如何不能不做共产党的工作了。开始由于明显的宣传抗日救国而被捕，以后就用隐蔽的方式，和王俊恒、王治江团结在一起，自动成立了“共产党小组。”

组内制订了纪律，三人无条件遵守。定期开小组会。每



当星期六，刘同林的舅舅进城去住的时候，他舅舅的宿舍就成了他们的活动场所。外甥邀朋友到舅舅屋里是没人怀疑的。

开会程序：第一，唱国际歌（先由刘教会）；第二，

談形勢；第三，研究工作。在談形勢一項中，差不多都是刘同林講解放区、游击区的情况，八路軍打日本的故事，講延安，講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故事；还就他所能記憶的講些政治常識。这些，使那兩位十五、六岁的孩子心往神馳了。他們研究工作，就是研究周圍的人和事。誰好誰坏，思想是否进步，怎样帮助他們，怎样宣傳抗日救国道理，怎样团結青工……完了，小聲地唱几个歌曲。这也是刘同林教的。有《延安頌》《八路軍进行曲》《太行山上》……等。

他們决定要多看进步書籍。因此，王俊恒在星期天跑到东安市場旧書攤上找了很久，才找到一本《辯証唯物論》和一本普列汉諾夫著的《史的一元論》买回来，看不懂硬看。还搜罗了几本进步小說。

后来，这个小組怎样了呢？日本快投降的时候，刘同林到底找到关系去解放区了。王治江也投到解放区去，而王俊恒呢，遇上了个管倉庫的刘金山，刘金山介紹王文炳入党后不久，又介紹了俊恒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过了些时候，刘同林拐弯抹角地托人来邀他到解放区去，他也不好說清楚，还好像他对家庭恋恋不舍，不想去参加革命似的。不过，这种誤会不用耽心，早晚会解釋得开的。

二十一、八路軍二次进厂

当1942—1943年，工厂里工人們吃混合面的时候，同时也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抗战初期活躍在河北平原上的八路軍主力部队，为了保存实力准备反攻，不得不轉移到冀

西山区。平原上大部地区暂时由抗日根据地变为游击区。群众对敌斗争也变成隐蔽的方式。所以，民间流行着这样的歌谣：

八路军鑽了山啦，
崗楼頂破天啦（敌人“扫蕩”时，崗楼林立），
兒童团也不喊一、二、三啦（不操練了），
妇救会也不募捐啦，
自衛队也不站崗捉汉奸啦。

这个时期，党领导着群众咬紧牙关，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渡过最后的困难阶段。在这一时期，英雄的游击队和抗日人民創造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到1944年，我們开始反攻，局面大为变化。我們的主力部队又在平原上冲锋陷陣对敌作战了。老百姓又喜顏悅色地唱起歌谣：

八路军又下了山啦，
鬼子的崗楼直个勁的坍啦，
兒童团又喊一、二、三啦，
妇救会又募捐啦，
自衛队又站崗捉汉奸啦。

1945年夏，我們展开大反攻的时候，冀中区党委便派了一位久經鍛煉的老干部来組織解放石景山的战役。这位老干部年岁并不大，才三十来岁，上中流身材；說話帶冀中保定、

博野一帶的口音，他的名字叫杜信。人們親切地稱他老杜。原來在冀中游擊隊里當過支隊長、大隊政治委員，一直在冀中平原上堅持游擊戰爭。他們的游擊活動區域，往北就直達京西山區。1945年，他在冀中九分區工作，和石景山發電廠工人有着聯繫。其實，從1942年就通過政治通訊員掌握了電廠一些內部情況，那時的政治通訊員如韓鳳城、臧明山等曾幾次打扮成小商販和張馬尾簾的小手藝人，到石景山一帶和發電廠里做內綫工作的同志接頭。當電廠里的個別工人春節回家的時候，也對他們進行教育，講些抗日的道理。這樣，內外就通氣了。

再說，這位老杜吧。他在1945年7月上旬，從九分區來到平西檀柘寺，見到城工部的負責同志，談了談情況，交代了任務，老杜就帶上吳信章、韓鳳城……等通訊員，化裝成商人的模樣，從黃村上火車，進了北平城，這是7月13日的事情。他們住在前門外打磨廠、扁担胡同一家馬尾莊。第二天，下着雨，韓鳳城到石景山把內綫關係韓奎山（韓鳳城的叔叔，在電廠做雜工）叫到北平。

韓奎山一見老杜就說：“你們可來啦！我們早等急了！”

於是，他們很興奮地談着情況、計劃……。第二天，他們就坐火車到石景山來了。

跟老杜同志一同到石景山來的一共有五個人，分散開住下。老杜住在劉家大院，和內綫關係郭棟臣在一起，便開始審查關係，交換情況。過了一兩天，老杜在復隆居飯鋪和“警備隊”（敵偽駐廠武裝人員）的少數隊員和一位龐班長見了面，老杜請他們吃了一頓。

石景山是工業區，發電廠和鋼鐵廠的工人很多，來幾個陌生人不怎么顯眼。沒人問便罷，有人問就說投奔親友來找事的，也就混過去了。再說，把電廠警備隊班長龐雲祥拉成外圍關係，就更保險和吃得開了。出入工廠，一說是龐班長的朋友，誰還盤問呢？

這一時期，老杜他們緊張地做着一系列的戰鬥準備工作。對警備隊的幾個“關係”進行教育：“你們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做的是光榮的‘無名英雄’……”對工人中的“關係”，布置力量，準備行動。

就要行動的時候，“八·一五”日本投降了。但日寇不向人民的軍隊繳械，因此戰鬥還要進行。8月20日前後，一天上午，老杜在小飯鋪里遇上個熟人，便邀他一起喝了幾兩白干。喝完了以後說：“咱躍彎去吧？”“好。”他倆便出了西街口，到車站一帶，老杜一面應付着和熟人談話，同時偵察着地形。他們順着火車道向東走，躍到碑兒嶺，鋼鐵廠小西門，回來看了看黑山頭，偵察地形的任務完成了。

下午，老杜又叫龐班長領進廠里觀察一番。韓奎山負責調查周圍崗樓的布置情況；哪兒是倉庫，哪兒駐着多少敵人……

第二天，他們到西邊大峪村，跟人民解放軍的503團的團長、政委、參謀們研究作戰計劃；確定第一營歸老杜指揮，主攻電廠；二營封鎖車站和鋼鐵廠；三營封鎖門頭溝、大圈（地名）方面。

老杜的第一營的第一連直接沖電廠大樓，二連拿倉庫，三連拿西邊幾個崗樓。突擊總指揮是老杜和團長。指揮地點，在石景山下溝口。

老杜帶來的通訊員吳信章和原警備隊的崔小个子領着一連突擊大樓，韓奎山領着二連，韓鳳城、王尙槐領着三連。方案肯定，就在8月24日晚上動手。

天剛擦黑，部隊就集合在麻峪小學校里。先召開排長以上的幹部會，下達戰鬥命令，做了戰鬥動員，把分工做向導的同志介紹給各連認識，又向士兵弟兄們講解了防電常識……然後，休息、準備。夜12點，部隊開始運動。大峪到電廠不過三里路。吳信章和崔小个子身穿工人服，手拿盒子槍，前頭引路，後面緊隨着士兵弟兄們。這時，夜色茫茫，星光閃閃，村莊寂靜無聲，大地已沉沉入睡了。只有這支默默不語然而懷着緊張興奮心情的壯士們，邁着敏捷輕悄的步伐前進着。他們走出麻峪不遠，向東望去，就看見天幕底下復蓋着黑魘魘的石景山，在山腳處從電廠大樓的窗子里透出鬼火一樣的光亮。還隱約聽到機器的嗚隆嗚隆的呻吟聲。

他們走在田間小道上，露水打濕了戰士們的雙腳；他們穿過青紗帳幕，庄稼剌刺着戰士們的頭臉。他們半點也顧不上這些，一心向前行進。他們淌過渾濁的永定河激流，就接近目的地了。

崔小个子、吳信章等帶着尖兵連前進，遇上推爐灰的工人們，彼此輕輕打个招呼，就跟着爐灰車子向廠子逼近。在入口處，手槍逼住站崗的偽軍：“別動，繳槍不殺！”便把他帶到河套，捆綁起來，先擱在那裡。機關槍放在爐灰車子上，“咕嚕咕嚕”地推進了西門。

另外，拿崗樓的三連戰士，由韓鳳城、王尙槐領着，到接近電網的時候，王尙槐輕而易舉的把銅絲向電網上一搭，然

后把另一头接地，电網上立刻就沒有电了，壯士們迅速地破網冲入。

当战士們陸續进厂的时候，三楼上的警备队有人發觉不对，正要向下面扔手榴彈，却被我們的“关系”李成友攔住，說：“你怎么知道是八路軍？就算是，哼，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不願意活着啦？我反正不敢打。”一席話，說的那人沒敢行动。

战士們已經冲到三楼，便吹起冲锋号。这时，石景山上的日本兵下来搶夺大楼了。我們的机关槍就安放在大楼下面，冲着大門口扫射起来，消灭了日本鬼子一排人，其余的頂了回去。我們的一班長牺牲了。另有几个弟兄挂了花。

我們把三楼的警备队的人、槍都帶走。周圍的崗楼也像熟透了的瓜果，一摘就掉了。

“我是王尙槐呀。弟兄們，都下来吧！”

事前工作都做得很透。崗楼上的人們都等急啦。一叫，就“唏哩呼嚕”地下来了。

夜里兩点鐘，我們完成了战斗任务，撤回三家店，休息去了。对俘擄的敌伪人員，进行教育，有的釋放，有的收留。一場战斗告一段落。

第二天，战斗任务改变为攻打另外的地方去了。

二十二、日本鬼最后投降

自从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以后，直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在八年的淪陷期間里，这里的人民陷在水深

火热之中，在敌人鞭子下干活，挣到的口粮是混合面。

人们是怎样干活的呢？上工叫做“磨洋”（“磨洋工”的简称），工人们对于生产工具没有感情只有仇恨，没有爱护只有破坏。有的人向厂子里走着的时候，一抬头看见黑黢黢的机器房，心里就发紧，头皮就发炸。恨不得用大炮轰平了它。好像是它使得工人度着受罪挨饿的日子，好像它吸吮着人们的血汗、消耗着人们的青春年华。

有的老工人在这里卖一辈子力气，结果落个冻饿而死，连口棺材钱都没有剩下。老实的技工掌握了一手好技术，还不是拿洋灰袋子纸做衣穿，依靠女儿拣煤核过日子？……

但是，这样的年月终于过去了。当1942—1943年，工人家属剥光了小榆树，摘净了小酸枣的时候，村里就有老者低声安慰她们：“熬着吧！吃着野草也能把鬼子熬走的！”这话不是应验了吗？

人们知道，从日寇进攻中国以后，人民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各地游击队……就没有一天停止过对日作战。离石景山不远，就是平西抗日根据地；过永定河二里就有八路军游击队。抗战的第二年，就袭击了发电厂，俘掳去日本鬼子和警备队。人们还知道，除了一些城市和狭窄的铁路交通线以外，广大地区掌握在根据地人民政权的手里。在这许多事实下面，人民有信心，早晚会把日寇赶出中国去的！

1945年5月，苏联红军打垮了德国法西斯；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了。红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四路攻入日寇战略基地——中国东北三省。8月10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宣

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向所有解放区军队发布命令，发动了反攻的大进军，进击日寇控制的各个城市与交通线。自称百万精锐的日寇关东军，被苏联红军短短的几天就击溃；14日，日寇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当报纸上、无线电广播里，报告着日寇投降的消息的时候，全中国几亿人民的兴奋和欢跃的情形，是可以想像的。强盗们呢？在石景山电厂北宿舍，他们住的大院里，无线电刚刚广播完了这个消息之后，一群日本男女，连小孩子都跪在无线电前面哭泣起来——好像向无线电祈求什么似的。在这院里做杂工的一个青年没有听到广播，看见这种情形，还以为是日本的风俗，也许过什么奇怪的节日呢。

过了一会，才知道是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当这位青年杂工快乐得跳起来，跑出去告诉别人的时候，全厂工人都已经在激动的狂欢中，把使人兴奋的消息互相传告着。

至于，是不是工人弟兄们从此就翻了一个身，还是又遇到什么曲折，那等以后再仔细谈吧。

二十三、来了接收大员

抗战胜利，举国欢腾。八年来（人生有几个八年！）压抑、焦愁的心情，可以舒展、昂扬起来了！留在主人家的强盗们像圆滚滚的皮球忽然跑了气一般，一下子蔫瘪了。原来耀武扬威、要人们向他敬礼、称太君的家伙，这会儿低了头，见了工人们的时候连大气也不敢喘了。广宁坟村的人们，有工人、有家属，男女老少走上街头，到敌人的仓库——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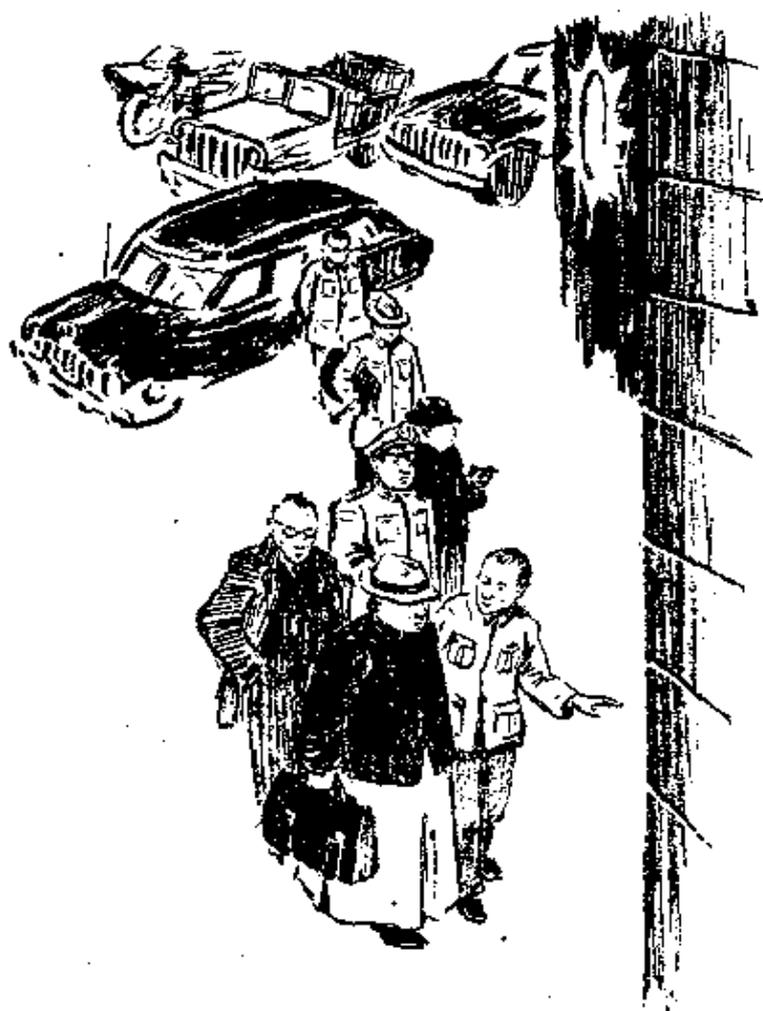
該叫做“駐庫”，八年來強盜們搶劫中國人民的財物是無法計算的，有一部分就貯藏在這座庫房里，把鐵絲網砍斷，大門敲開，積壘如山的洋面、大米和別的糧食，家庭用具……都分散開，使它們物歸原主吧。還有的人跑到北宿舍鬼子的住室，把一些家三伙四拿回家去，這些原來都是中國人民的財產，那裡的鬼子家屬正趕忙着向北平城內搬家。“強盜們！滾你媽的蛋吧！把這些床鋪、桌椅、火爐子、窗簾……都留下，留給它們的主人用！”

發電廠的牆壁上，貼着大布告，是解放軍延安總部朱德總司令命令日軍繳械的布告。人民興奮的站在那裡朗讀着，內心慶幸中國人民抗戰的最後勝利。

但是，出乎人們意料的事情發生了。日本雖然宣布無條件投降，但拒絕向中國人民軍隊繳械。聲稱他們的上級有指示：國民黨政府委派他們暫時管理，等候國民黨來人接收。這就奇怪了，工人們議論紛紛：誰不知道，從日寇進攻中國以後，人民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就沒有有一天停止過對敵作戰！石景山往西不遠就是平西抗日根據地。抗戰第二年，游擊隊襲擊過發電廠。誰不知道，僅僅占據一些城市和鐵路交通綫的日寇，幾年來被英雄的人民軍隊所包圍！怎麼，今天抗戰勝利了，卻拒絕向難苦奮戰八年的人民軍隊繳械，而等待什麼國民黨？北方的老百姓從來沒有聽說，更沒見過國民黨抗日啊！這裡有着什麼名堂？

工人們，市民們，越來看越清楚。“熱心”的美國人用大量飛機載運着國民黨大員和軍隊到北方來。他們在城市進行接收——人們稱之為劫搜（搶劫搜刮）工作。他們為

了爭奪洋樓、汽車、金條甚至于小老婆而爭吵斗毆，常常像狗咬狗似地打起架來。北平公用汽車管理局被劫搜後，公用的變成私有的了。人們看到這些，剛剛喘口大氣的心情又緊縮起來，又疑慮起來。不過，“到底還是中國同胞啊！”人們用善良的心情，等待來接管企業的人們。來了，為首的姓葛，給人們的第一個印象仍是耀武揚威、高高在上。葛是“資源委員會”的委員。到石景山來的這一天，國民黨的爪牙們叫廠里好多工人停下工作。黃土墊道，淨水潑街，像迎接皇上一樣。儘可能穿乾淨些的衣服；穿得破爛的趕到爐灰道里去躲避。“去吧，去吧！你們這些神頭鬼臉的推爐灰的，到



爐灰道里去吧！”管事人這樣驅趕着人們。

葛大員站在電台前面木頭箱子上講了一頓話。話里給人們一些“甜頭”，許下些空頭支票。譬如：大家要好好工作，生活很快的能提高，我們要建設工業新國家……一類好聽的話。人們是

“姑妄听之”罢了。葛大員走后，跟随来的留下担任工作。这些人們自然和“凡人”不同，而是高人一等的人。他們穿着長袍短褂，挺胸鼓腹。天天轉轉磨磨、指指点点，看不起多年留在淪陷区受苦的职工們。工人們称他們为“躍达工程师”。

国民党接收人員对职工說話，常常帶一股傲气：你們淪陷区的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这些职工的罪过，而日本投降則是他們的功劳似的。听話的人心里真不是味兒。

国民党把过去的汉奸队改編成什么“先遣軍”以对付共产党和人民解放軍。抗战期間躲避到遙远的南方的国民党軍隊开过許多来。哪里像个战胜国的士兵样子，一个个都灰溜溜的，紀律極坏；在街上随便串游，見什么拿什么。向小鋪或攤販强行賒賬，跟他們要錢，就“啪”一个嘴巴：“老子抗战八年，拿你这点东西还要錢！”他們經常把發电厂的煤炭弄去燒火做飯，还偷着运出去卖錢。打罵侮辱工人和老百姓是常事。一次，在溝口，一个国民党兵換崗回来走过那里，遇上汽机場的一个老工人大便，过去大喝一声：“誰叫你在这兒屙屎？”上去就是一槍托子。

“發电厂院里沒有厕所呀，老总！”

“不行，弄掉！”

老工人預备找鉄鍬除掉的时候，他硬逼着叫他用手捧起来。

后来，胡宗南的队伍来了，工人們不敢到澡塘洗澡了。因为那些軍隊里有很多患梅毒病的，澡塘里药棉紗布扔了滿

地。

他們改編的“先遣隊”，軍官大量吃空額，遇有什麼檢閱點名的時候，強拉些工人們來穿一會兒軍裝頂頂數兒。“來吧，來吧！老趙、宋師傅……來幫幫忙！”不幫忙還不行。職工和老百姓們看到這些國民黨大員和軍隊的行為，心裡就又冷了半截、怒火慢慢升起了。

二十四、壞了五號汽機

國民黨內部有很多派系，像什麼西山會議派啦，政學系啦，C.C派啦……派系十分繁雜，名堂不一而足。“八·一五”以後，接管經濟部門的“資源委員會”，據說是屬於政學系系統的，他們與C.C派矛盾很大。資委會下面設有電業處，電業處下有冀北電力公司，再下面有北平分公司。石景山發電廠改稱發電所，屬於冀北電力公司北平分公司管轄。就是這個發電所，在它的主要負責人方面，也分成好幾個派別。“七七”抗日戰爭前修建的老廠負責人石明俊副主任和工務課長杜某、維護股長王某屬於老派；日本統治時來廠的毛文倫、湯其新等另屬一派；日本投降後隨國民黨來接收的所主任陳康、總工程師方宗文、工務員丁敬忱、張強等屬於新派。這三派在廠里爭權奪勢，互相排擠傾軋。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接觸中，新派常常露出藐視老派的神氣，因為老派是曾經給敵人做過事的。老派對新派也不服氣，因為自己覺得守着這個破爛攤子辛辛苦苦多少年了，發電技術方面也摸出些經驗來，新派一來就指手劃腳，他們心裡不舒服。一些具有進步思想的職

工，看透了他們这些勾心斗角的勾当，有机会也就利用一下。比如，老派抓黄色工会的时候，几个进步的职工要建立职工圖書館和俱乐部，找新派去商量，就比较容易得到允許。最突出的事件，是一次停电事故，集中地表现了工人与厂方、新派与老派之間的矛盾。

那是这么回事：五号机是15000瓩的大發电机，在当时是一部主力机。因为日本投降前安裝的六号机和一般的汽机構造不同，質量又差，是当做試制品出产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們很难摸准它的性能和規律。从来沒有达到过規定的發电能力；平常情况下是开三个月就得停半年。人們对六号机是毫無信心的。这一次，六号机正停着，三号机早几天也出了毛病；只有四、五号机發电。这一晚，正在高負荷的时候，电压忽然沒有了，造成大停电，北平城拉了四分之三的綫路。用电戶着急、罵街，發电所的头兒們抓了瞎。

所主任陈康和总工程师方宗文圍着五号机轉来轉去，跟着干活的摸摸这、摸摸那，反正是發不了电。方宗文等認為是殘余励磁机的問題，主張用干电池冲，白鬧了一陣子还是不行。怎么啦，这个發电机真奇怪，不是成心跟接收不久的国民党大員鬧别扭嗎？

一来二去，折騰了九天沒有修好。陈康、方宗文等只得“不恥下問”，征求老派人物的意見了。老派工务課課長杜进华心里早就有个数兒，因为他們不求他，他也就不湊前，越是沉住气，結果“威信”就会提得越高啊！

杜进华心里有什么数呢？他会修机嗎？不，他还差得远。不过他了解哪些工人是有把握的。于是，杜进华就說：“好吧，

看我們吧！”

杜进华找到电气工人王俊恒、吳洪茂等几个人商量了一下。王、吳回答的很干脆：“下午3点鐘可以發電。”原来这几位青年工人，在已离开厂子的老师傅李玉庭手下干了几年活，电气活兒摸得相当熟了。当这次五号机發生事故的时候，他們就看出是励磁机断綫的毛病，修理起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但是陈康、方宗文們一开始就沒有把小工們看在眼里，把他們撥拉到一边去干别的活兒。青工們呢，在那种情况下，当然用不着向前湊合。借着这样一个好的机会，讓新主任和总工程师露露臉兒和較量較量本事不好嗎？

既然他們表示了束手無策，又有杜課長謙恭下土地一番邀請，王俊恒和吳洪茂等就出来了。一来二去，只是半天的工夫，他們修好了“一万五”，讓北平城四分之三黑灯九天的地区又有了灯亮兒。这一下，有人抖起来了。誰？杜进华！

从此，职工們送給总工程师一个綽号，叫“飯桶”。

从此，五号机吓跑了陈康。也許还有別的原因，反正就在五号机事件發生后不久，陈就离职了。

二十五、怠工运动

总工程师方宗文自从落了个“飯桶”綽号以后，就升为副主任了。从东北調来一位叫于永江的担任总工程师的职务。他在工人面前也鬧过几次笑話。最突出的一次是找动平衡，他算来算去，多算了几公斤(!)疇，这一下子差点出了大乱子。

这些主任、工程师、課長之类的人物，技术虽然不怎么高明，但是待遇却非常优厚。他們住在北宿舍——就是抗战前史四佳的、抗战后日本人住的宅院；家眷在北平城内。到星期六，一过中午就用汽車分头送进城去，星期一快到中午时再分头接了回来，此外还可以报銷一天的旅費。他們在北厂小食堂吃飯，先吃后拿錢，就是說这个月吃了下月再掏錢。在那物价一日三漲的时期，所交一月的飯費也許頂上本月一兩天的飯錢，几乎等于白吃。厂方对待这些大头子們如此，对待工人們呢，和过去一样，还是十分苛薄，为了通过工头兒巩固他們的統治，不惜以許多花样和名堂来收买工头。給他們“准職員”的名义，使他們有当職員的盼头；还發給每人一件短大衣穿……諸如此类的福利还有一些，来分化工人的队伍。

工人們亲眼看到和亲身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腐敗政治的惡果，对内压制民主，發动內战；对外执行亲美、媚美外交，蒋介石曾作美国的兒皇帝。国民党統治区，差不多就变成美国殖民地一样了。美国兵横行霸道，在北平竟發生侮辱女学生沈崇的事件；美国吉普車撞死中国人的事層出不穷。国民党反动派和他們的主子美帝国主义者繼日本之后，进一步地压榨和掠夺人民。另一方面；在解放区，那里是另外一个世界，人民过着自由民主的生活，在建設着幸福的社会。这些情况，这个鮮明的对比，工人們虽然不是都很清楚明白，但国民党的爪牙們也沒有办法完全封鎖住消息，蒙蔽住大家的耳目。在这种形势下面，人民何去何从，心里多少有些打算。工人們在生产中出現了一种主要的斗争形式——怠工。当时

人們稱做磨洋工。以促使國民黨反動派最早的垮台。

怠工的办法可以說是多种多样。比如修理厂，大伙在一个大屋子里干活，上班就是閑聊天，講故事，說笑話。机器似轉不轉，很多時候，就讓全部机器休息了。門口設个放哨的，有什么主任、課長之類來的時候，放哨的伙計喊一聲，机器立刻轉動，等巡視的走了之後，机器又停了下來。後來竟發展到上班蓋蓋圖章就溜走了。青工劉玉珍、崔登林上班後却溜走替家里趕毛驢去了。頭兒們对一些工人，再也不敢吹鬍子瞪眼睛。兩個推煤工從北廠向南廠抬東西，僅僅隔一條鐵道，一趟就用它半天的工夫。起重工的把頭想干涉一下，推煤工陸增珍抽出大杠子來耍揍這個把頭。廠里的事故天天出。北平的电燈天天暗。工人們處理事故也不徹底，完了打電話寫加班。做壞了活兒就“貼膏藥”，後果如何也不去管它。

在這時候，工人們很苦悶，一般工人既不想學習文化，又不想鑽研技術，沒有事干，宁可耍錢。賭博風氣盛行。上了班一樣賭。不賭錢的回到上古時代的漁、獵生活。工人王志邦、秦煥彰、李建寶……一些小伙子們，要是上夜班，白天就出去打獵。一出去就是一天。到八大處、饅頭山、紅山口、老山、一溜邊山府……哪兒都去。打些兔子、斑鳩、狐狸、地鷄。有個時期，兴起釣魚的風氣。下了班，吃點東西，拿起吊竿，忙忙迭迭地就走了。在水池子邊上一坐老半天。困了到上班以後再打盹睡覺。連修理廠的老師傅張玉庭也對釣魚上了癮頭。

職員中間，赤心“報國”積極生產的也極少見。外號叫常不管的老職員常進安，真是什麼事也不管。他愛喝酒、打太

極拳、写打油詩。鍋爐灭了火他也不着急。

“爐条不轉啦！”司爐告訴他。

“不轉就不轉吧。”

“火停啦！”

“停了吧。”

剛剛大學畢業出來不久的技術人員李昌溪，看起來很精神。一來很積極負責，看來是想干一番事業的樣子。但是過了些日子，環境使他消極下來。變成個少年老成的“老鳶兒”而且“涵養性”大到這種程度，着了火也不着急。當有人告訴他“着火啦”的時候，他用他那東北口音重復一句說：“四（是）着火了嗎？”

他老是愛站在一個地處不動，或者不快不慢地撓他腿上那塊長年不愈的干癬。他對工人們很好，人們親切地給他起了個外號叫‘棍兒哥’。就是因為他常常站得像棍兒似的不動彈。

黃色工會的頭兒們借全體工人名義弄了糧食來私分；煤場上掌秤的職員又置宅子又買地，還扎上嗎啡針。駱駝馱煤來一麻袋，過兩回秤。關來關去，够燒一年的煤（多大的數字！）都查不出賬來了。

事故無數，常常電死人。停電更是常事。北平市民管發電廠叫‘黑暗公司’。工人們用幾句簡單的語言，道出這裡的情況：

高壓爐火滅啦，

機器停啦，

值長睡啦，

北平灯暗啦！

人們生活得不到保障，怎么能来勁！国民党来了不久，物价又上漲了，生活水平自然下降。老工人們回忆起1942—1943年来，就会心惊肉跳，飯都吃不下去了。每次吃飯像应付差事似的，未曾端碗先嘆气：“咳，吃飯啦！”（拉着長声）什么味兒不去想，先想够不够吃。

發工資的时候，大伙都搶先去領，領完跑着去买东西。排头和排尾买东西的价錢已經差了許多。开始發工資叫手拿，到后期，国民党快崩潰的时候，用洋面袋子裝，几个人一塊領就用大筐抬。鈔票像爛紙一样的不值錢了。賭局上这样叫喊着：“我下这半斤的！”（鈔票用秤称起来）

“完了，快完蛋了！”职工和老百姓就是这样詛咒他們，預測时局。

二十六、进步歌声

1946年春，国际工联要来中国參觀。当时世界上有兩個国际工会組織，这里指的是反动的“工联”。北平市政府要石景山發电所在国际工联来參觀之前組織起工会来。發电所負責人便叫在青年工人当中推出几个人做筹备工作。当时推出的代表有这么几个人：蔣甫成、王俊恒、苗立田、李林杏、張景先……等。

市里發下来会章草案。在王俊恒、張开成等倡議和坚持下，把会章修改了几条。主要的修改是把关于發电所主任和職員入会的一条，改成他們有入会权，沒有选举与被选权（免得

被他們把持了工会)。

还修改了几条别的，即印發給工人們。

快到选举的日子，群众在下边醞釀，准备选張、王等领导工会。但是到选举的前一、二天，張、王都走了。原来是这样一回事：張开成是有意躲回家去的。因为他从被捕出来以后，觉得自己目标突出，只願做些实际工作，不願出面领导。而王俊恒呢，正赶上有件要紧的事情，非离开厂子不行（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調王俊恒到固安县城北一个小村里彙报工作）。

就在5月10日那一天，进行选举了。張景先主持的选举会。一来二去就选上了張景先当理事長，理事当中有李林杏、曹根鈞……人。人們内心对張开成、王俊恒不在場是有意見的，然而，王俊恒回来也沒法解釋。

过了几天，張、王回来之后，工会领导机构早已选定。但是工会干部还没有补充齐备。俊恒便設法介紹了一些进步工人到黄色工会里去工作：席長胜做福利干事，包信忠做文娱干事（兼管俱乐部），高紀林做衛生干事……在很短的时間内，工厂的文娛活动开展起来了。成立了歌咏队、話剧团、京剧团……組織。参加活动的包括不少的进步工人：如王俊恒、席長胜、包信忠、刘玉珍、夏保毅、李建宝……；也有国民党党员参加。他們都跟着唱《黄河大合唱》《矿工曲》《伏尔加船夫曲》……进步歌曲，演出責罵国民党的話剧。

就这样，黄色工会实际上被进步力量所掌握。張景先、曹根鈞、赵富庸之流，也就是过一过当官兒的癮（什么理事長、理事之类），出一出風头而已。

当时，技术人员没有参加工会，但是有几位技术人员在进步的工运当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1946年10月底，一批大学生到石景山厂来做实习员（实习半年后转为工务员）。其中有一位叫沈基才的，是厦门大学电机系毕业的学生。他在学校时就参加些爱国活动；来到石景山，当然不甘心生活在技术人员那种沉闷的圈子和窒息的空气中。他为了探寻革命组织，为了团结和联系周围的技术人员，为了接近工人，想了一些办法，进行了一些活动。

沈基才来厂后一个多月，就打算先在技术人员当中建立一个互相联系的组织。于是，1946年12月中旬，在技术人员中传阅着这个组织的发起书，征求签名。发起书是这样写的：

Turbine Club(透平俱乐部)发起书

“有人初到北京的，不久便说，我似乎住在沙漠里了。

是的，沙漠在这里。”

但我们希望就在这沙漠里栽下一根绿草，或许到明年春天，蔓生成一片青绿的草地。我们倘若能呼吸一点有生命的气息，该是件多么愉快的事！

我们深刻地感到工作的余暇太过于沉寂与枯燥，我们奈不住如此的气息，扯起嗓子，我们不自禁的要喊着：“打破沉寂的空气。”

打破沉寂的空气，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设法，来推动我们之间的团体活动，Turbine Club（透平俱乐部）的目的，如是而已。

重復一遍說：Turbine Club的目的，在聯絡同人感情，在交換同人知識，在促進同人的福利。

來罷，我們伸出手，簽名。

12月17日晚，透平俱樂部開了成立會，20多位實習員都參加了這個組織。在成立會上推選出干事五人，組織干事會。沈基才在干事會里分工負責學術，他借此名義便把一些進步書刊如《文萃》、《民主》、《文匯》、《經濟通訊》、《理論與現實》等展覽于職員大飯廳內（當時沒有圖書館或閱覽室），以供同事們交換閱讀。工廠的頭兒們由于糾纏在新舊派系斗爭中，無暇顧及俱樂部的活動。黃色工會的理事們也沒有注意這些。

不過，這個俱樂部的活動，還只是在技術人員當中，因為工人很少到北廠職員宿舍來。沈基才等便設法打破這個圈子，在他們實習期滿轉為工務員時，有幾個實習員要求下現場工作以便有接近工人的機會。他們到工人家里進行訪問，慢慢熟悉了一些工人。沈基才被留在工務課工作。他幫助行政上成立一個圖書館。讓工務課的另外一位技術員吳統光兼任館長，沈任副館長。他們到城內“朝華”書店買來大批書刊，包括不少的世界名著和蘇聯小說。號召工人前來借閱。當時便發現了工人王俊恒、苗立田、繆克禮等常來看書，就這樣認識了他們。在敵偽和國民黨統治時代，資本家或其他統治者們是不把工人當做人看待的，在技術人員和工人當中有意識地製造一道鴻溝，使其互相仇視，就這個廠子來說，他們的活動可以算做打破傳統舊習慣、溝通職員與工人中間的



联系的一个开端了。

沈基才与王俊恒商量着召开一次“讀者座談会”，召集了常來圖書館借閱書刊的几个人：除王俊恒外尚有苗立田、繆克禮、韓子修等人參加。以後，王俊恒邀沈基才、邱玉民二人到工會福利部辦的工人業餘補習班教課，並參加領導歌咏隊和壁報工作。

當時歌咏隊的活動很經常、很活躍，每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晚上，隊員們就集合在職員宿舍，少者十四、五個人，多時到達二、三十個人。王俊恒負責联系、召集等一套組織工作，沈基才負責選印歌篇和教唱。當時積極參加者有劉玉珍、夏保毅、席長勝、李建寶、沈佩良、李林柏、李良亭、繆克禮……人。除了上邊提到的《黃河大合唱》《礦工曲》之外，還學過《大刀進行曲》《松花江》……一些進步歌曲。在唱歌之餘就天南海北的聊天，這樣一直堅持到快解放的時候。

這一個時期，老工人王文炳沒有參加工會工作。黨給他的指示是積極鑽研業務，向掌握全面發電技術方面努力。另外，團結一部分職工群眾，個別的發展黨員。——黨的這些指示和企望，他做得很好。在鑽研業務方面，他已經提高為工程師的水平了。日本投降後，國民黨來接收時，沒有帶來多

少技術人員，不得不在技工當中提拔一些做助理工程師。王文炳就是當時被提升的一個。他當了助理工程師，負責檢修股的工作。

在團結職工方面，他做得同樣好。對一些家庭有困難的工人，他首先出來幫助。他的群眾關係很好，威信很高。提起王文炳，人人伸大拇指。他也很會對付敵人，工作又做得很巧妙，因此，連張景先也鬧不清他是什麼人，有一次，張景先還向國民黨區黨部保證：“王文炳是好人！他的什麼事我都知道。”王文炳聽了這話，心裡說：“什麼你都知道？我是共產黨員你就不知道。”

張景先在區黨部開會回來，把他們要逮捕誰們的黑名單子叫王文炳看，他是那樣信任這位四十多歲的老好人。因而，後來在嚴酷的白色恐怖下，文炳同志的確沾了張景先這個“好”防空洞的光了。

二十七、《陞官圖》沒有演出

在日寇統治時，發電廠里共產黨的組織遭到破壞，但是，正如那句名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所說的一樣，很快地又有了黨的組織。在國民黨統治的幾年中（1945——1948年）雖然也抓人，但真正的共產黨員，他們一個也沒有抓到。這些人和他們居住得很近，甚至住同屋；上下班走一個大門，甚至在一塊工作。

倒是有一次，幾乎抓到一位共產黨員的關係（尚未入黨），然而逃掉了。這個人叫張利明，安平縣人，二十多歲，

在鍋爐場当司爐。他和汽機場五号机凝結器的司机郭棟臣是同乡，也是朋友。郭棟臣是共产党员，1945年8月杜信同志率領503团攻打發电厂的战役，郭棟臣、張利明就参与了战役的整个計劃工作。当时，党确定不使郭棟臣、張利明暴露，繼續留在电厂工作。但是1946年1月間，又把郭棟臣抽出去，到解放区工作去了。在他走前，囑咐張利明說：“我走啦，今后你要提高警惕。”

郭棟臣原来和韓奎山、韓鳳城等人接近，1945年8月23那一战，二韓率領着八路軍进厂，而且参加了战斗，公开了身份，战役过后便随軍隊撤走，到解放区工作去了。因此，郭棟臣和張利明在电厂里有些暴露了。郭棟臣一走，張利明的身份就更明显了些。



在这以前不久，發电厂来了兩個国民党特务。一个穿着大衣，一个穿着長袍，戴着礼帽、圍脖，腰里別的手槍就露在外面。这倆家伙，經常坐在大門口看着工人上下班。眼睛滴溜滴溜地察顏觀色。他們倒是不去机器房里乱轉。

可是，这一天，他們破例到机器房里了。1月27号（郭棟臣走了不久），張利明上前夜班，下午7点

多鐘，打更的老工人白得福領着那兩個特務到高压爐。看了看張利明在。問了句：“杜進華課長沒上這里來啊？”就叫白得福領着去值長室找杜課長（工務課課長）。過一會兒，值長室的雜役于學明出來找張利明了。“張利明，值長室里有人找你，叫你快去。”

老張這時非常機警，腦子轉得很快，他想起郭棟臣臨走以前囑咐他的話“要提高警惕！”知道這倆傢伙叫他去沒有好事儿，就編了一句巧妙的謊話，對那雜役說：“哎，我就去。等我拿棉襖穿上着。”他說着，到存衣室拿棉襖的時候，繞了個彎子，趁另外一個司爐和那雜工扯閑話的工夫，老張從另外小門里躍走，下了大樓，向東南方向跑走了。他怕特務給看大門的打電話攔住他，便不走大門，繞到石景山根底，用木板子翹着電網，冒着生命危險，仰身鑽了出去，連夜逃往北平，第二天清早坐上火車，回安平老家去，不久就在農村正式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到華北局城工部，為準備解放北平而工作了。

除了這一次，還抓過人。抓過一個小買賣人，賣布頭兒的。這是在1947年國民黨大批發展黨員，成立了一些特務組織之後干的事。1947年，國民黨在工廠里早已公開了。區黨部總負責人王順清就是發電廠的一個職員。他們宣傳電廠要大批裁減人員，号召職工參加國民黨。絕大部分職工不信這一套，他們就用利誘、欺騙和威吓，用拉夫的方式拉進一些人參加國民黨；個別人怕打破飯碗，就答應：“給我填個名兒吧。”有一個職員說：“我這是第四次加入國民黨了。”

不久，就發展特務組織，國民黨員曹根鈞、陸忠峰……十四個人參加了“中統”。他們在職工當中橫行霸道，為非

作歹，打人、罵人、敲詐……只要得罪了他們，就報告上去，把人抓到北平什麼警備司令部之類的特務機關里，受着折磨、摧殘，其實他們都是些普通工人。

當他們快完蛋的時候，折騰的更利害了。成立了“清共先鋒隊”“生產促進會”……名堂不一而足，實質上都是一路貨色。

這時，張景先當了國民黨的保長，曹根鈞升任黃色工會的理事長。“清共先鋒隊”里的代表人物，有一個叫李崇杰的，外號叫“蝎拉虎子”。瘦的成了一個長條了，腦瓜上老擠着紅點，個子不高，尖嘴猴腮。腰里別着手槍，看那個派頭兒吧，整天在街上幌幌悠悠。

這一天，“蝎拉虎子”在街上蹣跚，一抬頭看見一個人進了廁所。他懷疑地想：“咦，這個人怎麼一見我就躲到茅房里去了呢？有鬼！”他想着就跟进廁所去，假裝解手，偵察那人的行動。他用眼角掃見那人的胯骨上有一塊鼓鼓囊囊的，疑是手槍，立刻抽身出來。一蹿小跑，報告了當街駐的國民黨軍隊，說是有個八路軍的便衣偵探藏在廁所里。嚙，這一下子可攪亂了整個軍營和整個廣寧坎了。出動了一個連的軍隊，步槍上了刺刀，三挺機關槍，衝着公廁架起來。那個被稱為便衣偵探的人被逮捕了。弄到軍營里拷打、盤問，把一個賣布頭兒的買賣人差點折磨死。後來，實在問不出什麼，把腰包里的錢留下來，人找了北辛安的親戚做保才放走。

群眾看着這些人物和他們的所作所為，背後說：“這和鬼子在的時候有啥分別呀！長不了的！……”

但是，他們鬧騰的無論多凶，的確沒有發覺一個真正的

共產黨員呢。前面提過，保長張景先就替王文炳打過保票。

主要的原因，是共產黨的工作做得嚴密，有辦法。他們不發生橫的關係，父、子不相告。黨員們到解放後在一起開會的時候，才恍然。“原來你是啊？”“你也是啊？我早就猜到的……”

可是國民黨的特務們並沒有猜到。

共產黨當時有幾支細流，互不通氣。幾支細流，流向一方，都是做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都在群眾中有很好的影響，有很高的威信。

在黨的影響下，群眾覺悟也逐漸提高了。不知誰，在機器房的牆壁上用粉筆寫着高爾基的名句“生活像泥河一樣流，機器吃我們的肉……”在北宿舍門口發現一張大字報。內容是諷刺事務課張課長的，並附有漫畫……

上面一節談過，王俊恆、席長勝等人參加了黃色工會，他們在里面起的作用很大。團結了許多正派工人。為工人的福利事業，文娛生活進行了不少的工作。京劇團經常演出，話劇團除了演出《禁止小便》《報紙以外的事》等諷刺短劇以外，還排了《陞官圖》大型諷刺話劇。

1948年快解放的時候，廠里駐了城里來的武裝特務“人民服務隊”四、五個人，他們比張景先、曹根鈞等“精明”一些，禁止工人們再唱《黃河大合唱》等歌曲。並且建議工會不要演出“陞官圖”了。王俊恆聽到這個消息，就找了理事長曹根鈞去談。曹根鈞信服王俊恆的話，就像張景先信服王文炳一樣。這一回，曹根鈞還激動地說：“一定要上演，誰不叫演誰就是‘陞官圖’里的貪官污吏！”

“理事長”这么一發話，舞台監督王俊恒等就更積極筹备上演了。那时沒有女演員，挑了鍋爐房年輕漂亮的小伙子閻相河扮演女角。

一切准备得差不多了，正在做布景、制道具的时候，形势急轉直下，更重要的工作等待俊恒他們去做，因而《陞官圖》沒有演出，石景山就解放了。

二十八、黑山头燃燒起来

1948年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广大的东北地区，关内的形势也急轉直下。石景山是重工業区，对北平來說，是很重要的，人民解放軍某軍官說：“北平的国民党如不投降，我們去拿石景山。拿下石景山，等于去掉北平敌人的眼睛，叫他們夜里出門碰鼻子！”

1948年12月上旬的一天，曹根鈞坐在工会办公室里和他的同僚們四、五个人在談話，在議論着国家大局。曹根鈞兩手抱膝，背靠圈椅，像个領導者似的，說：“長是長不了啦，可是过年这頓餃子，反正得叫吃上。”可惜他不是預言家，時間提前了好多天。

国民党死前掙扎是很凶的。所謂“华北剿匪总部”天天来抓兵。工人們提心吊胆，一听说“来啦”，“忽啦啦”都跑到机器房里躲起来。真真假假，鬧得人心惶惶，坐臥不宁，人們盼着暴風雨的来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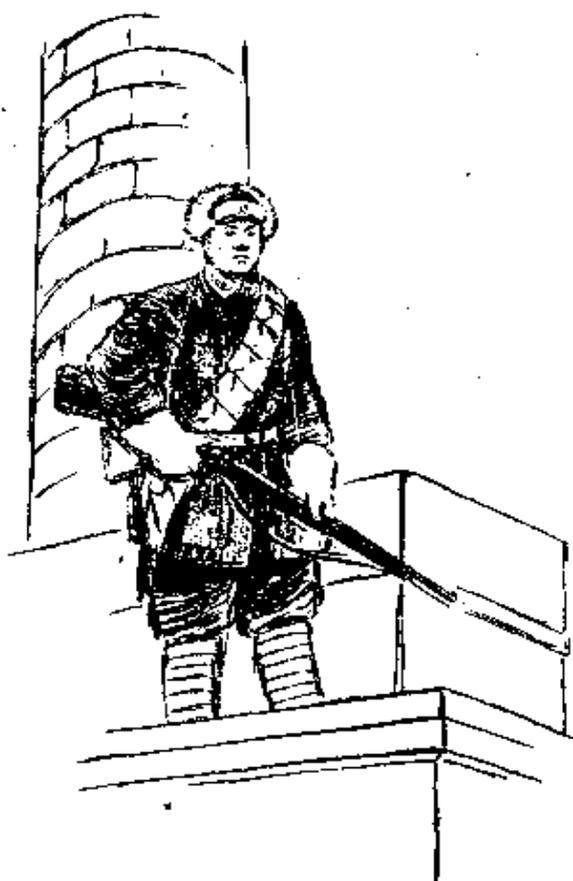
12月10日以后，北平到天津的火車不通了。領導王俊恒的党的工作者被困到天津。本来，他們商量在这几天里研究护厂

工作的。怎么办？不能等待了，王俊恒就找沈基才商量。恰好，沈基才于11日曾进城找組織联系。得到指示：迅速着手建立护厂組織，迎接解放。王俊恒与沈基才进行了研究，做了計劃。并且給几个人布置了任务：讓总务股李某把人事档案保存下来；讓繆克礼保存下現有的材料賬；王俊恒要搞到一个国民党黨員的名册；沈基才把一些机器設備圖紙保存住……这些，都是为着解放时順利接收所需要的。更重要的是讓全体职工保护住所有的机器。14日晨，沈基才找厂方負責人于永江去談，于同意組織护厂委员会，并讓沈放手去做。王俊恒找曹根鈞談，曹对于时局本来是無知的，他以为共产党来了也站不長久，所以同意王俊恒的說法：“不論国民党、共产党，誰也不能叫他破坏机器。机器是工人的飯碗子呀！”

护厂委员会組織起来了。于永江、曹根鈞担任正、副主任。沈基才、王俊恒、包信忠、席長胜、繆克礼、沈佩良、李良亭等八人担任联络工作。14日整天，緊張地工作着，写布告、發傳單，宣布消防、救护、警衛、联络各組的工作范圍和組成人員。檢查水桶、水龙帶等消防工具。号召大家好好护厂，大烟囱不能倒，机器不能坏……一直工作到深夜。

14日半夜，街上發生了情况，从保定退到門头溝、又从門头溝退来的王鳳崗的队伍和原来伪軍改編的‘黑狗子’队的一部分在街上乱搶东西，有的手表帶了兩胳膊。护厂委员会出面和国民党軍隊交涉，讓他們制止，他們也不管。一直搶到15日早晨。这时国民党的軍隊（不到一个团）已經撤到黑山头 and 石景山上面去了。厂子里只駐有十几个人。

15日上午8点多鐘，忽然听到槍声，几个穿灰色軍裝的战



士，沿着铁路，悄悄地走来，把电厂大门岗哨（国民党兵）两枪撂倒两个，石景山和黑山头上的军队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一共有八个穿灰军装的进了电厂，爬上煤粉炉大楼。他们和工人一起保护住机器。

从这以后，在铁路上或在电厂门前有个国民党士兵走过，就有一颗不知从哪里飞来的子弹，非常

准确地把他打倒在那里。工人们到吃饭的时候，就争着给楼上的八个弟兄送饭。那就是工人们称之为护厂和解放石景山有莫大功劳的解放军八勇士。

16日晨，街面上的国民党军队乱跑乱钻，口哨声，叫喊声一阵过去，街头静下来了。只是一刹那，‘轟’的一声炮响，工人们从窗户里望着高处，黑山头上冒起了万丈烟火，国民党最后的窝穴被人民解放军的大炮几下‘轟’平了。

轟吧！轟吧！把那群吸血鬼、卖国贼们轟死！把几千年的不合理制度轟掉！

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在解放的炮火中死灭；奴隶们，起来了，要做万古千秋的主人！

二十九、神槍八勇士

在上一节，談到石景山解放时候的情况，看来太簡略了。其实，說起来倒确实好像那么簡單似的。到如今，石景山發电厂里的老师傅和居住在广宁坡村的老戶，都清清楚楚的記得：

“1948年12月15日上午9点鐘，八勇士先后襲进了發电厂，登上五層煤粉爐大樓；16日上午8点多鐘，炮打黑山头，三炮就把国民党匪軍崗樓击平了；17日石景山全部解放。——对了，就是这么个簡單的过程。”脑子里像刻上印版那样清楚，記憶里像对自己的生身年月那样真切；当沒有亲身經歷的人問到他們的时候，他們就兴趣盎然而且激情地講給你听。如果你再进一步問詢，要求补充一些細節的話，当然，他們还会对你精采地描述八勇士的槍法如何准确。“真是不愧被人們称做神槍手。仅仅八个解放軍，深入碉堡林立的匪軍重圍，鑽进敌人的腹心地帶，可是匪軍就束手無策，莫奈何他們，就不敢冲进勇士們占据的煤粉爐大樓。”这是一位在解放前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講述的。

“不，”一位老工人糾正說，“匪軍怎么不敢冲呢？不是抓住电厂看大門的老赵——赵煥廷給領路嗎？真他媽的松蛋！匪軍自个兒怕挨揍，怕吃‘湯圓兒’，抓工人引路。可是呢，赵煥廷老汉才上了几蹬楼梯，就‘嗖’的一个槍子兒，打飞了老赵的破毡帽，腦袋皮也給蹭了一家伙。赵煥廷就噤哩咕嚕地滾下来了。那个匪軍早就趁勢顛(兒)他娘的啦！”

“你知道嗎？”另一个老工人兴奋地接着說：“八勇士既是神槍手，怎么沒有打中了赵煥廷的腦壳呢？那是因为他是工人，解放軍不打工人的，專打国民党匪軍呀！打飞了老赵的破毡帽头兒，是为了吓唬吓唬他。”

“嚇，吓唬那一下可不得了，划破了头皮，还吓病啦，在炕上躺了好些天，真倒霉！”

“誰叫他給国民党領路！？活該！”

“就是，就是。”

談完了国民党匪軍抓赵煥廷引路上樓的故事以后，就要接着談工務員沈基才和工人王正玉、梁会昌，助理工程師張杰等人給八勇士送大餅、提开水、找擦槍布的故事了。談完了这一节，不可避免地就会談到八勇士中的負責人，那位端着冲锋式的連指導員王世忠同志怎样在深夜时分，从五樓下到三樓給厂主任办公室里国民党匪軍打电話的故事。談起这个，人們会特別感到兴趣，像听神話一般。

“还有一段插曲和笑料呢！”有人又开始补充了一段：八勇士进入大楼的那天晚上，也就是八个人与敵軍数百、数千人对峙的那天晚上，半夜里敌人忽然炸了窩，乱轟轟地鬧騰了一大陣子。匪軍營長以为解放軍里应外合进来摸营，当他慌忙奔出去以后，才知道是他帶的一群士兵中的一个，打盹时从桌上跌下来，自以为是吃了八勇士的手榴彈，大呼救命，把全屋的匪軍都吓醒，大家惊慌了一陣，然后又互嚷互罵了一陣，匪軍營長無可奈何地把那个小兵臭罵了一頓，才又回到主任办公室里。

人們談完了八勇士，就談炮打黑山头了。这是更为清清

楚楚的事实，因为黑山头高耸入云，躲在职工宿舍的每个职工同志都清楚地看得见，也都在盼望着早点解放，殷切地眼瞅着黑山头上的敌人碉堡怎样被解放军的大炮轟平了，掀掉了。开头兒，炮弹并不落在碉堡上，第一、二顆彈撂在碉堡兩旁，轟轟兩声，打得烟塵弥漫，砂石飞揚。有些职工，心里觉得可惜；有的替解放军着急。“怎么沒有打准呢？”哪里曉得，是解放军的神炮手富有經驗，他們清楚地知道匪軍会埋伏在碉堡四周战壕里。果然，兩炮响过之后，就看見碉堡四周溝壕里沒有被轟死的匪軍士兵，紛紛露了头爬了出来，像螞蟻似的黑糊糊一大片，鑽进碉堡里去。正在这时，‘嗖’的一声，第三顆炮弹飞上去了。不偏不斜，不高不低，“轟”然一声巨响，恰恰正正命中敌人碉堡——居民普通称它做“王八窩”的那家伙。这一炮就掀掉了。“哈哈！”咄咄咄，多少观陣的职工和居民發出助威的欢呼和鼓掌声，激动的叫喊！哪像在战火下的生活，他們完全忘記了自己处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下面。人們談起这一段来、真是异口同声，兴高采烈。

就在那天夜里，石景山上的敌人企图逃跑。豈知道，他們的命运已經注定了。一部分踰着結了冰碴兒的永定河激流，向長辛店方向逃了十几里路，到那兒去向解放军繳了械；另一部分連同一些‘官太太’們，想踏着鋼鉄厂才結了冰的大水池向东窜逃。可是，薄冰承担不起这帮匪軍和养肥了的官太太們。于是接二連三，扑通扑通地都沉进冰窟窿里去。第二天，鋼鉄厂的工人和解放军用鉄鈎子打撈上来。看吧，匪軍和太太們的死尸都拳着胳膊，不知是在死前感觉冷的緣故，还是舍不得离弃他(她)們臂上搶来老百姓的手表，手飾。有的

手表帶了兩胳膊，有的一个手指上帶着一串金戒指兒，像冰糖葫蘆似的……。

解放石景山的战争輪廓，大致分为上述三段：即八勇士进發电厂、炮打黑山头 and 全歼駐石景山的匪軍。

解放过后，听說朱总司令、賀龙同志等还到石景山来过呢。他們看了看八勇士占据的五層大樓、地勢險峻的黑山头和石景山。文艺工作者們还給八勇士画了連环画兒，登在画报上……。

簡單过程，就是这样，如果想再細致地了解那次战役情况，还可以到北京圖書館，查一查1949年2月2日《人民日报》北平版創刊号第四版上，有展潮同志一篇生动而真实的通訊，題为《解放石景山的英雄們》。

三十、灯光特別輝煌

石景山發电厂职工的任务当然是發電，所以除非处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他們是不停止發電的。就像为了解放石景山而进行的战争，經過这样大的事件，發电厂的大烟囱才有一天多沒有冒烟；隆隆作响的机器不到兩天就又轉动了。說起来真是奇迹，这不能不归功于人民解放軍（特别是那开始襲入發电厂的八勇士）和本厂职工們的奋勇精神。

如果不是八勇士保护住厂房，国民党匪軍定会砸毀机器或拆走重要部分的。还在八勇士襲来之前，匪軍就偷偷摸摸地把貴重的机体溫度計擱起来，搬运走了好些。自从八勇士上了樓，匪軍不用說上楼动机器，就是走近一下厂房，腦袋

上也会被穿个窟窿的。

职工們呢？早在解放前几天，就組織起护厂队伍来。厂里地下党员、工人王俊恒和工务員沈基才等同志特別积极卖力，在护厂工作中，党员和工人群众一道进行組織和宣傳工作。党员在群众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

1948年12月14日，沈基才、王俊恒等和許多职工忙碌了一天，写护厂布告、标語，組織消防队、檢查組……一直干到深夜。他們就在这天晚上，进住机器房，不回宿舍了。这也是一場战斗，是配合人民解放軍的战斗。机器房作了战斗指揮部。

經過徹夜的緊張工作，第二天，人民解放軍的八位弟兄来到厂里，和职工們撿起手来保护住机器。职工同志心里就更有了底。15日早晨，护厂聯絡組的同志們从机器房过铁路北，回到宿舍去，南厂只留下沈基才几个負責人和正在操作的运行工人們。从早晨8点多鐘起，响了一陣槍声之后，电厂所在地就进入战争状态。但是工人們照常操作，工作并未停下来。9点鐘，八勇士上楼，到下午3点鐘左右，仅仅停了六号机一台發電机。入夜才停电。

應該說是特殊情况了，15日晚停止發電。这时，每个职工和家屬都感觉到环境特別靜，是从来沒有过的。街上的孩子早被大人叫到家里，閉上了大門。連鷄叫狗咬的声音都沒有。人都悄悄的，沒有一声吵嚷。当然，人們心里是很緊張的。怀着期待、焦急的心。盼望迅速解放、恢复生产，这是一般人的心理。

16日上午，大炮就打破沉寂开始轟鳴了。这天解放了广

宁坎村和車站。职工們心情寬松下来。沈基才等留阻在南厂已經整兩天，当他們趁着剛剛解放了北厂，赶回来和人們一道討論如何支援战争、組織担架队……的时候，职工弟兄們彼此觉得好像多年不見的朋友亲人似的紧紧地拥抱了他們，还把他們高高地抬起来，跳鬧欢呼了一大陣。

一方面討論支援战争，同时也立刻討論起如何恢复發電的問題来了。

16日夜，石景山上的敌人一部被歼，一部夜逃（到別处去繳槍了）。人們知道，經過战争，停电再恢复發電是如何困难！第一，綫路都打坏了；第二，應該先有厂用电才能起動發電机，当时是沒有厂用电的。不过，解放了的工人們，一开始就表現了刻苦、勇敢的精神和巨大的力量。从17日早晨起，九百位职工就为搶修綫路和檢查机器而忙碌起来。另一方面，派人到門头溝方面联系。因为听说門头溝有一台小發電机，不用“厂用电”就可以开起来。解放了，和門头溝是一家人了。当时，把这情况向工人一宣布，立刻就有五、六十个工人挺身而出，先搶修通門头溝的綫路。又有一部分人劈柴的劈柴，鏟煤的鏟煤，把低压爐燃燒起来。就在17日的下午，天还没黑，門头溝送了电来，石景山厂的三号机开始轉动了。于是，就在17日下午6时10分鐘，开始了解放后的首次發電。經過一个解放战役，从15日下午停电，只16日停了一整天，17日就又發電了。从厂內出来的职工，因为兩個晚上沒有灯光，这时候怀着一种特別兴奋的心情，回头望了望大樓，又向前面半山坡一帶职工宿舍看去，大家都感觉灯光特別輝煌。

三十一、粮食堆成山

石景山解放了，当天晚上就恢复了发电。人们怀着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了新生活的开端。在工余饭罢，一些工人弟兄们凑在一起，谈着关于解放战争的感想。对人民解放军、共产党的感想，自己、家庭或同班工人在战争中的经历和感受。真是谈不完的新奇事儿。

解放前，人们不能公开谈论时局，不能涉及政治，不能涉及共产党、解放军。现在解放了，自由了。可以谈所欲谈。人们看到解放军战士们个个年轻、健壮、威武，面孔红红胖胖的，身穿整齐的灰棉军装，头戴大皮帽子，枪枝整齐、漂亮。他们开进村街，要是在夜间，就不惊动人民，只是在临街的房檐下休息，不怕风雪的刺骨寒冷。百姓们向家拉都不去。如果向人民借用一针一线，即便是个破盆旧碗，也一定归还。公买公卖，待人和气，“老大娘、老大爷”地叫着，使人实在感到亲热。人们想：历古来今，多朝多代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军人。老人们说：“哪有过不打人、不骂人的军队呀？真是没听说过！”岂止不打骂人，住在谁家就给扫院、挑水……，做些出力的活儿。——不要把这种事小看了，当然，过了几年之后，说起来好像不算什么，太习以为常了。可是在那当时，人民群众真当成稀罕极了的事儿呢！

石景山地区战争还未完全停止的时候，工人和家属们都从家里出来。帮助解放军打扫战场。要是从前，当兵慌马乱的时候，谁还出大门呢？这个可好，人们都出来了。有的

到厂里去；有的到石景山上去逛。石景山上山的那条路，工人们和百姓多少年来没有走过，很不熟悉，路又窄，还被老高的枯草掩盖住。但是17号那一天，就把石景山上踩出一条宽阔的黄土路来了，你说这是多少人走出来的吧！有些青年工人们，揀回些子弹来玩，他们很喜欢那些没有爆炸的小地雷、手榴弹，像些小香瓜儿似的挺好玩。国民党匪军败退之前，抢的人民的米、面、杂物，到处丢弃。弄得石景山上小路旁边和荒坡上，这儿一堆米，那儿半袋面……，人们也顺便揀回来。

解放后才一两天，一个一个新奇的传闻在人们当中传开了。说是有个老太太的闹钟，买了是为的叫孩子早晨上学别误点的，可是叫国民党黑狗子队抢了去。解放后，老太太没有去找，心想找也是白费，还不知道弄到



哪里去了呢。沒想到，一位解放軍的戰士，手提小鬧鐘兒，進門就叫着“大娘，大娘！你看看，認的這個嗎？”恰恰是它，解放軍替她找回來心愛的小鬧鐘。

說是誰家送給解放軍同志一點旱烟葉兒，還非給錢不行。發電廠的幾個小刷子，解放軍借去寫標語，因為買不到這東西，還想多借用一些時候，到別處去寫。電廠總務股的負責人就聲明送給部隊用了，這麼幾個小刷子，電廠里有的是。可是解放軍同志還托人給送回一些錢來。

這種事兒太多太多，寫一年也寫不完。

解放後，兩三天，在廣寧坎村街上召開了軍民聯歡大會。解放軍一位政治人員講話，他說：“人民解放軍就是人民的子弟，換句話說就是人民的兄弟、兒子……。”在他說來這是一句極簡單、平常的話，也是極其真情的話，可是在人民群眾聽起來，太不平常了，因為人民經歷了多朝多代，見過各種各樣的軍隊，但是沒有一種軍隊不伸手打人張口罵人的。都是站在人民頭上的“老爺”。日本鬼子投降後，蔣匪幫的軍隊來了，不是張口就說“老子抗戰八年”嗎？現在人民解放軍自稱是人民的子弟，見了人們親切地呼喊著大爺、大娘、大哥、大嫂，小朋友，某同志。就是一個稱呼問題，也深深地打動了人心。

解放軍無論住在誰家，立刻就像一家人一樣，和老人談得來，和孩子玩得好；和工人交成朋友，和老百姓認成親戚……，他們向群眾學習過日子的道理，做飯縫衣服的技术；向群眾講述戰爭的故事，世界大事，老解放區的故事，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故事……。

解放軍負責同志問詢廠里和村里人們有什麼困難。人們

提出匪軍在的時候把人們搶光了，工廠里也不按月開支，物價一天三漲，人民不夠吃的。解放軍負責同志立刻給開了介紹信，廠里派人到長辛店聯繫。回來告訴大家說，那裡的糧食海啦！堆的像山一樣高。有小米，有綠豆……，接着解放軍用大卡車一趟一趟的給運了來。人們個個喜笑顏開。老工人張玉亭說：“那怕光喝稀的也痛快！只要不受氣了！”

糧食源源運來，發電廠當時還沒地方放，就倒在北廠空場子上，堆了老高。工人和家屬們都拿了布袋、包袱皮兒來領糧了。解放軍負責同志說是暫時接濟，將來再想辦法。職工們安心生產好了，解放啦，生活是不成問題的！

三十二、最初的印象

在石景山解放的前幾天，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有的技職人員進北平城了。他們有的想：這次進趟城玩玩，以後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再進城呢，在這兵慌馬亂的年头兒。他們有的家在城里，趁歇班或請假回家看望看望。城里沒有家的，也趁歇班逛一逛。他們的生活比工人高的多。每逢星期、假日進城是極平常的事，可不像一般工人似的就沒有過這種閑情逸致的夢想。

進城的統共十一個人。這里面只有一個人是特殊情況，他的名字叫李守勤。他不是去看家，更不是閑逛，他是到城里冀北電力公司北平分公司和某些同志接頭、彙報工作和研究如何護廠、迎接解放的。

不論是誰，他們都截在城內，回不去了。

他們剛到城里的那天晚上，參加了一個同事的結婚典禮。大伙兒正在高談闊論、逢場作戲的當兒，周振謀嘴唇湊到蘇逸萍耳朵上小聲說：“唐山‘丟’啦！”蘇逸萍沒聽清，腦袋又往周振謀嘴邊斜了斜，問：“嗯？”

“‘丟’啦，唐山！”

“噢！聽誰說的？”

“別人。別人听了收音機。”

他們把解放叫做“丟”。唐山、天津和石景山是聯合電力網。唐山解放，自然影響到石景山。再說，自從東北野戰大軍進關，和華北人民解放軍聯合作戰，勢如破竹，一日千里。唐山既“丟”，他們的石景山也就難“保”了。

婚禮也無心參加下去，他們回到電力公司，商量着明天趕緊回廠的事，看時局急轉直下，再不快回恐怕就回不成了。

明天？國民黨反動派哪里還有明天！等到石景山發電廠進城的十來位技職人員，匆忙着要回廠的時候，消息靈通人士就告訴他們說：“得啦，別走啦，火車不通啦！”這三個“啦”字，使得他們都瞪了眼，沒有別的可說，只得留在城內，讓你逛個夠。

北平和石景山中間被卡斷以後，北平就得不到電了。他們也估計到石景山可能不日解放，但是從北平能走出去又待何日呢？心里沒底，有一些人只得聽天由命。

當時在北平圖書館里面，有個鍋爐和兩台小發電機：一台70瓩，另一台130瓩。冀北電力公司就叫石景山來的十一位技術人員到北平圖書館里燒起鍋爐、開動小發電機了。這些技術人員，差不多都是大學或專科畢業的學生，懂得些發電

技术，有人是搞汽机的，有人是搞鍋爐的，有人是搞电气的。这样一凑，就在圖書館里發起电来。当时北平当局还派了20名士兵看管着他們。这两台小机器，当然只能供給少数統治者的部分用电；全城老百姓还是黑着灯。

他們十一个同事，就只得这样干起来。有的盼望北平解放赶紧回厂；有的怀着恐惧心理，摸不着时局变化趋向，糊里糊涂混时兒。过了兩天，石景山就解放了。但是他們不能回去，因为不容易出城。他們打听到有的老百姓换上一身国民党匪軍軍裝，推上个白菜車子就可以混出城去。当时已經混乱極了，城内軍隊缺粮少菜，你要說是随軍伙夫出城买菜的話，就很可能混得出去。但是这些大学生有点胆小怕事，不敢冒險，只得困在城里了。

当然，李守勤同志心里是明亮的。他在这里有这里的工作。他和公司里的同志們印發傳單，写警告信給冀北电力公司的負責人們，讓他們好好保衛国家物資、迎接解放，立功贖罪、为人民效劳……。

同时，他也不是不急于想回石景山去。因为他早就向往着解放了的石景山了。

时局迅速发展，天津解放了。一天，苏逸萍和李守勤一班工作，二人閑談起来。苏問守勤說：“天津沒有战事了，咱們这里的战争状态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去？”

苏逸萍确实是心里沒底，他看到李守勤天天平平靜靜，挺乐观的样子，和他扯扯閑談，無非想得些安慰的意思。当时北平市民和伪人員家屬都存放粮食，預备在那圍城时期度日的。守勤反問逸萍：“你看呢？”

逸萍說：“我家只有够吃三个月的粮食。”

“足够，足够！我看一个月的粮食就够吃！”

逸萍听了，心里一方面得到安慰，同时感觉奇怪：素以稳健著称的李守勤，怎么现在说话这么肯定呢？难道他是了不起的观察家、预言家，还是他掌握某些内部消息呢？

后来，守勤的话果然兑现，没等一月，北平就和平解放了。他们都回到石景山。过后多少时日，逸萍还常提到那时守勤的话。他说：“我当时糊里糊涂，只感觉守勤在思想方面比我们那十位都清楚，眼光高明，可没有去猜想他是共产党员呢！”

当北平正式解放之前，开始和平谈判、城门可以打开的时候，守勤就要求回厂。请示党的领导，也同意他回去参加恢复生产、筹备工会工作去。他于是串通人们回厂。他打听清楚，虽然沿路工事重重，道路坎坷，但骑脚踏车绕着路子可以回到石景山去。当时，还有一个伴儿愿意同守勤一块回厂。于是，他们出了西直门，弯弯曲曲地躲避着地雷，绕过坑坑壕壕，回到石景山来。

到和谈完全成功，北平正式解放了以后，其余几人才离开北平，回到工厂。他们这一批回厂之前，公司负责同志给他们介绍了一下石景山发电厂解放后的情况，说：“好吧，你们回去吧。那里正需要你们，希望你们和全厂职工一道，为恢复生产贡献出你们的力量！”

于是，苏逸萍等一行八九人，坐上公司的专用汽车，送他们回石景山来了。他们已经离开石景山一个多月。这是多么不平常的一个月啊！知识分子又爱发些感慨。他们乘上汽

車飛馳在解放了的北平市郊，感到別有一種風味；接近電廠的時候，心情又隨着汽車的顛波而激蕩着。然而，蘇逸萍完全料想不到的還是他回到廠子以後耳聞目見的幾種現象呢！在他看來真是天大的奇事，一件一件叫他遇上了。後來，他也是經常談起的。“第一個怪事兒，就是看見接管組的同志……，”他感動而興奮地講着當時的情景：他們剛回來，廠里老熟人們表示了親熱的歡迎，烟、茶招待，讓他們先休息一下，並且告訴他們說軍代表正和別人談事情，一會兒就出來見他們。這次，逸萍想：軍代表是代表人民解放軍來接收和管理這個廠的，又所說是個大學生，一定很有派頭兒吧？……一會兒，進來了一個人。穿着破舊的棉軍裝，在很顯眼的袖子上已經露出一大團棉花，棉褲上也露出棉花；鞋子縫補了半截，還綻開了一大塊。“這准是軍代表的勤務員！”蘇逸萍想，“可是，看到的解放軍都穿戴得整整齐齊，怎麼唯獨這位勤務員穿得這麼破舊呢！”他正想着，那人湊過來了，看得更清楚，雖然穿戴極不講究，可是這人長得很魁梧，臉色紅潤，精神奕奕。過來就滿面春風地伸手要和人們握手。蘇逸萍等正不知怎樣的剎那，旁邊有人過來介紹了。指着那位說：“他就是軍代表！”

“啊？軍代表？！”蘇逸萍們內心驚訝起來。

“同志們，辛苦啦！”軍代表和他們一一握手，讓坐，攀談起來。他說：“同志們回來先休息一下再參加生產吧。聽說城里生活不夠好，有一個多月沒吃到肉、大米，菜蔬也很少。咱們這裡可是不同啦。今天招待你們會餐，晚上還有個歡迎晚會呢！大伙歇好了，明天再談工作。……”

他們听着軍代表說話，不再懷疑他是不是軍代表了。很高興，很感動，這是留給逸萍第一個印象，也就是說他認為第一個怪事兒的。

招待他們會餐的情景，也使他們大為驚訝。過去常聽到宣傳說，共產黨解放軍窮的很，光吃小米子干飯。他們也相信共產黨的艱苦作風。那麼，這一頓非常豐富的會餐，實在對他們太優厚了。

晚會的會場設在廣寧坎村大街上一個小廣場上面。這些知識分子，過去是習慣坐在大戲院的樓上包廂或前排池座里看戲的，這回叫他們擠在街頭，站着看演出，心想還有什麼了不起的節目嗎？哈，哪知道真是精采萬分！每個節目都吸引着和激動着他們。逸萍他們覺得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開擴眼界，比豐富的會餐更為享受。那是華大女工團來演出的。不管是唱的《陝北民歌》或是《平漢路小調》或是“太陽……一出……”的道情調，或是“叫老鄉，聽我講……”不知名子的歌曲，都使他們感到特別新鮮，與過去常聽的顫顫悠悠、哼哼噥噥的黃色歌曲，簡直不能比擬，這是多么嘹亮、雄偉、悅耳的聲音啊！它們震撼着這一帶群山、震撼着聽眾的心灵，深深地沁入他們的內心了。

這一晚上，廣寧坎街頭，燈光輝煌，紅火熱鬧，晚會直開到深夜，音樂完了接着演戲，都是蘇逸萍等想像不到的精采動人。這就是他們一回到工廠所遇到的幾件新奇的景象，可以說是終生難忘的印象。

晚會完了以後，逸萍他們回到宿舍，睡在溫暖的床上，不由得前思後想起來：從1946年到1948年，就是說解放前的

二年，在北平上学，北平的学生运动很高漲，說明一般青年知識分子都是向往光明的。苏逸萍也参加了一些活动，但是認識是模糊的，不曉得光明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今天，才第一次亲身来到解放区，总算亲眼看到共产党和解放軍了。最初的印象，突出的三件事，留下印象極深，都是他沒有想像到的。后来談到工作，軍代表告訴他們，技術人員一般的定薪是610斤小米，將來还要提高。而軍代表才100斤。这一点使逸萍他們也非常感动：軍代表也是大学生啊！和我們不同的是早参加了几年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地斗争了許多年。現在进了城市，生活还那样艰苦，而我們这些蹲在后方、毫無贡献的人，在享受待遇方面，倒特別优厚，超过老干部五倍还多。只是这一点，我們这些旧知識分子就受到很大教育了。

当苏逸萍他們出城的时候，看到英雄的人民解放軍把攻打北平的云梯都准备妥当，还听说准备下許多大炮弹，共产党有足够的力量解放北平，但是，为了保护住古老的文化名城，还設法进行和平解放北平的談判，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談判終於成功，北平得到和平解放，使北京城沒有受到任何損失，这也是使他們万分欽佩和感激的呀！

他們过去常常看見国民党匪軍欺压和掠夺老百姓，又看見他們潰敗之前的狼狽像。来到解放区，所見所聞，处处新鮮，人民解放軍的秋毫無犯，紀律严明，队伍整齐健壯（軍队比地方干部穿戴整齐也是当时的特点），真是雄糾糾，气昂昂的。但是在軍民关系方面、生活作風上又是那么誠朴，艰苦卓絕……。这一切一切，都裝滿了苏逸萍的头脑里。夜間，

他思想紛紜、心情激蕩，使他進到有生以來第一個新鮮的境界，度過了第一個充滿幸福的夜晚。

三十三、和職工打成一片

隨着解放大軍的攻城克鎮，節節勝利，人民政權派出許多接管人員，到新解放了的城巿進行接收工作。負責接管北平電業方面的有三十多人，組織了一個大組。在北平解放之前，石景山先解放了，他們便有幾個人來到石景山發電廠。

這些同志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出身，有參加革命較早的老幹部，有石家莊解放後出來的技術人員，還有1945年第一次解放張家口、宣化時跟出來參加工作的同志。這些同志一來就緊張地工作起來。

接管組里的黨團員除本职工作外，也擔任些社會工作。如年輕活潑的田清，一來就給職工們開展業餘文娛活動，教給工人們唱歌。雖然他的口音不大對頭，可是他很勇敢，楞教。人們也很喜歡跟他學。《我們愉快地勞動》一歌幾乎全廠職工都會唱了。一下班就可以聽到這樣的歌聲：

爐火通紅，機輪轉動；
歌聲響亮。我們愉快地勞動！
工廠是我們的大家庭。
我們是工廠的主人翁。

.....
.....

田清的本职工作，是負責運輸糧食，大伙叫他運糧官。

这个差使是很受人欢迎的。他一趟又一趟从老解放区运了许多粮食来。然后，遇见人就用他那冀中口音大嗓儿喊道：“来啦，知道吗？这回是老玉米豆儿。还不快拿家伙来装，老兄！”

“好嘞，我们的运粮官同志！我这就去拿。”

除了接管组之外，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也派了一个工作组来，他们和上面说的由行政系统下来的接管组，共同担负起这个厂发动群众、恢复生产的任务。

工作组的同志们受到工人弟兄们的热诚欢迎。组长老杜，就是在1945年8月间率领游击队袭击发电厂的那位同志（可参看本书第二十一节）。他和这里的不少工人早就熟悉；这里的地理环境、职工思想、家属状况，他都摸的清楚。何况这次跟他一道来的还有本厂原来的工人张利明，他是1945年8月一同计划攻厂，后来又从厂里跑到解放区去的；这次，也作为工作组的一员随来工作了。

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的王文炳、李守勤、王俊恒、沈基才、席长胜……同志，本来是互不通气的几支细流，解放后工作组来到就接上关系，几支细流也汇合一起了。工作组通过他们了解职工思想情况，召开老工人座谈会、积极分子座谈会。在工人当中吸收一批积极分子参加宣传活动和文娱工作，如刘德仁、李增成、夏邦仪、李进宝、佟惠清……，这些同志一下班就到工作组住的地方来。有的晚上也不回家睡觉，宁愿在这里睡地铺。

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工人，恢复生产，安定秩序，解决工人目前生活上的问题。工作组的同志们，很接近群众。和工人聊天，席地而坐；剖心置腹，互相交心。他们的生活

艰苦朴素，为了更容易接近群众，不住北厂职员宿舍，而住在厂外。睡地铺，铺干草；吃小米干饭，抽旱烟叶儿，穿的都很简朴。虽然他们当中也有些是知识分子出身，但是一点架子没有。比如原清华大学学生席明，长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个学生；留着学式头，戴着近视镜，可是很能接近工人，尤其是青年小伙子们。在工人歇班的时候，他领他们爬山、聊天、讲故事……，他是建团的筹备人之一。工作组的张政也是大学毕业，河南口音，说话幽默，常常站在高坡儿上给工人们讲国际局势，他是工会筹备人之一。工人们有事就愿意找他们“参谋参谋”。至于工农出身的干部，就更受欢迎了。工作组里有个叫胡步成的，农民出身，他爱 and 老工人拉话。一坐下来就家长里短的谈个没完。他用他那个著名的小烟袋装上烟叶让你抽着，就问你些事儿，还告诉你些事儿。和人们的关系是那么自然。不过，他不大识字，可是他也随身带着小本和铅笔呢。他听着要是有什么值得记下来的问题，就掏出笔和本子说：“这个问题儿有意思，请你帮咱记下。”

胡步成虽然和工人很能接近，但是可不愿和技职人员来往。他觉得他们瞧不起他这个农村来的干部。他就是和张利明谈得来，处得融洽，他俩一天工作到很晚，回宿舍睡下以后，还拉个半天，不是交流工作经验，就是谈心得感想。他俩常常逗笑地说：“哼，咱俩可是真正的工农联盟呢！嘿嘿。”

工作组里放着胡琴、喇叭、锣鼓家伙。一到下班，就挤满了人。又是拉，又是唱，又是敲敲打打，好不红火热闹！工作组成了吸引工人的俱乐部了。

三十四、大放光明

發电厂在解放后的第二天就恢复了發电，听起来真是奇迹。其实奇迹还在后面呢！过了几天，石景山的秩序恢复了，战争离开这儿較远了。人民解放軍的一位政治工作負責同志到厂里来，对厂里負責人说：“發电啦？很好！”然后問到通北平的綫路坏了沒有，还向北平送不送电？厂主任和几位高級技职人員听了覺得奇怪，工人們听說也覺得詫异。北平还没解放，給敌人送的哪項电呢！真是从来沒听說过的事。解放軍負責同志看出大家在納悶，就解釋說：“我們給北平送电，主要是給人民用，不是給反动派。你們設法把断了的綫路修一修吧。”

發电厂的負責入即刻把这件事当做重要任务来执行了，積極設法和北平城內取得联系再修通輸电綫路。

怎么和北平联系呢？电话綫都断了，不能通話。厂里便利用过去和冀北电力公司內部联系的無綫电话进行通話了。把我們的意思告訴給冀北电力公司。他們說这件大事須“請示”北平反动派当局。后来他們“請示”了一下，反动派当局不要。这一来，职工們更覺得奇怪了。給他們送电嗎，他們不要。好吧，我們就等你几天。反正北平城被我們大軍包圍着。你們也想不出什么招兒来的，只要人民听到这个消息，会發表意見提出要求来的。果然，过了几天，他們沉不住气了。因为北平这样一个大的城市沒有电不行，沒电連自来水也喝不上了。于是，他們也通过短波無綫电来和我們联系。同意

請我們給城里送電。但是，駐北平中南海的所謂“剿總”只要我們送1500瓩電。不給市民用。意思很明白，怕對市民產生政治影響。我們回答他們的條件，和他們恰恰相反。我們在聯系中大聲呼喊著：軍事機關不能用，戰犯不能用，“剿總”不能用；我們只給工人弟兄們，窮苦老百姓……

“別說啦，別說啦！”他們是那麼神經緊張地怕聽我們這些正義的聲音。

兩方面為送電問題的許多細節和具體安排，約定每天有一定的聯系時間，到那個時間，我們這樣喊：“石叢山呼叫，石叢山呼叫……”他們接着喊：“北平呼叫，北平呼叫……”因為我們是為了北平的人民，所以要多送，我們說如果北平當局不答應，我們就拉路。這樣，北平當局只得多要一些。先送7,000瓩，以後增到15,000瓩。

在用無線電通話的時候，你聽吧，千奇百怪的事兒都有。因為是無線電話，可以聽到許多不相干的人的聲音。“還有多少？”這是平津之間的商店老板在做投機倒把、囤積居奇的生意。“你們都賣了吧？”“不行，不行！不夠價錢！”“三個金條！”……

這期間，我們的接管人員和黨委派來的工作組同志們已經來到廠里。這些同志聽到無線電話里的“雜音”，說明另一個世界的烏七八糟的現象，真是覺得可笑哩！

談判好了送電的問題，接着便趕修綫路。北平當局懷着鬼胎，怕我們乘機襲擊他們。請求我們修理電綫的工人在接近他們的警戒區的時候，吉普車最多別超過四輛，自行車別超過四十五輛。兩方綫路工人（北平方面有電力公司的工

人) 乘坐的汽車或自行車都要插上小旗为記。

这样联系妥当之后,我們的电工英雄們馬上就动作起来。他們不怕天寒地冻, 刺骨的風霜, 搶修綫路了。他們唱着:

鉗子、改錐和小刀,
电工随身的三樁宝。

.....

.....

电是我們的好朋友,
登上高竿逞英豪!



很快地就修好了主要干綫和支綫。因而便在还没有解放的北平城内, 广大市民还呻吟在黑暗的深渊里面的时候, 忽然, 像做梦似地不知从哪里送来了光明燦爛的灯光, 真是喜出望外, 不由得額首称庆啊!

石景山发电厂恢复生产和向北平送电之后，接着就发生了煤荒的问题。当时火车不通，煤源枯竭，怎么办呢？火力发电没有煤，是一点办法没有的。俗话说，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这一下，厂主任呀，事务课长呀，工程师什么的，都发了大愁。军代表也感到事情难办了。

工作组的同志们，一来就和工人们处得火热，简直像一家人一样。工人们下得班来，了了草草吃顿饭，就跑到工作组住的几间小屋里去，聊呀，聊呀，山南海北，天上地下，海阔天空，高谈阔论，无休无止，无穷无尽。唱起歌、跳起舞来十分活跃，情绪高涨的很。但是现在遇到了困难的问题了，说是“没有煤啦！”人们轻松的心情有点紧张，又有点沉重起来了。

原来就是这厂的工人张利明和农村来的胡步成等同志，找到几个老师傅家串门，几袋旱烟抽罢，老胡慢言慢语地提出来。

“要停电了啊！赵师傅，你看这玩艺儿，咋办？”

“啊？你说什么？”赵师傅不胜惊讶之至。

“煤来不了——就得停呗！”老胡不紧不慢地说。

“那哪行！咱们大伙儿想法子！”赵师傅说。

想来想去，想好了一个法。老胡高兴地“腾”一下子站起来，把小烟袋往口袋里一塞，就回到工作组。正好碰上张利明兴高采烈地跑回来。他俩像《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和周瑜关于赤壁之战、大破曹兵之前，各在手心写了个“火”字一样，老胡和老张把从群众中带来的高明意见，碰在一起，完全一致。他俩高兴的跳了起来。

老师傅向胡步成和张利明献的是一样的计策：就是把本厂原来放煤的場子上，多年以来被积土埋掉的陈煤挖一挖，来解决暫时的困难。因为自从1922年石景山发电厂发电以来，已有二十七年之久，由于年代久远，日积月累；存煤場子又高低不平，好歹挖掘一下，也够燒它一些时日的。

他們这一建議，馬上得到领导方面和全体职工同意和支持。当即在全厂發起一个轟轟烈烈、大規模地挖煤运动。职工同志們冒着零下二十度的寒冷，在風砂弥漫的廣場上，兴高采烈，高唱着《我們工人有力量》、《挖煤歌》，电工变成了矿工……，挖掘出三千多吨烟煤，保证了供电，支援了解放战争。在这一个运动中，发电厂出现了开天辟地以来沒有过的景象。过去，管事的或“公家人”，从沒有跟工人一起干过活兒。解放前管事人不仅不干活，还拿着棍子站在旁边监工；动不动冲着工人就是一棍子。现在呢，上上下下都参加了挖煤。不論运行工和检修工；不論职员（自然也有極个别的还没放下架子）和干部，在不影响正常发电之余都参加了这个义务劳动。工作組的同志們，不論是工农干部或大学生，都干的非常帶勁！在劳动中起了帶头作用，影响極好。工人們議論着：听说共产党的光荣傳統，一向是和劳动人民同甘共苦的呀！这回可算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运动不仅在劳动方面表现了十足干劲。还看出了在党领导下的工人与知識分子的結合。比如，大学生能挖煤，青年钳工能写詩作歌。全厂职工最喜欢唱的《挖煤歌》就是青年钳工夏邦仪編写的。那詞兒是这样：

西北風兒吹嘞 哎咳嘞嘞，
煤煙兒到處飛嘞，哎咳嘞嘞；
解放的發電廠嘞，從此放光明嘞，
保證不停電嘞 哎咳嘞嘞，
兄弟們加油干哪！哎咳嘞嘞，
你一銑 我一銑，大家拾煤干的快！
你比賽，我比賽，大家加油把煤拾。
自己的工廠自己的家，哪一個工人不要它！
要把工廠建設好，哎咳嘞嘞，
共產黨領導把主人當，把主人當哎咳嘞嘞，
哎——哎——哎嘞嘞，嗨！

三十五、放聲歌唱

遠在解放之前，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時期，發電廠里進步的文艺活動就在秘密或半公開地進行活動。地下黨員王俊恒、沈基才等同志團結了許多職工，又是組織歌詠隊、話劇團，又是建立小型圖書館、召開讀者座談會，還出壁報。由於這裡基礎較好，所以一解放，文艺宣傳活動就立刻活躍起來。在穩定生產情緒，宣傳黨的接管政策，樹立黨在群眾中的威信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當發電廠解放不到一個星期，人民解放軍大部隊來到，包圍住北平的時候，發電廠職工就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慰問解放軍的演出，這次演出有許多精彩的節目。音樂方面有《黃河大合唱》……，話劇有《陸官圖》……，

还配合一些京剧节目。部队司令員和政工負責同志們对这次演出都很滿意。認為剛剛解放，工人同志就能拿出这样丰富而精采的文艺节目，实在了不起。对工人的干劲和热爱自己军队的精神深为感动。

在当时，职工們都关心时局的发展，迫切地要求了解国内外形势。厂里便出版了油印小报，报名《好消息》。由技术人员韓子修和工人夏邦仪負責編輯。他們除本职工作外，就半夜半夜地为編报而緊張地工作：收听延安和邯鄲电台的广播，记录新聞，迅速而及时地油印出来，散發給各部門各班职工們。北京解放后，改为《职工小报》，韓子修另調工作，就由夏邦仪这位在解放前只念过小学的钳工一人来編輯了。报上除记录新聞外，重点就轉到鼓励劳动热情、生产干劲方面来，天天有表揚有批評。这个《职工小报》就是后来一直办下去的《首都发电厂》鉛印小报的前身。这个报当时办得很不錯，起了不少作用。

在解放初期，发电厂文艺形式最活躍和有显著成效的要算歌咏和話剧了。除了本厂的职工積極参加以外，下厂工作的專業文艺工作者也特別多。

刚一解放，随接管組和工作組来的就有記者和美术、音乐、戏剧工作者。他們一来就深入工人群众，有的写通訊报导，有的教工人唱歌，有的画連环圖画。

随着解放軍大队的来临，华大文工团也来到发电厂。这样一个千把人的工厂和不大的广宁坎村，增添了一个大文工团，一下子就把整个气氛弄得紅火熱鬧起来。职工、家屬和当地駐軍，都看了他們的多次演出。人們学会了許多新歌

曲。大伙都会哼唱：“叫老乡，听我講……”还有“長辛店是伤心店，琉璃河是流泪的河……”，还学会了《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打着紅旗进北平》……

文工团走的时候，还留下同志帮助开展工厂文娱活动。有位刘迅同志，天天手不离手風琴。在南厂大門上，用粉笔抄出歌曲，等工人一下班，他就攔住人們，讓大家学唱。“来，来！唱歌啦！”当工人們笑迷迷地集合起一堆人之后，听吧，刘迅那熟練悅耳的手風琴就响起来了。

在那个时期，国内軍事形势，迅速胜利前进。今天解放这里，明天解放那里，工厂里經常搭起台子开庆祝大会。一开大会就有游艺节目。开会前各車間的“拉拉队”出来，你欢迎他、他欢迎你的好不熱鬧。“欢迎李进宝唱歌！”“欢迎不欢迎啊？”“欢迎！”

李进宝学的最快最多。嗓子响亮，声音圓潤。他也不扭捏，一登台就高声唱着：“叫老乡，听我講……”完了，听众都用力地鼓起掌来。

有些老实工人，在解放前不爱說不爱笑的。这会兒鬧秧歌却积极参加，扭的可欢啦。逗引得人們笑个不停。

王文閣就学美术画像。他慢慢能画領袖像了，而且画得很好。

夏邦仪写了不少的歌詞，別人替他譜上曲，先在自己厂子里流行起来……。工人当中，真是什么人材都有啊！

到工厂来帮助开展文艺活动的文艺工作者陸續不断。他們和工人們合編剧本、歌曲……。清华大学、华大文工一團、

二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美术学院……都来住厂工作过。他们和工人们合作得很好。《好夫妻》一剧就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演员和工人李进宝、赵润合编、合演的。很受职工们的欢迎。他们把当时厂内发生的事迹，立即编成短剧或歌曲来演唱。如什么《一唱刘清泉》《二唱刘德仁》《永定河水嘩啦啦地向东流》……

以后演出的剧目很多，大部分是工人自己与文艺工作者的集体创作。它们是宣传党的政策和配合当前政治运动的。人们印象较深的有：《工厂是我们的家》《挖煤》《八一面》《血债》《好夫妻》《为了光明大团结》《接合井》《锁着的箱子》《四人相声》《工人之家》《一尺布》《当铁锹修好的时候》《大放光明》……。

话剧运动真是盛极一时，后来有好几年话剧在厂里没有什么创作和演出；京剧在这一时期活跃起来了。

三十六、连家属都举了手

在解放初期发电厂里的许多大事件当中，成立工会应该算是一件。

1949年1月上旬，工作组的同志们，为着成立工会筹备委员会的事而忙碌着。先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的有党员同志（都是解放前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同志们）、老技工、积极分子，讨论怎样做筹备工作。1月10日，石景山发电厂工会筹备委员会就成立起来。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人员主要是原来就在厂里的职工同志们，如王文炳、沈基才、潘飞、刘德仁、

王志邦、陆荣芝、李甫明……十五名。另外还有少数新来的干部也参加进去工作。筹委会的任务除了为正式成立工会做些准备工作之外，当时的任务是发动工人积极恢复生产、稳定职工情绪，保证接收工作的顺利完成，解决职工生活福利问题……。

这时候，很多积极分子当选了班代表、股代表，有的老工人当了委员。王文炳老师傅被推为筹委会主任。

1949年国际劳动节前夕，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会正式成立了。选举了王文炳当主任，刘金山负责组织部，沈基才、王俊恒负责宣传部；李迁负责福利部，李秉忠、张利明负责武装部；吴淑傑、楊玉华负责青年妇女部。

在选举的那一天，厂里和村里悬灯结彩，热闹非常，职工和家属们都换上了新衣服，齐集会场，来参加有生以来第一次选举自己拥护爱戴的人来办工人自己的工会。人们都兴高采烈，说说笑笑的。当着一提出候选人王



文炳的名字的时候，不仅全体职工，就连到会的全体家属們也都举了手。接着是高声欢呼，“啪啪啪”用力鼓起掌来。

王文炳是誰？本書已經在不少的章节里記述着他的事迹。从他年幼时跟着母亲离乡背井地逃出来，当了杂役，后来到石景山发电厂，做了十几年長期“短工”，住在拥挤、簡陋的集体宿舍（一間被称做“灤州会馆”的下房）里，大革命时期入工人補習学校，安裝五号机时大显身手，日本鬼子来了的时候参加地下党，被捕入獄，釋放后重新入党……这些都有过記述。但是，無論怎样，他有多大聰明才干，技术如何高明，在旧社会是吃不开的。王文炳老师傅为人处事表現得極為老誠持重，表面看来是个“好好先生”，但是在工人当中威信很高。提起他人人伸大拇指，个个内心佩服。

但是，人們都看到解放前黄色工会历次“选举”，总是离不了那些喳喳呼呼、所謂人人物物，爱歪脖子横眼的人。解放后，就大翻个了，这次，却选了一位老老实实的大好人当咱們的主任。

过了几个月，王文炳又提升为副厂长，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市人民政府委員。一个工人当了政府委員，是开天辟地以来沒有的大事件啊！于是，他的事迹登了报纸，他的照片上了画刊。有一个工人写了一篇《王文炳百字評》，在本厂小报上發表了，里面有这样的话：

.....

思想进步，技术优良

虛心学习，意志坚强

居家俭朴，待人和睦

接近群众，言行相顧

.....

厂里召开隆重的大会，庆祝工人当厂长。請他登台，他幽默而生动地講了些話。完了，一位三十年前和他一塊到石景山发电厂里来的老伙伴李宝庆走过去，拉着王文炳的手激动地說：“老兄弟，过去咱們可是一道进厂的，一道学徒受过罪的呀！你进步快，我落在后头了。这会兒解放了，你可得帮着我进步，不管我可不行啊！”

王文炳点着头，笑容可掬地說：“沒錯兒！”

三十七、“別落下我！”

这里，放下老师傅不談，單說发电厂的青年小伙子們，真是有了不起的聪明才干，叫人从心眼里佩服爱戴呢！不过，旧社会那块土壤是不适合培植这些苗苗的。那会兒，只能使他們長得歪歪扭扭；他們的干劲变成碰勁、扛勁、邪勁。他們在那塊土壤上生活了十几、二十几年了；現在土壤改变了，他們立刻生長得飞速、茁壯、优美、光采了。当然，我們偉大的党必須經常对这些苗苗澆水、施肥、打岔、剪枝兒……。

1949年4月間，王俊恒和修造場的工人夏邦仪、起重工何尙基等到北京學習了一个多月。5月初，又送一批青年小伙子到天津华北职工干部学校去學習。这一批里面，有汽机檢修工刘德仁、运行工李进宝、褚立才……九个人。

关于學習，一般地講，他們都高兴。但是，剛解放不久，

有些个别的人，尤其是个别的家属，还受着过去反动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解放军认识不够清楚。甚至于还有坏人从中破坏，说什么共产党玩手腕，名义上调走学习，实际是骗去当兵；名义上是短期训练，实际上还不知调到哪儿，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呢。有的工人听了些流言蜚语，就三心二意顾虑重重；有的家属也拉起后腿来。

可是，坚定不移、听党的话的小伙子们还是占绝对多数。刘德仁、李进宝等看到王俊恒他们走了就红了眼，就动了心，老是跑到工作组问：“为什么不让我去？咱不够格儿吗？”工作组同志们还得耐心劝说：“别忙呀，同志！还能一下都抽走？不影响生产吗？”

褚立才呢？也是一个从解放就接近工作组的。他最爱听干部们讲话。听着从心眼里就舒坦。他听见负责建团的席明说：“……咱们当家作主人啦。将来过幸福的生活。谁也不能压迫谁。工厂是咱们自己的，要好好干活儿……”褚立才心里说：“嗨，在旧社会，啥事儿不懂。光盼着有这么一天：干活儿吃饭，不受气就好了。可是，没有更高的想法。现在，嗨，真来劲！……”

他和工作组接近，工作组的同志也了解他。过了些时候，问他愿意入团不？他说，好极了！入了团以后，有人问他：革命为了什么？他心里模糊，回答不清楚，心里起急。和他一块入团的有刘德仁、夏邦仪、陆荣芝、李进宝……，他们组织了工人纠察队，还发给他们枪枝，晚上巡逻，保护工厂。他想，革命大概就是这样！不行，人家别人还懂得多；懂得多就能干。这一天，他到工作组要求学习。工作组的贾林山问他：“到

天津华北职工干校去学习，你愿意去吗？”

“愿意！”很干脆。

“不怕吃苦？”

“不怕！”更干脆。

“你们家里愿意叫你去吗？”

“愿意。”其实这是他的估计，就这样把他算上数儿。他回到家，把消息向家里人一說，家里就闹翻了江。

父亲說：“把你拉到江南去咋办？”

“人家同志說了，哪兒也不去。学习完了回厂。”

“你甭听那，”他爱人一旁插了言，“共产党打仗爱拉锯，人家說去了就回不来了。”

“那都是些狗屁胡說！你要是妨碍我进步，咱就离婚！”

爱人怕离婚，赶紧說：“去就去唄，俺不管！”

就这样，他們九个人，帶上行李，坐上汽車到北平城内聚齐，和其他厂矿的很多工人一道坐上火車到天津去了。

在他們九人当中，有一个推煤工人，叫李洪盛的。本来沒有打着他的数儿。他听说要送一批人去天津学习，他就捆好了行李卷，到北厂工会大院集合了。等他来到，那八位同志早已上了汽車，就要开车啦。他赶紧跑了几步，气喘呼呼地跑到車跟前，高声叫喊着：“等会儿，先别开车！我也去，别落下我！”說着就把小行李卷扔了个天把高儿，小行李卷翻了一个筋斗就落在汽車上。人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帶队的負責同志劝他說：“手續早办好啦。这回沒有你，等下次再去吧！”

“不行，不行！我得学习呀！”

帶隊的只得和領導上研究一下，填上李洪盛的名字，補了個手續。這樣，他們九個人一道去了。

一到天津，學校里就開大會歡迎他們。非常親切熱鬧，像在家在廠里一樣。課程有“職工運動史”“政治經濟學”“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社會發展簡史”……這些青年小伙子們聽了心里可亮堂啦。褚立才想：“干了半輩子工人，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以為資本家命里注定有錢，拿錢買機器养活工人還不壞……，學了政治經濟學，才知道勞動是怎么回事兒，財富是怎么來的，為什麼受剝削……帝國主義經濟危機是怎么搞的。資本主義社會里窮人沒飯吃，資本家把麥子扔到海里為了提高物價，多得利潤……帝國主義一定要完蛋！”

學習都很用功。除了聽大報告外，就是復習，討論，黑天白日的鑽研問題。在學習期間，他們也成立起工會，搞好了生活，養豬……，結業前準備把節余的糧食和養的大肥豬吃掉，還打算集體到戲院看大戲。但是因為那年天津鬧水災，大伙一討論，甭吃好的啦，戲也甭看啦，救了災吧！

他們聽大課的時候，三部在一塊聽。路過帝國主義租界地，排起隊伍，穿着整齊的工人制服，帶着工人符號，唱着反帝歌曲。下大雨隊伍也不亂，表現出工人階級的气概。那個時期，南京、上海解放消息傳到，報紙出號外，因為正是夜間，學校大門關上了。不能出去買“號外”。從三層樓的窗口，用繩兒綁鐵絲鉤子，把錢鉤下去，把號外鉤上來。大家都很關心時局，讀到號外，大家歡呼，興奮極了！

劉德仁去天津前，廠里黨支部已經研究過要吸收他入黨。到天津後，他們隊里支部委員石長修是個老黨員，煤礦工人，

当时党还没有公开，但是德仁他们看出来。石长修找刘德仁谈过话，谈家庭情况、个人出身经历，对目前形势的一些看法……。星期天，别人出去玩，德仁和团支部宣传委员聊天。宣委说：“有人找我谈过话。”

“哎，石长修同志也找我来。”德仁说。两人谈起来很激动。他们看到党员就是作风好，照顾大伙生活、学习周到。

8月6日，在班主任屋里，开了个支部会，讨论和通过了三个同志入党。刘德仁是一个，团支部宣委是一个；另外一个，原是地下党员，后来失掉关系，现在讨论他重新入党问题。大伙提的问题很仔细，很尖锐。那位同志说：“过去十年来，失掉关系，像失掉母亲一样。现在回到母亲怀抱，觉得多么温暖……！”说着就掉下眼泪来。这个会给了德仁启发和教育很大。自己感觉自己条件不够，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不能辱没了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别人给自己提了些意见：过去国民党、一贯道都拉过自己，毫不动摇，看不惯旧社会那一套。但是对共产党也没有认识，现在有了认识就积极追求；同志们都指出这个优点；至于历史清白、工作积极、热心负责也都提到。缺点是爱面子，举例说小组会上不爱发言，一发言紧张得满头大汗；做团支部的工作不是很细致的安排，计划性不够……，以上这些，德仁一辈子也忘不了，因为是在讨论入党会上听到的呀！后来举行入党仪式，开全体同学大会，德仁的心恨不得从胸膛里蹦了出来。

过了半个月，褚立才和李进宝也被吸收入党了。褚立才在发电厂是个汽机运行工，看六号机蒸发器。来天津学习，对“职工运动史”一门课印象特别深。教员讲到“二七”大罢工

林祥謙壯烈犧牲的事跡，感動得褚立才掉下眼淚。他還慚愧地想：“瞧我們這些人，過去就不知道鬥爭！”以後心裡慢慢活動；主動找一位叫劉中洲的同志談，因為看出劉是黨員。這人生活樸素，對人和善，大公無私，政治修養高。褚找劉要求入黨。劉勸褚說：“你好好學嘛。”

“七一”黨公開，開大會慶祝，公布黨員名單，好長一大躍。還有老區的黨員在大會上做報告。一個女同志講她當交通員的故事，夜里過河，揪着馬尾巴，前前後後，左左右右，敵人打槍，她受了傷，結果還是把機要文件送到。

“你瞧，”褚立才想，“人家是個女同志，咱……”

校長甘一飛同志也做了報告。他原來在天津堅持地下鬥爭，被捕入獄後壓杠子，到現在腿上還有兩塊大疤。還讓同學們看了看。

後來，褚立才又找劉中洲提出入黨要求。劉說：“好吧。”經過支部研究，認為褚立才夠入黨條件。幾天後班支書找褚談話，對他說：“你考慮好了嗎？要不怕流血犧牲才行啊！”

“嗨，來就沒打算回去！”褚立才很干脆地回答。

“好，填表吧。”班支書叫他填寫了自傳和申請書。後來在入黨會上，聽到唱國際歌，他又感動和興奮地流出眼淚來。

李洪盛（就是那個把小行李卷扔到汽車上硬來學習的小伙子）和李進寶入黨的情況，幾乎和劉德仁、褚立才差不多……，這裡就不必多談。是的，有多少聰明、勇敢、純樸、可愛的青年工人們，在解放後不久就進到無產階級先鋒隊里來了啊！

三十八、修复“半个天”

吃晚饭的时候，李进宝老是冲着褚立才挤眉弄眼，还假装咳嗽。褚立才会意，就向着对面的刘德仁开腔了。

“喂，少吃点，等会儿下饭馆去！”

刘德仁是个机伶透顶的小伙子，从褚立才说话的声音和神气里就看出一点门道。可是还装着满感兴趣地问：“下饭馆？你请客，小褚？”

“你甭管谁啦，反正有人请客！”

“对，反正有人！反正”李进宝在一旁帮腔，眼皮不撩，浓黑眉毛抬得高高的，好像说风凉话儿似的。

“怎么，你请客，进宝？”

“我？”进宝抬眼盯着德仁，轻轻点着头，“好（读郝），等着我也接到那么封漂亮信儿的时候，准请你们！”

这一下，德仁明白了八九成。他心急想看看到底是誰来的信，可是又知道小褚和进宝的脾气，就是真的和他们急了眼，他们也不听你那一套的。所以，德仁必须装着毫不介意，不去追究，继续吃饭。

小褚虽然说着叫德仁请客，可是还吃了四个大馒头；进宝体格瘦弱一点，吃了三个半。饭后，小褚一看表，离开小组会的时间还有个把钟头，他们三个人便到大街上去。边走边说边笑，你听吧，三个人说起来没个完。小褚个子不高，嗓子虽哑，声音可大，像敲破锣似的；进宝说话非常流利，因为他爱听相声，所以一张口就是俏皮话。刘德仁兼有他两个

人的特点，說話又愛直出直入，又愛俏皮人，嘴头上从不吃亏，說話的時候愛笑，一笑起來就是“呵呵呵呵”一大串，無論誰在旁邊，听了他的笑聲也得被傳染得高興起來。

他們三個都挺大方，誰也可以花誰的錢用誰的東西；他們也常常彼此鬧着玩兒，是為了使生活更有趣，更活躍。

三人一路走着，小褚常常提防德仁冷不防地從他衣兜里掏走那封信。德仁心里倒不着急了。他知道愛人不識字也不能寫信來；別的朋友，無非是報告一下廠子裏的生產情況，可是又談不詳細，反正自己在職工幹部學校還沒畢業，不能立刻回去，看了信更使心眼里急的慌。不去管，小褚願意什麼時候交出信來，隨他的便吧。

結果，小褚還是纏着德仁買了三千元（等於後來的三角）的水果糖和一盒紙烟，分分吃了、抽了，才從衣兜里掏出他在傳達室替德仁拿來的那封信。要是從前，他早就拆開看了，近來，不知為什麼，大伙都自然而然地講究禮貌，原封不動地交給劉德仁。用那敲破鑼似的嗓子說：“給，情書！”

德仁一看信皮兒就“呵呵呵呵”笑了一大串。隨後說：“嗨，我當是什麼秘密呢？你們不認識俊恆的筆迹嗎？俊恆這個人長得滿漂亮的，字可寫的不怎麼樣。”說着就拆開王俊恆的來信，三人擠到一塊看起來。

看了不到四、五句，三個人一同大聲喊了出來：“唉呀！精糕！”

他們的面色“唰”地一下子變了樣，眉頭緊緊皺起，胸膛憋的喘不出氣來，最後，他們呆呆地走回職工干校，一句話說不上來，一聲笑不上來了。

* * *

他們自从来到职工干校学习四个多月，没有不高兴的时候；——不，应该说自从解放九个月来没有不高兴的时候。解放前，那是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呀！非人的生活，给官僚资本家当牛做马；受的是什么样的气呀！当国民党大员来厂参观的时候，把小工们轰到地下炉灰道，躲不及的叫趴到犄沟里……；自从1948年12月间，戴大皮帽子的解放军八勇士袭进发电厂，永定河滩头的解放军大炮轰起来，几下子就把石景山对面黑山头上反动派的窝穴掀掉……，之后，便来了个天地大变样，工人做了工厂的主人。这帮青年小伙子更是精神百倍，生产上劲头十足，生活上大大活跃起来。他们和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同志们相处得十分亲密，下了班就到一起谈话、学歌、听读报……。歇班的时候，工作组里负责建团的那位带近视眼镜的大学毕业生产领着他们爬山、一起玩、聊……，5月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天津成立华北职工干部学校，石景山发电厂送了九个人来学习。

他们有几种矛盾的情绪。一种是觉得什么都想学，都想了解，愿意在干校多学些时间；但是一想到家里（工厂）的弟兄们在轟轟烈烈地进行生产、竞赛，心里就痒痒的，愿意赶快回去参加劳动。是那么自然而然的，把解放前在工房里磨洋工，下班后泡赌场的兴趣和习惯一下子丢得无影无踪了。可是，刘德仁还有另外一种思想活动，他想参加南下工作团，毕业后到外地工作。原因是这样：在解放前，德仁对当时的社会极为不满，但是自己又看不到光明前途，因而有一种自暴自弃的心理，觉得人生没什么意思，便天天鑽到赌场里

去，飯吃不下，覺睡不好，工資輸光，連爸爸养的毛驢也一度輸到一個牌九“孤丁”上。街坊鄰居、老人長輩指着他的脊梁骨議論：“完啦！這孩子長不了出息啦！”

解放後，德仁完全變了樣。可是，他這個人愛面子心理特別強，在舊社會是沒法子，就像一個耳朵的罐子胡掄啦，新社會喚起這位青工的榮譽心，他想拚着自己的力氣好好干一番事業。但是，他不願意天天生活和工作在過去指他脊梁骨的人們面前，想遠走高飛，反正到處是家，也有工作做。

幾種矛盾心理、不同想法統一在一個概念下面：聽從組織的分配；按黨的指示、計劃辦事。因此，大伙就安下心來了；天天樂和和地生活，積極又很踏實地學習。從來就沒有個愁眉苦臉不高興的時候。可是，就在這種愉快的生活、緊張的學習當中，工廠里多年一起做工的伙伴王俊恒寫來一封信，報告了一個消息：廠里最大的發電機（也是華北最大的發電機），發電量幾乎占全廠一半的六號機，於9月14日發生了全部損毀的重大事故。這消息好像晴天的一個霹靂，震動了石景山發電廠來學習的九位職工。無論學習多么重要，他們也不能十分安心了。好在按原來計劃也只有十來天的時間就要結業，他們心急不耐地想回廠，看看六號機損壞的情況；想回廠參加修復六號機的偉大工程。劉德仁南下的心願也斷然打消了。“我是個汽機檢修工啊！”他這樣想着：“廠里正是需要我們的時候。”

* * *

六號機是怎樣的一個發電機呢？工人們曾用很多代名詞來稱呼它。

有人叫它“半个天”。当时石景山发电厂是五万五的厂子（发电容量为55,000瓩），六号机的铭牌出力是二万五，接近全厂的一半。它要正常运转，北京城的灯光辉煌；它要发生停机故障，北京就得拉二分之一的线路，半个城黯然无光。它的机体和作用就是这样巨大！

有人叫它“老爷机”，因为它难伺候。这个发电机是外国人当做试验品出产的，容量大，构造复杂，可是质量很差。中国少有，外国也不多。解放前三天两头出毛病，就没有正经发过电，一停电就闹的北京城黑半个天，难怪市民们把发电厂（那时候叫电灯公司）叫做“黑暗公司”。职工们很难摸准它的脾气和规律，没法掌握、伺候，所以叫它“老爷机”。除此之外，还叫它“娇小姐”“肺病鬼”，是说它不健全、常出毛病的意思。

不管叫它什么吧，在它说来倒是无所谓，反正它不表示赞成或反对，但是动不动就给你出个大漏子什么的。

那会儿，运行工人真是天天提心吊胆。当他们每次提了饭盒从家里到工房里去的时候，总是把心揪成一个疙瘩，好像进监狱一样。把看守六号机比做看老虎。一位司机对别的工人哥们说：“看不好，就叫‘老虎’吃了！”又说：“这家伙呀，像资本家的娇小姐，三日两头闹病，简直是个肺病鬼儿！”所以，当司机顶下一班来的时候，快下班的司机常常滑稽地朝六号机作三个揖，嘴里叨咕着：“好啦！一天又算过去啦！老天爷保佑，平安无事。”

然而，检修工呢，就和运行工想法不同了。幸亏机器常出事故，他们才有活儿干，否则还不知道有多少工人被裁减

下来呢。那会儿，他们中间流行着这样几句话：

北平城里灯不明，
工人心里都高兴；
北平城里灯一亮，
石景山的工人遭了殃。

石景山解放后北京城大放光明，庞大的六号机还出过力，有过贡献的。它在这个时期，侥幸没发生重大故障，职工们内心感谢它。——当然，不是说一点事故没有发生过，比如漏气，漏油、大的马达常烧坏了什么的。后来，到1949年7月间，检查六号机，又漏油了，要是在解放前，漏就漏去呗，管它呢！现在不同，工人们就在不停机的情况下，打开“人孔盖”，进去擦油，热并不太热，就是风大，一个不小心，叫风把棉布搅进发电机转子里去。只得停了一下机器。不过，无论怎么说，比解放前是好的多了。因而有位司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是解放带来的福分。要不，咱们这位‘小姐’给咱来个掉闸、放炮……重大事故，甭说大放光明要吹台，咱们这些看‘老虎’的哥儿们也受不了呢？”

听的人也接上碴儿：“是呀，是呀！快烧香祷告吧！只要咱们这个宝贝老老实实，天天鸣隆鸣隆转着，咱就念阿弥陀佛！”

真的，他们就怕六号机出事；也是心里的确没底，没有操作规程可以遵循，照看机器的司机连落个螺丝的权力都没有，怎么可以保证它不出事故呢？

这一天，前夜，正该王志邦的班，王是领班兼六号机司

机，他和两个助手在下午4点钟以前来到六号机大楼。和往常一样，一来到就检查汽温、油温、震动情况，拔出汽机周围温度表来察看着；用三四尺长的铁针谛听内部运转情形。新厂值长大苏还来看看，他问王志邦有事无事，王说：“正常。”大苏便到别处去转了。可是，过了一会，汽机内部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开始像蝉鸣，但是越来声响越大，后来简直像几个火车头一齐拉笛似的。司机慌了，那时候发电厂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司机没有停机的权力，马上打电话找值长，找不到；又找总值长，也找不到，司机更慌了神。心想，这会儿可不能像解放前似的，动不动使北京城拉线路黑了灯；又想到几个月来全厂的职工工作热情十足，要出了重大事故怎么对得起大伙儿，他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找厂主任？……汽机每分钟三千转，一秒钟也耽误不得，犹豫不得，正当派人去找值班工程师的时候，“轟”的一下子，汽机爆炸了。像头顶上的巨雷，像大炮的轰鸣，把守在旁边的司机和助手都震蒙了。震得整个大楼摇摇晃晃，墙上的洋灰泥片，噼啦啪啦脱落了一地；坚固的油管也给崩裂，油冒出来，满地流淌；转速表扭得回头，转了180度的方向；几个人抬不动的均气门大手轮被崩掉。当着值长、总值长、工程师和运行股长各负责人闻声跑来的时候，他们一看到这种惨状，也吓得目瞪口呆了。屋里烟塵迷漫，像刚刚塌了屋顶或者丢过炸弹似的。司机王志邦站在一旁，脸色惨白；两个助手扶着办公桌，呆呆地一声不响。从汽机上边手孔门看进去，内部已磨红了。打开大盖一看，里面的汽封盘、高、低压汽叶子都坏了；最惨的是跟霜打了的树叶一样，卷曲了的，变成一条条儿的，烧白了

的，缺口的……。

“完了！”职工們想：“主力机坏成这个样子，发电厂塌了半个天，这可怎么修啊！”

不在班上的工人和家屬們，也立刻听到了这个不幸的消息。街上和工人住宅里，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搓手跺脚地都在小声議論着。連老太太都唉声嘆气：“咳，这回咱們的飯鍋可砸了。”整个厂子、整条街都跟陰了天似的，没有一点活气了。

怎么办？困难来了克服它！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党、政、工、团的負責同志們都講了話。一方面安慰大家別灰心，安心工作；一方面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党提出号召：全体职工为修复六号机而奋斗！

* * *

刘德仁在天津职工干校接到王俊恒的那封信以后，簡直像热鍋上的螞蟻一样，坐不宁立不安的。好不容易等到9月20号以后，他們这一期便結了業，九个石景山的职工回厂了。这时候，他們看到和离厂的时候不同的情况：主力机的毀坏，影响之大是很难想像的。根据人們的經驗，机器坏成这个样子就沒法修理了。因为这台机器構造特殊，不容易买到备件，于是，有的人就揣測：可能裁减人員，弄得一些工人要失業了。但是主要的想法，还是解放以来，人們工作热情高漲，这次六号机的損毀事故，为国家造成这么大的損失而感到难过。因此，职工情緒很自然的受到極大影响，連家屬也在內。出事之前，电厂所在地，小小的广宁坎村的肉鋪，每天卖五六十斤不算什么，9月14日以后，肉鋪的木架子上，

一片肉挂了好久，最后还不得不放到冰箱里冷藏起来，等候买主。事情已經过了十来天，人們还經常在談論出事当时的情形：誰誰正在干着什么；誰誰听到“轟隆”的声响。有的为六号机流了几次眼泪；連隨接管組来的一位干部——最年輕、最活躍、教工人唱“爐火通紅，机輪轉動”歌子的那位干部，也难过的掉泪了。有的人几天吃不下飯、睡不好覺。

德仁他們听了这些，見到这些，更受感动。

职工們听了党、政、工、团的負責同志在大会上的安慰和号召，心里虽然亮堂了一点，但是难过的情緒还是没有扭轉过来。后来見到上級派来联合工作組，都是些精明能干的干部；又听说將邀請苏联專家来帮助修复工作；对于原軍代表和厂主任給以撤职处分……。从六号机敲了警鐘，引起这一系列的措施，看出上級的重视和决心来，职工同志們的情緒才漸漸好轉，高漲起来。

前軍代表和厂主任也因六号机“事件”受到撤职处分。处分通告的内容大致是这样：

石景山發电厂为京、津、唐、張地区之主要發电厂，其任务不仅供給人民首都市内外工矿业及市民照明用电，同时負有补助津、唐工業地区供电任务。……九月十四日十七时四十分鐘，該厂主力六号机爆炸，遭受严重破坏，給予国家财产及工業生产損害極大。……主要是領導上沒有执行政府政策所造成。……石景山事故發生的教訓，最基本的是沒有进行民主改革与長时期原封不动、并且長期保持了不合理的旧制度，不依靠工人階級貫徹执行团结員工的政策。为此，

决定予軍代表及厂主任以撤职处分……，以資加强职工在生产中的專責制和紀律性的生产教育。

从这命令里，看出来石景山發电厂要进行徹底的民主改革了。职工們心里高兴。

出事后的十七天，从上海运来汽机备件，这个消息也立刻傳遍了全厂职工和家屬們。人們非常兴奋，許多职工自告奋勇去帮助卸車。夜里輪流站崗看守着。人們兴奋地議論：

“十七天！哈，真来勁！可見咱們的鐵路都通达了。这是多少年来沒有的事啊！”

“要是旧社会，七十天也不行！”

这时，刘德仁他們从天津回来，沒有休息一天，就馬上参加了六号机的艰巨而复杂的修复工作了。德仁想：哪怕叫我擰擰螺絲，抬抬管子或者擦擦油泥哩！我都願干。这是我的願望，为修复六号机我要拿出我的全副力量。可是，德仁沒有想到，上級新派来的党的負責同志找德仁談工作，分配他担任整个檢修班的党和工会的領導工作。他一听，簡直吓了一跳，沒加任何考虑就口口声声推辞，說：“不行，不行，我还是个沒有經驗年輕的孩子，怎么能行呢！”

“行，我們考虑和研究过了。”負責同志肯定地回答德仁，又鼓励他一番。

德仁半夜沒睡覺，翻来复去想事情：修复六号机主要管事的是已撤了职的厂主任于永江，他現在的职位是工程师，讓他帶罪立功。他是个旧知識分子、留用人員，自覺了不起的很，能瞧得起我們工人？第二个，丁敬忱，助理工程师，大学毕业，爱夸夸其談，沒有真本領可是会吹毛求疵！第三个，

張子臣，解放前的工頭兒，多年前就和德仁不對勁……，德仁就要和他們打交道，黨要他去團結他們，做他們的思想領導工作，是那麼簡單和容易的嗎？

論技術，德仁也不過是三四級工的水平。解放前他跟王文炳老師傅學了一個短時期，後來調開，跟張子臣干活，兩人不對頭，德仁就沒有提高技術的機會了。三四級工，不僅那三個頭頭兒——于永江、丁敬忱、張子臣不佩服，別的一些老師傅們也會不服氣的呀！德仁除了做思想工作外，還必須下苦工夫鑽研技術才行……。

德仁越想越覺着工作複雜困難。午夜工廠的汽笛響過一會子了，他還沒有睡意。他躺的有些累，翻了一個身。思路隨着翻身起了些變化。他想：領導上說研究過了，說我比較合適，我相信黨的話。王俊恒的政治修養高，工作能力强。可是他是電氣工人，到汽機檢修班來工作不太合適；再說，他已經從生產上提出來擔任全廠的黨支委和團支書的工作了。檢修班沒有黨員，從天津職工干校回來參加工作的幾個黨員，小褚將要調鍋爐房工作，進寶原是運行工人，可能參加四、五號機的運行班。哪么，只有我是黨員了。黨員能在困難面前低頭嗎？

德仁越想越覺得義不容辭。想來想去就好像置身於緊張的修復工作里面，已經和全體檢修職工在一起干活了……。這樣，心情才覺得更為舒暢，才能平平靜靜地入睡。

* * *

備品運到，人員配齊，政治動員，思想準備，一切工作都安排妥貼，六號機——華北最大的發電機的修復工作開始

了。

直接参加修复工作的，除了工程师、助理工程师之外，就是检修班三十多工人，班长是张子臣，工会组长是刘德仁。刘德仁，因为出生在广宁坡老户人家。村子不大，所以村里老老少少差不多都认识他。工厂兴建以来也有三十来年，德仁的父亲是发电厂工人，德仁进厂也有十来年了，厂子里的新老工人认识德仁的也不在少数。不过，认识是认识，但只是一般地熟悉他的面目，可说不上对他有什么深刻的了解；也还不是都注意到新中国几亿人口的领导阶级的聪明智慧、优良品质，到底在这些小伙子们身上是怎样体现的，怎样蕴藏着、生长着和发挥出来产生了雷霆万钧的气势呢！

刘德仁从小就是个坚强的孩子，他又聪明、机灵。因为家里穷，到十来岁，父母才咬咬牙勉强地送他上了电厂员工子弟小学，德仁上学很用心，每学期考试都列在前三名。能干，爱活动，别人说他调皮；其实，有正义感和爱打个抱不平怎么算调皮呢！他的同学们都喜欢和佩服他这种“调皮”呀！当时，他那个聪明的头脑，充沛的精力，驱使他什么事情都想知道，什么道理都在开始理解，什么知识都能吸收的时候，有几个人，几件事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个夜晚，几个小伙伴在街头玩耍，他们发现遥远的荒山坡上有一个火光。“唉呀，鬼火，鬼火！”因为都曾听到大人们这样吓唬过孩子，便这样吵吵。十来岁的王俊恒不信那一套，由于俊恒的父亲——老工人王文炳，经常对俊恒进行正确的唯物观点的无神论教育，俊恒就对小伙伴们说：“什么鬼火，都是些胡说八道！”孩子们好奇，打赌谁敢去到那火光跟

前看看究竟。小俊恒便挺身而出，單人獨個兒跑了去。一看原來是什麼人插的一根香火，便一脚給蹴了。從這一件小事，孩子們都佩服王俊恒，何況他又聰明透頂，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德仁不僅佩服俊恒，而且在行動上也自然而然地受他影響呢。

學校裡有位叫王巩固的老師，常給孩子們灌輸愛國思想。抗日戰爭後，王老師到農村參加游擊隊去了。可是，他給一些孩子留下挺好的影響。俊恒和德仁這些純真熱情的孩子們，在日本鬼子統治下生活，心裡十分鬱氣。他們天天在一塊談論反對日本鬼子的辦法。學校添了日本語文課，德仁就唱着歌謠：“日本語，不用學；過了一年用不着！”

學生們都萬分厭惡學那種嘀哩嘟嚕的東西，更討厭看見那些在中國土地上作威作福的鬼子們。聽說“過了一年用不着”日本語了，多高興！盼着吧！後來，德仁他們又唱：“日本語，不用學；再過三月用不着！”

歌謠中的“一年”變成“三月”了，代表着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詛咒和對趕走日本鬼子的渴望心理。

一天，德仁在街上碰見一個日本軍官，挎着洋刀，看那分兒牛氣！德仁張口就罵上了：“他媽的，臭妹妹的！早晚都把你們這群王八蛋消滅了！”這一下可惹了大禍，那傢伙瞪着兩隻牛眼：“小孩！你的什麼說話，巴各牙路……，”一直找到學校，非把德仁開除遞走不可。混蛋老師要打德仁，德仁就反問老師：“憑什麼打我？中國人不該反對日本鬼子！”

老師說：“你不聽話，淨惹禍，學校就開除你！”

“開除？不用！我還不念了呢！”德仁說着就挾起小書包

回家去。

过了些时候，他母亲托人情给他到钢铁厂找事兒，在一天黎明时分，他随着人家到钢铁厂受檢驗，一去了他便在脚底下垫上块磚头，把十五岁說成二十三，才能当上一名小工子。不管怎样吧，他总算能够自食其力，不張嘴向父母要吃的伸手要穿的了。孩子的心里挺高兴，干活的劲头挺足啊。他没有管工厂是屬於資本家的还是官僚的；他想，只要学到手艺就能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手艺是用劳动換得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就应该劳动。所以，他一开始到个劳动环境里，心很踏实，只知道好好地干活。那会兒，他年幼，瘦弱，叫他打十二到十六磅的大錘。十几錘就累得眼前冒金花了。这样的重活兒，他一样咬着牙干。后来，他上了一个坏家伙的当。那人叫席仲山，一次，他假惺惺地劝德仁：“歇会兒吧！别累着。”德仁說：“剛歇过了。”席仲山說：“嗨，歇过就不兴再歇了吗？你歇着，我干一会兒。”正当德仁刚刚撂下大錘的时候，日本工头来到，把德仁罵了一頓。德仁不想别的，光認倒霉。后来又有那么几次，德仁發覺是席仲山使坏主意，叫年幼經驗少的德仁無辜挨罵，几乎挨打。德仁想：“噢，是这么回事呀！怪不得人們說，‘不打饑的，不打懶的，單打沒眼的’呢！得長些心眼兒了。”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德仁对付环境的小心眼兒越来越多了。德仁漸漸明白过来，干来干去是白鬧，学不到技术，白給資本家和鬼子当牛做馬。在这种心情之下，他又一次揍了日本人。本来，他心里有个底兒，对日本人是生死仇敌，在他能对付的情况下就不想放过去的。因此他見了大个子日本

鬼就罵，見了小个子日本鬼就打。这一天，一个小日本走来了，还好像来找德仁的碴兒似的有点生气的样子，沒說兩句話，德仁就“啪”地揍了他一个嘴巴，然后还捧着小日本的胳膊去見負責人。这样一来，小日本倒軟了，不敢去了。可是德仁再也呆不下去，因为他把那个小日本打了个鼻青臉腫。事后一定会被厂方發覺的。

鋼鐵厂的飯是吃不成了，回到家去。母亲虽說罵他惹了禍，可是还是心疼兒子。‘明兒叫你爹去电灯公司說說，再找个事兒干吧。’

刘德仁进發电厂是1940年，才十六岁。进到这个新的环境，学手艺技术的心情又高漲起来。开始在低压爐做修理工，跟着工头李富义干活兒。这人自私自利，爱占便宜，把發給工人擦机器的白布拿到自己家里去用。像这样的人能教給別人什么呢？德仁也看不起这号人，干了不到二年，就換做汽机修理工了。汽机修理工人席玉堂老师傅大公無私，技术不保守，人也是个老好子；曹立尙老师傅虽然是个碎嘴子，一天老說，嘟嚕嘟嚕沒个完，可是鉗工技术真是一百一。德仁跟这二位师傅時間都很短，后来跟李福明师傅几天以后就跟着王文炳师傅干活了。

跟王文炳老师傅干活，那算是走了运气。王文炳，技术高明熟練，复杂的汽机構造，如什么管子在哪兒，通什么地方，他摸的透透的。人們称他“字典”；人們說汽机檢修工都像王文炳似的熟練就好了。他不但技术熟練高明，社会知識也丰富的很，对工人和气爱护，講道理；那会兒，工人們都不知道他是地下共产党員，只知道他經常給工人們講抗日

救国道理，德仁跟了这样的一位师傅工作感到十分幸福，又是自己同学王俊恒的父亲，心想跟他多学习些本事吧。然而，真是好事多磨，刘德仁跟文炳老师傅时间不长就调到张子臣班里了。德仁心里窝火，和张子臣也合不来，自然也不会老老实实地干活儿。过了不久，张子臣找了德仁来。说：“你明天到修造厂去做工吧。”

“谁的主意？”德仁问。

“当然是咱们维护股股长王志章的意思了。”

德仁一听，知道张等闹宗派，排挤王文炳老师傅，张把德仁看做是王文炳的人，调到他班里来也不大好指使，又怕他为夜班费问题串通事儿，就假传圣旨想把德仁撵走，来个调虎离山计。

“王志章不认识我，不知谁出坏呢？”德仁说。

张子臣故意不做正面回答，说：“王志章看你不大顶事，才要调你。你要硬不去，这里可没你的事儿干了，就得拿你‘打伤耗’（物件备品或者废物的意思）了。”

德仁一听到‘打伤耗’几个字，心里的火儿就立刻冒出来，他想把事儿挑明，说：“王小辮（王志章的绰号）是南方人，也不下现场，他怎么会知道我们‘臭小工子’的技术高低？我看这里头一定有人出捻子！不过，不要紧，我不就是广宁坎当街人吗？不叫我吃这一份儿我可以回家抱孩子。要真是王小辮在这儿乱戳鼓，他可是比不的我，他是个外乡人，老子主得叫他‘孩子拉屎’挪挪窝儿！不信，咱就走着瞧！”

张子臣一听，心想德仁不是好欺负的后生，说了声“我

再給王股長說說看”，就走了。以后再沒提这个碴口。

从那，德仁干着真是灰心。在那种場合下，还有什么心情鑽研技术。日本鬼子統治时期，一个月發給几十斤豆餅面。吃不飽还能干活兒；干脆磨洋工。有时德仁上了班一交卡片就溜，鏗个螺絲母，該十分鐘的干它半天。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來接收厂子，揪着飞机尾巴來的新厂長和職員們，跟鬼子一样欺压工人。工人們生活沒有一点改善，厂方叫成立什么“工会”，流氓坏蛋們乘机为非作歹，在职工中發展国民党員和特务組織，把卖布头兒的小販抓起来，說是八路軍偵探进行拷打盤問，半夜里“眶眶眶”砸門拿着手电棒兒晃呀晃地查戶口……，如此种种，使德仁这些正派工人十分憤懣，为了促使反动派早日垮台，在工人中展开了怠工运动。机器房、工具室的牆上到处写着：“三点水加包字。”（工人哥兒們誰都明白这里面的意思——那就是“泡”）“肚子吃不飽，干活干不了。”“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們的肉……。”

可是，德仁的确看不清楚光明前途，过去的同学，像王俊恒，过去的师傅像王文炳……，都不在一起干活兒，很难接近，德仁对自己的环境不滿，下了工就鑽到“牌九局”里消磨光陰，找精神寄托。这样的生活方式一直混了一二年，到解放前几个月，才和革命活动接近，參加进步的讀書会、歌咏队等党的外圍組織。解放后，誰也沒劝他，他就和賭博場絕了緣，和一幫青年搬到厂里住。工作學習和生活都活躍起來了。

1949年4月發电厂开始建团，刘德仁第一批入了团；当

了团小组长。5月，就到天津华北职工干部学校去学习，德仁在学习上一点不肯落在别人后面。学过了社会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纲党章……以后，思想很快的提高了一步，就在当年8月，他光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 * *

刘德仁从天津回到厂子的时候，他还是个预备党员，为了工作需要，也根据他的思想认识和行动表现，上级党决定给他提前转正，担任了修复六号机检修班的党和工会的小组长。不久，随着全厂的机构改革，成立了汽机分场，德仁便担任车间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在工作中，他首先拿自己的模范行为来带动群众。工作做起来也真够拚命的。机器的无论哪一部分都得大拆大修，一点都不能大意，德仁从思想上认识到机器的安全运转是和高度的检修质量分不开的，所以在工作中他不断地和大伙说：“咱们最要紧的就是活儿要做得细！别一大意，等干完了，一试车再出了毛病，还是不能转，再一返工，可就老鼻子啦！”

那会儿，大伙都是拚命地干，恨不能马上修好发电。但是工程师、助理工程师和领班三人的主意往往不一致，一人一样，互相扯皮。比如，装发电机心子的时候，于永江建议用吊车吊着下大盖和轴，丁敬忱却主张把轴先垫起来再装盖子，他们意见分歧，工人们只好呆着。返工活不断出，起重工也常顶嘴。有些人情绪就渐渐低落。“好，我们白天黑夜地干都白搭了！”

德仁和他們才一接触，就感觉到于永江不敢负责任，背着个撤职处分、戴罪立功的包袱；要嘛遇事不出主意，要嘛

出个主意就被丁敬忱、張子臣反对掉。丁敬忱呢，政治上不可靠，常常捣鬼；張子臣呢，剛愎、固执、主观片面，遇事不和群众商量。刘德仁看到这种情况，从心眼里恨他們。当时德仁也不懂得“团结技术人員”是党的一条政策，認為沒这些人，工人哥兒們一样能把电發出去。虽然也知道我們还要發展生产，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認為只要工人阶级（当时認為他們不是工人阶级）一鼓勁，就建設起来了，也不用这些人。尤其看到丁敬忱捣鬼，于永江沒主見，越發感到这些人实在該“滾蛋”。德仁这种思想經党总支書記反复談过几次話才慢慢扭轉。德仁听党的話，思想搞通了，就对这些人从政治上团结，生活上接近、照顧。开始，他确实是硬着头皮捏着鼻子去做这些工作的。于永江害病的时候，德仁到他家里去探病慰問；張子臣搥了腿腕，德仁把他背上汽車，又陪同送往医院。看起来，德仁的行为和脾气同当年罵王小辦“老子叫他‘小孩拉屎’擲擲窩兒”的时候多么不同啊！在德仁自己心里也感到，他是有意識地在做工作，要不，說什么也不会对这些“非工人阶级分子”抬举和客气的呀！

当德仁覺察到領導意見不一致，因而返工活不断出的时候，就積極主动地建議組織“党、政、工碰头会”。坚持提出在碰头会上統一不了的意見不能往下放。又建議在工人中間也組織碰头会，把技术和工作上的意見都拿到碰头会上来研究。大伙出主意，好处大的很，連不团结的現象也解决了。德仁的这些建議得到党总支的大力支持。碰头会后来發展成技术研究会，在全厂各車間推广后，对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德仁又抓紧了生产上的积极职工进行帮助、培养，好的吸收入党。有一个叫韩伯清的工人，比德仁大一二岁，在旧社会是个老蔫，从来不多说话，人们很少看到他有过笑脸；他天天就知道上班干活儿。可是一解放，韩伯清变了。王俊恒、刘德仁、李进宝他们组织的秧歌队、歌咏团，韩伯清首先报名参加，他打扮成老太婆，耳朵上挂着两颗红辣椒，扭的欢极了，街上的大娘、大伯、姊姊、妹妹们看了没有不笑的，说是韩老蔫大变样。其实，他不仅在生产上变了样，思想上也大大提高，工作上也大踏步迈进了。除他以外，班上还有个叫赵敏的小伙子，生产、学习上也表现得特别好。再说，他们的家庭成分、个人出身，俊恒、德仁都很了解，便在六号机修复过程中，吸收了他们入党，建立起汽机支部。他们这些党员，结合着生产和业余活动，在职工中普遍而深入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宣传的中心内容是“六号机早一天修复发电，咱全北京市就早一天恢复光明，咱们工人阶级是不怕任何困难的，只要我们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掉！”职工情绪因而就越来越高了。

厂子里邀请的苏联专家来到了。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刘德仁在解放前就听王文炳老师傅谈过苏联怎样好，解放后学习、读报，很清楚地知道苏联老大哥对我们无私的帮助。厂内的职工们知道苏联专家是来帮助修六号机的，从心里眼里表示欢迎。

大家看到四十多岁和蔼可亲的苏联工程师切尼斯考夫同志刚刚到厂，不肯休息就赶到现场去看机器。一上大楼就和那些拆修机器的油手泥脚的工人们热情地握手。问了几句话，随



后脱掉外衣，鑽进發电机里面去，和工人們一道工作了。大家都非常感动！

德仁当时就抓紧向大家进行国际主义教育。他說：“国民党反动派統治时期，美国人上咱們这兒来过。同志們还記得那时的情况吧。美国人进机器房捂着鼻子，嫌味兒。狗腿子把咱們工人撥拉的远远的。美国人一看机器就說，这机器太破爛，不能使了，干脆把它扔到海里去！扔掉怎么办？叫买他們美国的机器。可是苏联工程师一来，就給想办法，要把已經破坏到这种程度的机器早日修复，帮咱們克服困难，咱們應該对苏联工程师尊敬，向他們学习。”

德仁在夜深时，陪同苏联專家一起工作，他怀着爱戴和尊敬的心情劝專家說：“您白天黑夜地工作，太辛苦了。切尼斯考夫同志，回宿舍去休息吧！”

“什么？”沒想到專家有点激动，眼光从眼鏡框上边射出

来，說：“多少天了，北京还黑着灯呢！要是在莫斯科，我們保證一分一秒也不能停电啊！”

几句话，打动德仁的心，而且給他啓發，德仁建議行政，把工人分为日夜兩班，輪流不停地工作，这个建議馬上就得到行政上批准；工人們也特別滿意，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四个多月的修复工作就这样一股勁兒干到底。

德仁不單是六号机修复工作中的帶头、組織和宣傳鼓动者，在技术上他也开动了腦筋，想出好多合理化建議来解决裝修时候的困难：比如初次裝汽机叶子的时候，他細心檢查出新来的汽叶和原来的有些兒差別，就向于永江建議得找一下‘靜平衡’。于永江不同意，結果裝上以后震动大，还得拆了按德仁的意見調整了比重才行。另外还解决了許許多多过去在旧社会外国人和工程師都棘手的一些問題。由于德仁刻苦鑽研和認真向苏联專家學習的結果，技术大大提高。他的每一件合理化建議都是費尽了腦筋，想成熟了再提出和工人弟兄們一起研究，有時間先向苏联專家請教，然后建議給行政。因为德仁的細心进行思想工作，刻苦的鑽研業務，依靠上級党的領導，認真學習苏联先进經驗，團結技职人員，普遍發动群众，在1950年1月間，六号机的修复工程便順利地提前完成了。

* * *

六号机能开动，發出电来，人們心里都有說不出的高兴，可是一开机，震动的特別厉害，不能并入京、津、唐、張电力網里运轉。大家情緒大落，都瞪了眼啦。所有参加修复六号机的职工，又成天在想办法解决震动問題。德仁这些日子連飯

都顧不上吃，腦子里時時刻刻裝着“震動”問題。到班上就圍着六號機打轉轉。他的一雙手不斷地抓頭髮；有時候把耳朵貼近機體去諦聽汽機內部的聲音。夜里，他也在深思苦慮地琢磨解決辦法。這晚，已經過了午夜，他還坐在辦公桌旁考慮問題，又是細想，又是畫圖。黨總支書記站在他背後，看了他幾十分鐘，他也沒有覺察。最後，總支書記輕聲地說：“休息吧，德仁！要注意身體啊！”

幾天來德仁又看到一些同志的愁眉苦臉。幾個月來同志們的辛苦，莫非白白浪費了嗎？

和蘇聯專家商量，又把六號機停下來，找“動平衡”。這是很困難的工作，過去沒有找動平衡的經驗。蘇聯專家建議用同步馬達找平衡。就是用四號機來帶動六號機，這在過去是連聽說都沒說過的。先找右側，老是找不准，每次找的都不一樣。再找左側，兩三次就找好了。再找右側的時候，又有差別啦。德仁便從這一點判斷問題，他鑽進發電機風道里面，仔細諦聽，聽到有微微的“哐啷”“哐啷”的聲音，他心里說：“有事兒。”出來告訴別人，檢修工韓伯清鑽進去聽，也聽到那細微的聲音，他們便決定把機器停下來檢查。德仁想了些辦法，從發電機心子上找問題，終於發現發電機心子里有了東西。細看才看出是幾塊碎木頭；他用鐵絲勾出來，攔在天平上一稱，足有138克重。

木頭一發現，馬上提高了工人們的警惕性。他又組織了六號機的保衛工作，由黨員們帶頭日夜輪流值班看守，晌午吃飯也輪流着去吃。德仁還在工人中進行教育，要大家時刻記住毛主席告訴我們的話，對不拿槍的敵人更要警惕。

六号机完全复活了，震动也大大減輕。同时在苏联專家的具体帮助下，使六号机帶到它应有的容量（这是从来没有的事）。终于把一个“老爷机”“肺病鬼”修理健康了；苏联專家还帮助我们編写了一本六号机的典型規程。使工人们無論在运行或檢修方面都有所依据，心里有了底。誰看到这种情形不兴奋啊。六号机停了四个月的时间，又大放光明了。光明！光明就是和工人階級分不开的呀！

以后怎么样了呢？以后，我們的刘德仁同志当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了。他的事迹，上面仅就修复华北最大的六号發电机过程粗略地叙述了一下，至于其他，至于在修复六号机以后的工作、技术和政治上的大發展，大飞躍，留到后面再談好了。

三十九、三件大事为了一个主题

在修复六号机过程中，厂里同时进行了几件大事情。一件是机构改革；一件是整頓职工队伍；一件是組織职工学习。这三件大事和生产上大修六号机齐步前进。搞的很集中，很紧张，很活躍。几个月的时间，厂子的面目大大改变了，真是翻天覆地、干劲冲天。

三件大事为了一个主题，就是民主改革。

旧的一套机构，妨碍了生产力的發展。比如，以前層次过多，一个司爐司机助手上边有司爐、司机，再上边有班長，再上边是值班工程师，值長，运行股長，运轉課長，厂主任，这么多層次！六号机的教訓，司机因沒有停机的权力而遭到

毀滅性的破坏。工人連落个螺絲的权力都沒有。一方面工人直接感觉到旧制度的不合理，需要改革，同时根据苏联專家的建議，在1950年2月間进行了机构改革，厂里無論是党、政、工、团的领导同志，都下了很大功夫，細心研究，吸收外厂經驗，学习苏联，把旧机构改变成分場負責制，也叫做“区域管理”。即分成平行的五个車間：机、电、爐、运、修（汽机、电气、鍋爐、运行、修理）。提拔了大批工人干部。王文炳、刘德仁、陆荣芝、韓伯清、張利明……提拔为厂一級或車間一級的领导干部。把知識分子技术員放到各車間，走上和工人結合的方向。从此，厂子从計劃管理上、技术管理上都大大提高了一步。大机器修复后，架子摆开，带来了嶄新的气象。

关于机构改革，大力提拔工人干部，事前早有准备，1949年8月間，就通过党员李守勤等同志协同党支部挑选出百十来人，送到市委干訓班学习了三个月。这里面主要是工人，也有少数技职人員。在学习中百分之八十入了党。这批新生力量，回到厂里，参加了各車間工作和生产中去。起了很大的作用。接着在厂里也搞起訓練班。短期輪訓，一月一期。学习党的基本政策、社会發展簡史……，全体职工对这一学习运动，極为重視。都说思想認識、政治觉悟提高了很多。学社会發展簡史，对于“劳动創造世界”、“猴变人”的道理極感兴趣。

不过，在組織技职人員学习中，費的力气是不小的。过去資本家和反动派时期，把技职人員和工人之間故意造成不可逾越的鴻溝，使兩方面互相敌視。解放以来，接管組和工

作組的同志們在執行團結教育技職人員方面，都作了不少工作，但是也有些缺點。六號機事件發生以後，引起上級特別重視，派了幾位強有力的幹部如郭義敏、吳明……同志來廠。為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徹底改變舊局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吳明於11月間來廠。他過去是農民幹部，擔任過區、縣委書記，工作有魄力。來了以後，先任廠里支部書記，不久，到市委干訓班的百十來人回廠以後成立起總支，他又擔任總支書記。

以後，接着辦輪訓班了。吳明、郭義敏等同志他們有意識地把技職人員和工人混合一起編學習組。這也是從來沒有的事。過去職員怎麼和工人坐在一起呀！職員住的屋子怎麼會讓工人進去呀！在工人方面，也不高興這麼做的。他們壓根兒就討厭職員們呢。他們是“先生”，不願意湊合他們。現在，黨的幹部費了很大力氣，說服兩方面——工人同志好說服；技職人員有的確乎是口服心不服，憋着股子勁兒，懷着委屈心理，甚至有的懷着“大勢所趨，只得如此”的心情接受的。於是，北廠職員宿舍的大門打開了。每天下了班，職工分組到職員宿舍各個房間開學習討論會。有的技職人員心里雖然不舒服，但是也不好說什麼。學“猴變人”是大事，是改變人生觀、世界觀的大事，還能注意這些小節嗎？

在討論會上，也經常爭論。一次，有一位技術人員發言說：“我家有百十畝地兒，是個貧寒之家……”話音未落，一個工人‘騰’地站起來，粗聲大氣地說道：“你家有百十畝地算個貧寒之家，我這房無一間地無一塊的算個什麼家庭出身呢？”引得全屋里哄堂大笑。都熱烈地參加了這一爭論。

与此同时，把过去的工人把头，流氓分子，反动党团里面的骨干、爪牙……进行了处理，整顿了工人阶级队伍。在这以后大批工人干部站起来了，担任了生产上的重要骨干，这些同志都有实际生产的经验，都有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都有联系群众的优良品质……。

四十、工人干部陆荣芝

上一节提到机构改革以后，提拔了大批工人干部；在这一批干部当中有一个叫陆荣芝的。陆的身世、经历和被提拔为干部的过程，很能代表一般。但是也有些较曲折复杂的过程，下面想比较仔细地介绍一下。

故事须从1949年春叙起。一天，几个支部委员坐在一起，研究发展对象的时候，组织委员老杜提出陆荣芝来。

“陆荣芝？”支部书记问，“干什么的？哪三个字？”

“陆军的陆，荣华富贵的荣……，”宣委王俊恒替老杜回答。

“芝是草字头底下加个之乎者也的之字。”老杜接过去说。还蘸着从茶缸子里倒出来的水根儿在办公桌上写了写。

支书听了这个名字，嘴里说着“嗯”，可是眉头微微皱起来。他心里琢磨：刚刚解放，发展党员应该首先在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当中着手，对恢复生产作用才大；至于工厂附属小学的教师、医务室的护士、或者总务科的打字员……，可以往后推推。

“你们提的这个——”支书本来想说‘这个女孩子’，但

是改了口：“这个陆荣芝，她，她在哪个部門？”

“运行股。”王俊恒回答。

“运行股的鍋爐房。”老杜补充。

“噢？”支部書記有点惊奇。

“解放前掩护过咱们的地下党员。”王俊恒介绍。

“我們老早就打过交道。”老杜进一步补充。

“噢？”支部書記不得不仔細問了，“那么，这个同志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怎么看来非常像女同志的名字？”

老杜和俊恒一听，就哈哈大笑起来。老杜說：“这位‘女同志’長的身高丈二，膀闊三尺，豹头环眼，虎背熊腰……”他把《三国演义》上描写張飞的語句都搬来了。俊恒制止住他，慢言慢語地說：“算啦，別討論陆荣芝是男是女，什么样兒；还是談談陆荣芝的思想覺悟、工作表現吧！”

* * *

陆荣芝原名陆秋立，是發电厂的推煤推灰工人，長的样子虽然不像老杜說的那樣，可也差不太多：确实是个又黑又紅、五大三粗的汉子。他十七岁以前，生活在冀中农村。家庭貧苦，父亲租种着地主的几亩薄田。日本鬼子侵占着他們家乡的时候，他忍受不过，来到工厂做工。推煤推灰工是發



电厂里最劳累，工资最低的工人；解放前他向国民党反动派的狗腿子进行过多次自發性的斗争；解放后做工非常积极。工作组的老杜曾经找他谈过几次，也从侧面了解过他。准备吸收他入党，支部别的委员基本上都表示同意，让老杜再和他联系，就可以填表了。这一天下了班，吃过晚饭，老杜来到陆荣芝的宿舍里。

“来，坐到我这一亩三分地儿上！”陆荣芝指着自己的床铺招呼老杜。

“请，请！”老杜不坐，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他在屋里踱达起来。

老杜原来也是农民出身，抗日战争期间，他参加了冀中抗日游击队，担任过多年的支队长或指导员的职务。在残酷的环境中，他们买不到政治理论书籍，便搜罗了《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古典小说作为干部学习的材料。和敌人作战，运用了不少古人的作战经验。有一夜，向汉奸岗楼喊话，开始谈些国际国内形势，敌人不听，敲锣打鼓地混扰。后来老杜向他们讲“三国”，敌人才听进耳朵里去。老杜先讲了一段“徐庶进曹营”，接着，学习诸葛亮骂死王朗的一套方法；虽然没有骂死汉奸，但是有不少敌人跑下岗楼来投降了呢。

老杜对几部旧小说，因而很喜欢，可以说视如珍宝。解放后，他在工作中，还常常引经据典地搬些“三国”或“说岳”上的例子；和熟人说话也爱带些“请、请”“岂敢、岂敢！”……半开玩笑的口头语儿。

老杜是个性格爽直的人，可是这次和陆荣芝说话，却转了不少弯子。

“今日風兒很大，煤場上千活一定挺冷吧？”老杜心地問。

“不冷！”柴芝說得很干脆。

“這些天，你們班上弟兄們干活情況如何？”

“嗨！可來勁！”

“籌備工會，大家選你當班代表、股代表，你感覺怎麼樣？”

“努勁干唄！”柴芝和老杜不同，說話不習慣用成語。比如別人說‘努力’，他說‘努勁’。別人問他為啥，他說‘努勁’比‘努力’更深一層兒。

他們又談了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問題；老杜問了幾個工人情況，提到張利明，柴芝忽然問道：“聽說張利明入了黨；我就不興入黨啊？”

這一下問的老杜挺高興。用不着再繞彎兒，趕緊回答：

“興，興！——可是，你為何要入黨呢？說來我听听。”

“嗨，你真把咱看成大白薯了。那天你不是做了報告？咱懂啦：為了解放工人階級，為了解放全人類！還有什麼？——對，不怕犧牲……。”

“好，好！”老杜稱贊地說。隨後，嚴肅地講了講如何做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並且告訴他支部曾經研究過了：“那，你先填個表吧！”老杜有準備地從衣袋里掏出一張表格來。

“填表？”柴芝楞了一下，接過表格來說，“我不識字啊！你幫我填填不行嗎？”

“好，”老杜和藹地說，“今兒晚上不開會，也沒有其它工作，你就仔仔細細地說一說你的經歷……。”

“对！”陆荣芝的脸上，兴奋起来，發着紅光。他原来坐在凳子上，现在蹲在凳子上了。

他出生在冀中安平县的一个农村。奶奶給他起名叫秋立。他开始記事的时候，給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事兒，除了全家吃的粮食很少，主食是糠糠菜菜以外，就是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四叔叫‘門楼’的，因为家里养活不了，送給别人家頂了債。这件事給小秋立很大的刺激。一个亲人，小伙伴給夺去，使得一家人生离死别。不知道小小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是不是耽心自己也被送給陌生人家，是不是耽心家里不管吃飽肚子……，从五、六岁起，别的富裕人家的孩子还偎在娘怀里，他就像真正的庄稼汉似的把家做活了。他背起能裝得下兩三个小秋立的大筐篋，在树林、在荒坡，到处寻找。当他發現一枝干枝，一片树叶，一叢枯死的老草，就像揀到宝贝似的放进背后的筐篋里。

“肚子餓了，晌午錯了”。小秋立还在为了拾滿筐篋而奔跑呢。最后，累得呼嚕呼嚕地背回家去，向正在燒飯的母亲跟前放，說：“娘，燒这个！挺干！”

“咳，真是，小子不吃十年閑飯！”

娘高兴，夸奖孩子。可是，看見孩子头上騰騰地冒着热气，臉上叫汗水冲的一条条泥道道兒，就又心疼起来。惦记孩子肚餓，用燒火棍把埋在灶火膛一边热灰里的白薯，扒拉出来，在鍋台上摔摔灰，遞給秋立，小秋立感激地笑了，伸出粗糙的小手去接。娘又說：“燙！小心！”

“不怕！”小秋立說着，早就掰成兩半，放到娘怀里一半，自己拿着另一半，嚙嚙哈哈地吃起来。

到他的身量長到能把兩桶水挑起來的時候，他就代替父親，擔任了挑水的職務。一副担子放上肩膀，兩個空桶隨着步子搖擺，還像唱歌一般地發出音響。挑回水來的路上，小秋立稍稍歪斜一點身子，邁着沉重的脚步，呼呼氣喘，可是很高興。

“喘！這小子不錯，挑動水啦！”看見的人們稱贊着。

到十五歲，秋立已經長成一條大漢子了。雖然年年吃糠咽菜，可是在日夜的勞動中，鍛煉成滿身是勁，一杠子打不倒的小伙子。這樣的小伙子，父母是多麼喜歡啊！老人們把一切希望放在他的身上，盼望着孩子們用無窮的體力來獲得幸福！

可是，日本強盜來到他的家鄉，人們過着奴隸生活。這樣過了幾年，日本人抓壯丁成立漢奸隊——當地老百姓稱為“棍兒兵”的。秋立的父母耽心秋立被捉走，就叫他到親戚家躲避。在一個黑夜里，秋立跑到姑姑家去。早晨，鬼子、漢奸就來砸門了。

“你兒子呢？交出來，趕緊的！”鬼子、漢奸進門就喳呼。

“你找小秋立嗎？幾個月以前就出門啦！”老父親說。

“上了保定府！”母親加上一句。

“胡說！不行！”

逮走了老父親，壓在鬼子崗樓里。打、罵、壓杠子，把一個老實人折磨得死去活來。人，勞動人，不怕受累，不怕挨餓；可是忍受不住窩囊氣。父親被折磨了三、四天，回到家臥病不起，不久就死去。咽氣以前，也沒看到心愛的秋立一眼，他叮囑秋立娘說：“孩子娘，聽我說，常說的俗話，‘人

挪活，树挪死’；咱这一塊兒，成了活地獄。捎信給秋立，叫他奔活路，远走高飞吧！”

过了些时候，抓兵的风潮过了，伪乡长要民伕替鬼子挖封锁沟，按门头要，不出伕的须拿钱雇人。秋立家哪里来的钱！他从姑姑家回家来了，跟大伙一块出伕干活。这是人受的罪吗！动不动身上被鞭子抽打，大腿上挨了枪托子……把秋立折磨得傻呆了。饭也吃不下，端起碗来，楞半天才想起往嘴里送一口饭。娘看着这情况，心肠绞痛：“咳，”娘说，“你走吧。你爹说过，叫你逃活命！……”

夜里，秋立睡不着。心里七上八下地不舒服。他要离开家乡，生活了十几年的故土。这里一草一木也是秋立熟悉的，庄南的大水湾，家西的枣树林，连胡同口上的那盘石碾子也都是亲切的……。鸡叫以后，他匆匆起床，向母亲告辞，头顶着星星，离开家乡，直奔保定去了。

* * *

在保定呆了几个月，找不到工作。听说有些同乡在京西发电厂做工，他便投奔发电厂来。真是像他自己说的，成了“没头的苍蝇乱撞”啦。可好，来到京西，没呆多久，就托人进到发电厂里做了一名推煤推灰的工人。这种活儿很艰苦；炉灰冒着一人多高的火苗子往外推，烤的头髮都卷曲了；耳朵像刀割的一样，衣服常常烧着；有的人，没走出炉灰道就热昏了倒下去。

陆秋立从农村才来不久，只知道老老实实干活，不知道抱怨。他想：该吃点苦就吃点苦，该受点气就受点气；恐怕是命该如此，没有办法的。过了些天，日本投降了，秋立心

里挺高兴，以为这一下可熬出来了。哪知道，国民党接办后，厂子里的情况，工人哥兒們所处的地位，所过的生活，用秋立的話說：“照常如是！”工作条件还是那样糟；生活呢？配給一半谷子，一半是發霉的小米……，就是这样的生活还不怎么穩当，說不定什么时候飯碗被敲碎了。

有一次，陆秋立上后夜班的时候。后夜——沒有在后半夜做过工的人是不曉得那个滋味的。那会儿吃的不好，精神不充足。秋立推灰推了几十車子以后，困乏的支撑不住了。困乏比飢餓还难忍受。总是觉得头重脚輕心里翻乱。“我为了啥受这个罪？”开始問着自己，解答不上来就更松了勁，脖頸上像挂着千斤閘。“去你娘的！”他想冲着爐灰堆罵一頓，可連罵街的力气都沒有了。他抬起干澀的眼皮望了望旁边，是爐灰道旁喂馬的房間，他下意識地拖着好像扣着鐐銬似的兩条腿走了进去，就在門后的牆根处，蹲下去，又順勢側倒在那兒，他睡着了……。

他夢見了什么？好像在万里千頃的平原上揀柴，心情舒闊，自在逍遙。忽然，日本鬼追来了，他来不及躲避，因为兩腿不像自己的，心里正在焦急万分，“嘭”的屁股上挨了一槍托子。随着疼痛，他醒来了。他看見了什么？在灯光下，站着二头子“大金牙”，还想再踹第二脚。秋立站起来。

“媽的皮！誰叫你‘撻把’冲盹兒？”像狗呲牙一般，“大金牙”的金牙在灯光下一閃一閃，叫罵着。

秋立心里起火落火，压下了。驚驚地出了馬棚，走向爐灰堆去。第二天，上班時間，陆秋立去拿卡片，沒有了。这么一点事兒，他被开除出厂，他的飯碗子被敲碎了。

秋立失了業，还住在集体宿舍——当时叫下房兒，跟同乡哥兒們一塊吃飯。可是，厂里巡警長楊大鼻子竟找邪碴，常常提着大棍棒找他，赶他出厂。

他搬到别的工人窩棚里住了三个月——这三个月好心焦啊，像过了几年似的。后来，找到一个姓梁的老师傅，是个远門亲戚，論着叫舅，他便求他說：“梁大舅，我这样呆着不行啊！我还得上班！”

梁师傅同情他，拐弯抹角托門子搬窗戶地求了求当时厂里的大把头閻子民，算是得到准許了。

“不过，你得改个名兒！”梁师傅告訴秋立。

“行，这还不行啊！胡起个名算啦。”秋立高兴了。想了想，不知怎么一下心血来潮，想了一个女人的名字。梁师傅領着秋立到事务課去办手續。那里是个高窗台，开着一扇窗，像个当鋪似的。办公人在屋里坐着，露着半个腦袋。梁师傅和秋立站在窗外。

“你叫什么名字？”办事人在屋里問。

“陆荣芝。”

“哪个芝？”

“我知道哪个芝？我又不識字！”

“多大？”

“十八。”

“这么大个子，才十八？”

“看，他不信呢！”秋立想，又机伶地回答說，“二十八！”

“唉，这还差不多，”办事人开玩笑似地填好了卡片，然后滿不在乎地說：“行啦，明天上班！”

就这样，陆秋立变成了陆荣芝；青年人变成了壯年人！

* * *

复工后，在大头子孙炳立、二头子金万宁手下干活。活兒还是过去那些，头兒虽然换了人，还是和过去一样，不拿你当人支使。头兒們說話嘴里不干不淨，罵罵呱呱，有时还动手动脚。

本来，从失業到复工，心里感到一点点温暖。这一下，又凉半截了。陆荣芝想：这个世道，好人怎么这样少！在家乡，受地主、日本鬼子的气；出門来，受国民党狗腿子和坏把头的氣，还有个完沒有？莫非得受一辈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二头儿金万宁还好些，他胆小怕事，主要是听大头兒的喝。大头子外号“孙瞎子”，長的其貌不揚，可是爱喳兒喊叫、狐假虎威地欺压工人。陆荣芝跟了这个家伙干活真算倒了邪霉了！

不过，世界上的事兒不是那么絕對，到一定时候，情况就有可能轉变个样子……。

陆荣芝干着活，和一个叫謝金成的工人閑聊話，謝說有个李貴臣，开除又上了班，他把領班揍了一頓，領班倒老实了，沒事。——这几句話在荣芝心里有了印象。

“是嗎？”荣芝想，“穷人在这兒沒好气受。反正得想个法兒。常說的俗話：馬善有人騎，人善有人欺。我，光身一个人，沒拉家帶口。我看，一个耳朵的罐子掄吧！要是再有人往地里踩我，决定：揍！”

說是下了决心，其实才是一顆新种籽的萌芽，一塊面肥

的开始發酵，它还很稚弱，沒力量；还不懂得怎样生長，也不曉得命运將怎样等待着他。

这一天，荣芝和李惠民一班推車。李惠民是个干瘦、貧血、眉目清秀的青年，干了一会兒惠民就累啦，蹲在一旁抽烟。被孙瞎子看見，就像天上打霹雷一样，呱啦呱啦地嚷叫起来，还帶髒字罵开了，“嗨，他媽的，光啄鼓那一袋鷄巴烟啦？还干活兒不？”这还不算，并且把他倆推的煤車从小鉄道上揪到一边。荣芝一看心里就燃起了火，可沒表示出来。他和另外几个工人，一起向孙瞎子說好听的：“得啦，得啦，我們这就干活兒。孙头兒生这么大气干啥？”說着几个人把煤車又揪上鉄軌。

孙瞎子不听这一套，气还没出，过去又踹了李惠民一脚。这一下可把荣芝气炸了。他握紧了像大榔头般的拳头，向前蹩了兩步，問孙瞎子：“你小子想怎么着？”

“沒你的事，你甭管！”孙瞎子对荣芝說。

“沒我的事？我們倆推一个車。你打算怎么着？——操你的奶奶！”

荣芝抄起地上的一根八号鉛絲擰成的麻花繩，冲着孙瞎子擡去。孙瞎子的眼睛并不真瞎，早看清荣芝手里的家伙，一个箭步蹦出老远，躲到别的工人身后，嘴里嘟囔着：“你看，你看，我又不是跟你过不去，这是为啥……”溜走了。荣芝被人們攔住，說劝几句。他們也是为荣芝耽心，怕他惹出禍来。

其实，事情过去，荣芝心里也有点嘀咕了：自己一向老老实实，怕惹事生非；虽然是现实生活逼的他發了这么一下爆仗脾气，免不了才鋸合的飯碗兒又給敲爛，还到哪兒去呢？

第二天，到上班的时候，荣芝往厂里走着，像很疲倦的

样子。他估計几分鐘以后就要出什么事兒了。但是，意想不到，卡片还照样兒放在那里。

“哈哈，沒有开除我呀！原来这些家伙們是欺軟怕硬，不吃好粮食啊！好嘞，就这么干啦！”

荣芝心里开了一道亮縫兒。

* * *

爐灰堆上的土皇帝孙瞎子的宝座，外表看来沒什么变化，統治地位还好像很稳固似的，但是實質上自从叫荣芝的一頓大罵和麻花繩的起义，統治基础就慢慢动搖了。陆荣芝被逼抄起麻花鉛絲繩兒，在某种意义上簡直类似大澤乡的陈胜、吳广。确实，在孙瞎子看来是个不得了的“事变”。事情是有了开头兒，就会有所繼續和發展的。又一天，爐灰堆上的朋友們在嚙咕一件事。荣芝鬧明白是这样：六个人的活兒五个人干；另外一个空額叫孙瞎子吃了。开支的时候，孙就盖上个假戳記。

“不行！”荣芝說，“等孙瞎子来了問問他！”

一言未尽，孙瞎子来了。荣芝站起，迎面走过去說：“孙头兒，你喝工人哥兒們的血，还想活着不？”孙瞎子心里明白，表面裝糊塗。荣芝脫下鞋来就要扣狗日的，孙瞎子一溜小跑不見了。他偷偷地到會計那里，把盖的假圖章刮擦掉，还給这一班添了个临时工。

对孙瞎子說来，“事变”鬧的最凶的要算第三次。像他这种人，大概記性不好，也許他是“不和‘粗人’一般見識”，發生了兩次矛盾斗争，並沒有开除陆荣芝，可是孙瞎子还是爱喳兒喊叫。第三次事發生在爐灰洞道里。推灰哥兒們这天

“紧折班”，早8点下了后夜，下午4点又上前夜班，人們很疲倦。裝的又是冒着老高火苗的紅煤火，烤的难受。他們动作迟緩了些，孙瞎子就忘記麻花鉛絲繩和硬鞋底子了。

“就磨洋工啦？为啥不快裝？吃飯怎么不懶洋洋的哪？
嗯——”

人們正沒好气，他又来了个火上加油，好啦。陆荣芝也看出大伙的心情来，叫胳膊肘向身旁赵师傅一拱，老赵便拿起大铁锹来，“噹”地一声摔在铁軌上；荣芝也“煞”地举起铁铤来，罵道：“我劈死你这个狗日的！”众人也齐声呐喊：“揍！揍！”

孙瞎子一看不好，倒是真机警，和上兩回一样，一溜烟似地跑掉。

行啦！孙瞎子們明白啦！原来只有一个陆荣芝，現在多少个陆荣芝起来了！工厂里各車間的怠工运动普遍地展开来。工人們一班班的不干活。工資少，写加班。运行工上白天班的打前夜加班，怎么个打法呢？下午4点鐘下了班，按說就該上班了吧？不，先洗个澡，換上衣裳到街上躑达一趟，比如买点咸菜回家就窩头吃呀什么的。到9点或10点多鐘再上班。上后夜的輪流換班睡覺。一次，大修五号發电机，从推灰工人中調了几个帮忙的，拉繩开吊車，陆荣芝荣幸地被挑选来，他和另外一个工人到修理場抬軸瓦，兩人抬半拉，起重工刘头兒一人扛半拉。修理場到机器房不到半里路，荣芝等二人从上午8点鐘拴好了繩，抬上肩膀，抬到机器房正好拉12点的汽笛；下午抬第二次，走到中間，就休息起来，刘头兒看見不滿意，嘴里不干不淨地叨叨几句，荣芝說：“你叨叨啥？我們

不拍啦，就擲到这里！”刘头兒一听，更串了烟子，罵了一句街。陆荣芝哪受这一套，抽出大杠子来就要揍他。别的工人们也对姓刘的提出抗議，惊动了机器房的負責人向工人们說好話道歉，讓姓刘的也認了錯兒才算罢休。

* * *

当国民党反动派就要垮台完蛋的时候，工人的怠工罢工浪潮越發高漲，簡直是風起云涌，將要把国民党腐爛的老树連根拔掉了！回想八·一五日本剛剛投降的时候，国民党大員来厂接收，狗腿子們叫工人停下工，用黃土墊道，淨水澆街迎接‘大員’。这会兒，再遇見个什么‘大員’来厂，工人们就包圍起他的小汽車来請願示威，和过去相比，是个什么形势啊！

就在这个时期，一个陌生人住在陆荣芝的宿舍里，别人不問便罢，要問就說是陆的亲戚来找事兒的。陌生人了解了荣芝的一切情况，和他細談，打听厂內情况，荣芝都仔仔細細地告訴了他。一天夜里，那人問荣芝：“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嗎？”

“知道！”荣芝爽快地答說，“你放心吧！”

那人知道荣芝十分可靠，就告訴他一些解放区的情况。荣芝說：“哈，这可有了盼头啦！”

那人走了，又換了一个人。經常和荣芝接近，他要荣芝喊他“杜兄”。

看来“杜兄”还忙于別的事务，还認識些別的工人。就在一个短时期荣芝沒有見到“杜兄”的时候，这一帶解放了。

解放給陆荣芝帶來了勁头。他站在爐灰堆上，号召工人

哥兒們：“這會兒可不能泡蘑菇了！工廠是咱們的啦！”

市委會派來工作組，“杜兄”也隨着來了，他像發電廠的老熟人一樣，尤其是推爐灰的弟兄們。見了工人就笑呵呵的，拉着手，就地一坐扯談起來。他現在不叫“杜兄”了，人們稱他“老杜同志”。老杜同志經常找榮芝。還和他一起下車間做工，他們聊得更投機了……。

先吸收了榮芝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現在又要吸收他入黨。老杜費了一個晚上的時間幫他填好了申請書和履歷表。榮芝把自己親身經歷講了一遍，他不會分析自己走過來的是怎樣的一條道路；有沒有走錯的地方；以後應該怎樣走下去！叫講就講了一遍，他沒有漏下一件重要的骨節兒，他盡量回憶着每一件事……。

* * *

過了幾天，老杜又找了陸榮芝來，告訴他說：“上級批准你入黨了。”

榮芝一聽高興得要跳起來，他大聲說：“噯！這可來勁！更得好好干活了！”

“且慢，”老杜轉得很嚴肅地講，“你先別高興，必須好好地檢討！”

榮芝一聽，楞了。問：“啥事？”

“你自己做的事還問誰？”

“真的沒有什麼事啊！”榮芝想了想說。

“剛剛，就是我先來通知批准你入黨的消息之前，有人反跌，你打了人，不是嗎？已經解放了，你還打人！”

陸榮芝明白了。今天上午，他的班上一個青年，干活兒

吊兒郎當，榮芝好言督促那人，二人說岔了，榮芝起了火，打了人家一巴掌。

“解放了他還不好好幹！我才……”榮芝想為自己辯解，但是沒說下去。

“不行，咱們不能學國民黨那套作風；也不能像對付國民黨反動派似的來對待自己階級弟兄！你必須檢討！”

榮芝沉默了一會兒，從凳子上坐着，又蹲上凳子了。後來，抬起眼睛望着老杜：“我知道咋樣檢討？以後再不打人不就結啦？”

“你得保證！”

“什麼？這新社會還得找鋪保？”他誤會了意思。

“什麼鋪保？”老杜差點要笑了，但是立刻又表示嚴肅，“是從思想上保證，心裡下決心，以後從行動上……。”

“行嘍！”榮芝干脆地答應了，“那可以保證，你也常勸着我點！”

“好！”老杜的臉上變得十分和藹了。臨走前還向榮芝伸出手來，像和一個新朋友似的那樣。榮芝緊張了一下，攤開自己的右手一看，又在工褲上蹭了蹭，像掰腕子比力量似地攥緊了老杜的手搖起來，還“嘿嘿”地笑着。

* * *

解放以來，陸榮芝的勁兒可大啦。把過去打國民黨狗腿子和小把頭的勁頭，都用在做工上，還用不完。精力無窮，老是躍躍欲試地沖動地想多多地幹事。黨注意到這些，注意到這樣的人物，便送榮芝進了市委干訓班去學習。像有着榮芝這樣品質和干劲的人，黨需要他多做些工作；可是，光有好品

質和頑強的干勁还不够，他的文化水平和工作方法还很差。在干訓班学了劳动創造世界的道理，他說心里亮堂多了，从前只知道是命苦，听着課心里真舒暢，思想認識一步一步地提高。不过，他越發对自己不滿足了。

“咱光会歪着脖子听，这多么叫人着急！”当他在課堂上思想走私的时候这样想着：“看，人家在听課的时候，掏出笔来唵啦唵啦一記；开会的时候，小本一翻，成套的話兒就說出来啦！”

同組副組長原是师范大学的学生，一个有耐心的女同志。她帮助荣芝学文化挺热心，簡直是像教初小一年級学生似的把着手兒教。荣芝高兴極了。虽然由于年龄稍大，学着吃力，可是拿出推爐灰車子的勁头，硬着头皮学习，几个月也真进步不小，报上通俗一些的文章，他居然能隔三岔五地認个差不离，琢磨出中心意思来了。

回厂以后，就叫他当支部書記兼車間副主任。这簡直吓了他一跳。他心里說：“咱是下大力的老哥兒們，解放后才認識了三个半字，就叫咱当这么大的干部，怎么行?!”

总支書記和他談了很久，他思想通了，他說：“行！我只知道一条：党說話算話。只要有党的領導，有党的帮助，加上自个兒的‘努勁’就行嘍！”

荣芝記的可清楚啦。这一天是1950年2月15日，就在一座小楼上成立了运输場的支部，他是提前两个月轉成正式党员，又被选为支部書記的。

工作困难会有，但是正像他說的一样，有党的領導加上依靠群众和自个兒的干勁，什么困难也就不在話下了。开头

他不懂什么叫做“工作計劃”、“總結”……，后来慢慢懂了，但是文化程度限制，写点什么还是不行。上級給派了一个中学畢業生来他車間工作。这就更方便了。

过了兩個多月，到第三次做月末总结的时候，荣芝可受了憋。他一連找那个中学生找了三天，老是遇不到。后来找到还碰了一个橡皮釘子。

“哈，小朱！你知道我找你找了多少年啦！”

“干什么，主任？”

“你忘啦？不是又快到月头儿上了嗎？得写总结啦！”

“不行；沒空兒！”小朱滿不在乎地說，“这回你自己写吧，我还有我的事呢！”

“怎么，你‘拿糖’啦？咱要是写得了，还求你这个知識分子干嗎？”

“嗨，得啦，大主任做个总结不是輕而易举的事嗎？說真的，我还有別的事呢！”

小朱說着就真的走开了。这一下，气的荣芝一个楞掙。他想：真是“求人难，难于上青天”啊！

勁头上来了，自个兒試試。于是憋在一間小屋里，憋了一天，急的打轉轉，还掉了兩滴眼泪。到底写出来了。千来字的一个总结，錯別字不算，只是不会写的字画成圈兒的地方就有好些，总结像画兒一样。完了，再找別人去問，填上空白，耽着老大的心事交給党总支。

你猜怎的，总支書記在一个大会上做报告，还把陆荣芝的总结表揚了一大頓。說：这样的总结最好，有事实、有分析、有檢討。陆荣芝說：“哈，这一下，真来勁！党总支書記說

的三点我得記一輩子！”至于知識分子‘拿糖’，他可就不在乎了。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求人做总结、写计划……。

从此，他体会到文化的需要，便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上业余学校，为了“找拐棍”，叫人教给他ㄅ ㄆ ㄇ……，到书店见本好字典就买下，一连买了三本；总支宣传干事上人民大学去了，还把一本字典送给他，因而他得意地向别人夸耀：“嗨，咱这无产阶级可有好几本宝贝字典呢！嘿嘿。”

工作了几年又送他上党校。回来工作上更大跃进一步。懂得怎样抓重点、依靠群众……。他说：学的脑瓜清楚多了，也能扒到办公桌上想一想事儿啦。在车间工作上有很多创造性的成绩……。

就是这个陆荣芝，这个对党忠心耿耿、具有无限革命干劲的陆荣芝，从车间提到党总支担任总支委员了，当选为劳动模范了。

四十一、鍋爐房里捉特务

1950年1月間，鍋爐房丙班調来乙班的一个青工，名叫李求田，在他到班上来以前，这消息刚刚传到丙班的时候，同志们就議論起来。

“不行，不行，要他？！”

“那家伙在乙班里光捣蛋，才不是玩艺兒呢！”

“他和薛恒运兩人就着伴兒的胡鬧，在班上用彈弓子打电灯泡。15号爐前閘門燒紅了用冷水澆，就这样破坏！”

說这些話的人，是想把生产搞好，把丙班搞好。

“不，”原来是这厂的工人，后来跑到解放区又随市委工作组来厂的張利明說，“調来咱們班也好，咱們帮助他改正，好好管着他不是就行了嗎？”

張利明是共產黨員，領會黨的意圖，因为乙班沒有黨員，領導較弱，又有李求田的伙伴薛恒运在一起，为了分开他們，才决定調動的。

“同意，”共產黨員褚立才說，“要不，調別的班也是給別班添麻煩，咱們不怕。”

張、褚的主張立刻被何家明、宋文有等工人同意了。他們班上調来了一个叫李求田的人。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他們丙班上“后夜”班。煤粉爐方面給高压爐司爐打电話，要13号爐長火，宋文有司爐却長不上去。觉得奇怪，一查看，吹風机的風門給关闭了；再仔細一看，爐里煤火走出一公尺多去，走断了。他一面埋怨助手李求田粗心大意，一面赶紧把火扒回来。

工人馬达臣从13号爐外面平台上走过的时候，發現大水箱的截門打开了，汽化水正在向外流淌。工人陈文平到15号爐附近扫地，看見牙輪箱的油盅搬到，撒了一地油。

連續發生的几件事，立刻引起丙班同志們的注意。張利明和褚立才更提高了警惕性，不时地碰碰头，分析研究一下情况。别的工人同志也紛紛議論：

“他媽的真危險！汽化水要是流淨了，还不得来个大火爆炸！”

“油盅倒了，油淌了要出大漏子，燒坏牙輪怎么办？”

“反正得把这些事兒鬧清楚，要不咱們班的人跳到黄河

洗不清！”

他們分析起情况來，褚立才看給水泵，他看到李求田到風道里去過，他斷定關風門是李求田干的。褚立才是鍋爐房黨支部保衛委員，班上的治安小組長。他的警惕性很高，早就注意到這些問題。雖然另外幾件事沒有抓到李求田的手，但是經褚立才和張利明的分析，不大可能是別人干的，便主張立刻停止李求田的工作，免得再繼續進行破壞。同時給保衛科打電話，告訴他們現場出了事。

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有的老實工人表現軟弱，如宋文有就說：“李求田年輕輕的，要當成是故意破壞就不好了。”

保衛科的同志接到電話以後，立刻到現場勘察。並且告訴褚、張注意，等下了班再進一步處理。張、褚沒有宋文有的顧慮，征求了保衛科的同意，便建議領班叫李求田停止工作，讓他坐在那兒歇着，別到處亂跑。實際上到這時候，李求田算是被褚立才同志給看管起來了。

天明以後，褚立才、張利明就到保衛科去。保衛科又打電話把派出所所長邀請來，他們共同商量對策。先召集丙班一些可靠的工人來研究情況，於是張利明和褚立才跑去找陳文平、宋文有、馬達臣……來開會。

在舊社會，李求田家兄弟四個都不是好東西：除了賭棍就是流氓。李求田外號叫“楞三”，在街上橫行霸道，愛打群架，仗着弟兄們多，一打架就動刀動槍的。隨身帶着鉗子、改錐。楞三是國民黨員，還參加了黃色工會的“糾察隊”，夜里查戶口吓唬老百姓。解放後，他雖然表現老實了一點，可是還常常說些怪話，生產上吊兒郎當，愛出事故，調他到

丙班來，他還挺橫地說：“又調我這兒來干什么？”褚立才解釋說：“做工作哪兒不一樣！”才頂的李求田沒話可說了。

根據褚、張、朱、陳、馬等工人同志彙報的情況分析，便決定找李求田來開會。

這樣決定了，褚立才便把李求田叫到保衛科小樓上。李求田嘴幫子挺硬，死不承認。保衛科的同志給他講了些黨的寬大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隨後，他們又開始問李求田了。

“李求田，我們問你幾個問題，你要是回答得上來，就沒你的事。可以嗎？”褚立才說。

“好吧！”李求田蠻有把握的樣子。

“17號爐滅火，要你們13號爐馬上長火，你應該使低風還是高風？”

“低風。”

“對，這是老實話。——進風應該打幾個字，你說？”

“一個。”

“你打了幾個？”張利明接着問。

“三個。我是怕爐馬上長不起火。”

“這樣會造成什麼結果？”

“有停電危險。”

“這是個什麼問題？”老杜問。

“叫您這麼一說，這不是成了破壞行為嗎？我是——”李求田有點慌張，但是還裝出着急的樣子，想進行解釋。

“再一個問題，”老杜打斷李求田的話，繼續問道，“油盅應該口沖上還是沖下呢？”

“当然是冲上啦！”

“那么它为什么冲下了呢？”

“那，我不知道。”

“在馬达臣扫地之前誰到那兒去扫过地？”張利明問。

“是我，我扫地碰倒了油盅。”

“你得用多大力气碰倒它？——就算是碰倒的，不是故意搬倒的，为什么不扶起来？”

“怨我的过兒。”

“造成什么結果？”褚立才接着問。

李求田不响声。眨巴着兩只眼睛。

“我再問你个問題：三个爐都長着火的时候，总風門應該开着还是关着？”馬达臣問。

“开着。”

“你为什么关起？嗯？”陈文平接着問他。

“我当时不大懂。”李求田說着这，腦袋上就冒了汗。

“这是什么問題，你老实說！”老杜說。

李求田光冒汗，沒回答。

“我再問你，大水箱……”褚立才沒說完，李求田赶紧說：“不是我！我沒上后边去！”

“什么？我看見你了。”

……閒話結束了。李求田承認錯誤，但是不承認故意和有心。

“好吧，”老杜說，“你写吧。”

給李求田一張紙，讓他具个結，免得有的地方打翻案。接着便把李求田送到派出所。到了那里三审兩問，他承認了



破坏事实，另外谈出了一系列的破坏事件。但是还瞒下私藏枪枝的行为。以后送进城里市公安局，有人检举了他藏有枪枝，他才不得不承认下来。

李求田的破坏行为，引起了全厂职工的警惕，也给保卫工作人员“上了一课”。

过去，保卫工作人员多半是依靠一般的社会保卫经验，不注意生产保卫工作的特性，从这次事件以后，发电厂里的保卫工作者也经常注意起生产技术知识来，经常请工程师给讲一

講規程制度、發電知識和機械性能。張利明、褚立才等同志后来被評为护厂模范，还受到獎勵呢。

四十二、最好的献礼

早在六号机事件以前，党在领导生产方面，已經开始注意到安全运转、改进操作的一些問題了。当然，注意的还很不够。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鬼子遺留下来的破爛攤子，机器是老少三輩的，設備缺陷極其严重。六号机是那样子难伺候，鍋爐房也問題很多。工人們在旧社会沒有改进技术的要求，一切操作固守成規，得过且过。就拿燒煤來說，由于燃燒技术不佳，細煤都随着烟子从烟囱里冒出来，天天像下小雨似的，人們抬头不敢睜眼。烟子吹出来的黑砂像米粒，大的像豆粒兒。每天高压爐樓頂上落一尺多厚。一踩撲嗤撲嗤的沉脚。燒过的爐灰，“可燃物”成分高的要命，职工們把这种情况叫做“霍乱症”（上吐下瀉煤炭）。

解放后，我們党来接管了工厂。过去我們党虽然在领导电業方面沒什么經驗，但是有一条，虛心向群众学习，厂与厂之間交流經驗，就会提高的。看到鍋爐房問題严重，就派了張利明、張义三、宋文有三人到唐山电厂学习燃燒經驗。回来就改正了几点操作方法，如在煤里澆上适度水分，煤末子就不那么“呼呼”地往烟囱里鑽了。火面适当延長，过去只开第二道風門，別的不打开；学习回来之后才改进；这样使烟煤进爐，燃燒的比較透了。这样点滴改进，已經給国家节省了大量財富，更重要的意义是引起职工开始对技术革新

方面的兴趣和注意来。

但是，煤粉爐的問題，可不那么簡單。

自从1945年夏天，日本鬼子还在的时候，石景山發电厂安裝了兩座煤粉爐。它和一般的鏈条爐不同，这是用磨煤机把煤炭磨成細粉来燃燒的鍋爐。可是，从安裝了这个家伙以后，石景山的工人和老百姓就更倒霉了。因为煤粉爐的設備不够科学，細面似的煤粉不能全部燃燒，有一些就随着煤烟跑了出来。由于用煤很多，每天只是跑出来的煤粉就有一万斤上下。你看吧，發电厂的五層樓頂，咕嘟咕嘟冒出的黑烟子到处飞揚，掩蔽了天日，籠罩了附近的山河村庄。發电厂的樓房变成烏黝黝的，附近几里以內的房屋、土地、树木、庄稼上面也是一層黑，連冬天的雪上面也是一層黑。原来的青山綠水变成了黑山烏水；人吐的唾沫也是黑的；有的病人进城求医，医生說石景山的人，連肺都是黑的。这就是那每天冒出来的一万斤煤烟子办的好事啊！

不仅如此，由于煤烟子像落雪似的盖住电杆上的瓷瓶，常常傳电冒火，抽煤机燒过好多次，轉着轉着“嘭”炸啦。馬达心兒里也落进了煤烟子；才解放时，还燒坏了一台三千伏安变压器，就是因为瓷瓶和变压器外皮落滿了煤粉，碰到一根鉄絲着了火的。

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一月一月地过去了。石景山的人們在黑暗的烟霧里过日子。原来生活就很坏，吃豆餅、混合面，再呼吸些煤烟子，于是害胃病、肺病和患砂眼的人增多起来。每个人的臉上和瘦骨嶙嶙的身上都像烟熏火燎过一样，眼睛糜爛了……。

談到解決跑煤粉問題，就得說說一位出色的工人——杜永常。杜永常的母親杜大娘也常常這樣叨念：“菩薩保佑！只要有這麼一天，老天爺叫吃飽了肚子，發電廠里別冒鬼煙子了就好啦！”

杜大伯聽說這是什麼爐開的；並且他兒子杜永常給什麼爐燒火，他再也忍不住了。永常這天回家來，坐在桌邊吃晚飯，父親問兒子說：“你調了班兒嗎，小常？”

“嗯。”永常是個不愛多講話的小伙子。

“給新添的鍋爐燒火嗎？”

“嗯。”

“你就不會想個法子，不叫它冒煙子了嗎？”

“沒法子。”

永常喝着稀粥，眼睛望着咸菜碟，眼皮兒也不撩。父親生氣地連胡子都顫抖着說：“簡直是造孽，造孽！就一點辦法沒有啦！”

“咳！菩薩保佑！”杜大娘在一旁叨念着，“只要……”你想想辦法來也是沒用處啊！

日本投降以後，國民黨反動派接收了發電廠。他們的接收就是搶劫和搜刮，自然管不着煤粉的問題。他們只有一個辦法，如果國民黨大員來這裡參觀的時候，頭一天來電話通知，就先把磨煤機和煤粉爐停了，等他們參觀過後再開機燒爐。

解放了，多年來工人們受着日寇、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的統治壓迫，現在自己做了工廠的主人，生產情緒大大提高。有的工人如杜永常等為跑煤粉問題，琢磨了合理化

建議。不过，因为解放時間不久，發电厂里一套旧的組織機構，还没有进行改革，他們的建議压在股長、課長那里，沒有引起注意来。个别的技职人員看不起工人，說：“屎壳螂要做了蜜，还要蜜蜂干什么？”

在六号机出了事故以后，苏联專家切尼斯考夫同志来厂。虽然他是汽机專家，但是也注意到我們的跑煤粉問題了。有一天，他問到和他一起干活的技术員苏逸萍：“你們想不想解决这个問題？”

“要解决！”苏逸萍回答。

“要是在苏联的話，”切尼斯考夫同志說，“一定得設法解决它。”

这几句話很重要，給我们的技术人員和工人同志們很大啓發。虽然苏联專家在修复六号机过程中，工作非常緊張，沒办法顧及鍋爐方面，但是看到問題，就馬上提醒我們，給了我們啓發、鼓励和帮助。六号机修复之后，厂里領導干部、技术人員和工人同志們的注意力便漸漸轉到解决跑煤粉問題上来了。

过去，从大学或專科出来的学生，在来到石景山之前多半是沒有見過什么叫磨煤机和煤粉爐的。石景山發电厂只有一位赵汝忱工程师，从前在东北工作的时候見到过。不論是見過也好、沒見過也好，碰上这个問題了，大家就得設法解决它，因为，这可不像解放前似的了。

1950年春天，正当永定河上漂浮的冰塊融化了的时候，石景山向陽坡上草木發芽兒的时候，随着春天的温暖，更好的消息傳到了石景山發电厂。上級机关派了工人出身的全国

劳动模范刘清泉来当厂长，还有十几名工人出身的技术干部来充实这个厂子。这些同志在东北已提升为股长、车间主任的，在这里为了加强下层工作，他们宁愿担任班长、值班长的工作。

一般地说来，工厂里调来新人，工人们是不大表示态度的；也就是说当你没做出成绩来的时候。他们不会一下把热情和爱戴显出来的。这也是多少年来在旧社会受欺骗和凌辱所得的教训。然而，他们对刘厂长的到来却打破惯例，召开大会，热烈地欢迎他。工人们在看到身材高大，热情奔放的刘厂长以后，非常兴奋。在会场上人们热情地高呼口号，用抡大锤和开马达的大手鼓掌欢迎。这位工人出身的刘清泉厂长，在欢迎会上做了简单的讲话。他说：“……旧社会兴送蒲包，我这个厂长不要你们送蒲包。可是要你们每个人送几条合理化建议。……一个人有多大本事也不行，领导人离开群众，就像飞机没有降落的地方一样，那有什么用呢！只有党领导下的群众的力量才是伟大的！”

刘厂长来厂第一件事，就紧紧抓住解决跑煤粉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了。他说：“我们一定要消灭石景山发电厂的第一大敌，打死这个吃人的老虎！”

为了保障机器的安全、职工同志们们的身体健康，为国家大量的增产节约，怎样消灭跑煤粉现象，已经成为发电厂党、政、工、团各领导同志议事日程上的中心问题了。1950年5月间，党又号召全体职工，在“七一”以前解决这一问题，作为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的献礼。这一号召立刻得到全厂职工们的热烈响应，都积极行动起来，动脑筋、想办法，

提合理化建議。厂里領導同志和技術人員也深入工人羣眾，打成一片，共同組織技術研究小組。看吧，班上班下、黑天白日，都在談論煤粉，都在琢磨合理化建議。

老厂長除了下現場，就是參加工人小組會。有時還找工人、技術員來談談。一次，厂長把司爐杜永常找到他住的地方，了解情況和鼓勵工人們鑽研技術。等杜永常回到住室以後，同屋住的工人哥兒們都湊過來問長問短地打听。

“厂長找你去干嗎？”

“談燃燒問題，改進設備問題，技術改革問題！”

“嘿嘿，可不簡單。你快說說咱听。”

杜永常一五一十地向同志們介紹和厂長談話的內容。完了他又笑迷迷地補充說：“一去了厂長就給倒了杯茶喝；還請我抽煙卷兒。讓坐在沙發上……嘿嘿！”

“嗚，真來勁！”工人們都跟着高興。

“太够意思啦！”一個工人發表感想說，“要在過去，一個工人還能到厂長屋里去！門兒也甭想！”

領導同志那種走羣眾路綫的工作和生活作風，把大家帶動起來。班班比干劲，組組搞競賽。甚至有的兩組工人，為了比賽，心里憋着勁，見面也不說話了，暗地加勁。比如兩個班的閻向河和張崇悌過了很長時間，見了面才互相招呼。

“得啦，咱倆別老‘頂牛’啦，講點友好吧！”

煤粉爐司爐杜永常，磨煤機組的齊良、劉民章，鍋爐修理工劉洪興、林治英……都在苦苦鑽研問題。工程師趙汝忱參加技術研究組，並且擔任組長。從此，有些職工廢寢忘食地研究辦法，鑽不通的問題就找別的工人或工程師、厂長。

工厂里实行了民主改革，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成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老工会主席王文炳当了技术副厂长；齐良、杜永常等工人也当选了车间代表，参加管委会工作。1949年，杜永常所提关于解决煤粉问题的建议，基本原理虽然正确，但是不够详细，还存在一些缺点。现在他更深入地研究起来。在工作之外就把全部精力用到这上面了。

一天，杜永常回家吃饭。他举着一个窝头咬了两口就发起楞来。

“怎么啦？”杜大娘问他，“窝头不好吃吗？”

“不，不，今儿的窝头特别好吃。”

“那，多吃点。”

“媽蒸的？”

“不，你媳妇的手艺。”

永常听娘说着话，心里却又琢磨起别的事来。吃完了饭，碗筷一撂，就鑽到自己小屋里，在大床上摆一个小桌，盘腿打坐地又写又画起来。他专心一志到这种程度，爸爸插上大门去睡觉，他没听见；工厂里夜十一时的汽笛响，他没听见；妈妈在外屋和他媳妇埋怨他，也没听见。

“哼，天天熬夜，也不怕费电！”媽說。

“人家成宿半夜不是写就是画，瞧，把眼熬的像铃当，不知闹什么名堂哩！”媳妇說。

“白天上班，黑下熬夜，簡直成了个‘夜游子’了。”

“可喂，夜游子！”

别看媽媽埋怨了一頓，也舍不得打兒子的兴头。叨叨几句，就去睡觉了。他妻子进来把門門好，回头靜靜地望着正

在埋头写字的丈夫，輕輕地嘆了一口气，也独自脫衣睡下。她原来是一整天忙里忙外地怪乏了，躺下一会兒，翻了个身也就睡着。永常还在小桌前，左胳膊支着桌面，手扶着头用心琢磨；小鬧鐘在桌上喀喳喀喳地响，当时針指着兩点鐘的时候，他才收拾收拾睡下。“咔”地一声关了灯。这时，北山坡工人住宅区沒有一声狗吠和人語，鷄兒也还没有睡醒吧，都沒打鳴兒呢。只有远处傳來工厂里机器“隆隆”的声音……。

猛不防，永常喘了一口粗气，而且伸出大手握住他妻的手腕。她惊醒了，不知道他是怎的这样突然，心里跳起来。随后听見他說：“不行不行，这个入爐管兒安錯了！”这时，她才明白，原来他在做夢，但是手腕握的很紧，有点酸痛。就喊着他說：“吵啥嘛？人家的胳膊咋成了你的‘轆轤’管了呢！”

永常醒来，轉动眼珠想了一下，覺得怪不好意思，就嘿嘿一笑，接着又想研究的問題了。

五月里，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起来；發电厂的职工們在党的领导下，生产情緒也一天比一天热烈起来。厂內展开劳动大竞赛，訂集体合同，联系合同、师徒合同。又發动全厂职工为解决跑煤粉問



題而奮鬥，同時，黨號召熱修 17 號爐；煤耗要降到 0.78……，這些事兒都是過去根本做不到的，現在要做到，要向前大躍進一步。當時，在大躍進中一批一批的積極分子、勞動模範就湧現出來。鄭國堂、張崇悌、閻向河……就是那時候露頭的，提拔成車間領導幹部，後來，鄭國堂還當了工會主席。

在紅五月工會組織的競賽當中，創造了許多新記錄；然而，那每天跑出一萬斤煤煙子，還是凶惡地霸占着天空，使石景山的人民經常看不到放晴的天氣和鮮亮的太陽。

就在紅五月底，杜永常把研究好了的改革煤粉爐的計劃交給工會。還有別的工人和技術人員的許許多多建議也交到工會了。6 月 1 日，由工會和生產技術科召開會議，討論收到的合理化建議。磨煤機方面和司爐工人們都參加了。劉、王二位廠長也到會了。大家經過仔細研究以後，就決定了試驗杜永常和齊良改裝煤爐的計劃；還有趙金生、張潤海和工程師趙汝忱改善磨煤機設備實行密閉循環的建議。6 月 2 日開始試驗了。在改修的時候，修理工劉洪興組、馮銘組工人們在輸粉管旁攝氏表二百度氣溫下熱情地工作着。黨總支書記，工會主席經常到現場看望他們，鼓勵他們；王文炳副廠長更是親自下手，一面指導，一面工作。

半个月過去，人們緊張和等待的心情達到最高峰。這一天上午，總支書記和工會主席幾個人到總支開會，劉、王廠長率領工會幹部、技術人員和鍋爐車間的職工二十多人，興奮地上了煤粉爐的大樓。杜永常和一些人正在等待他們。

“伙計們！”劉廠長大嗓門地嚷道，“就看今天了！你們在這裡試驗，來幾個人和我到五層樓頂！”說着一揮手就直奔樓

頂去了。他后面紧跟着工程师赵汝忱等五六个人。一面說笑，一面耽心。磨煤机和煤粉爐的操作者們，估計厂長他們登上五層樓頂就开始了試驗。杜永常和另外几个工人迅速地关闭了一个管子的截門，就打开火門，不动眼珠地盯着火焰。磨煤机方面昨天就换上了新制做大小不同的鋼球，只是檢查了一下机器各个关键地方，等候楼上傳来的喜訊了。

总支書記和工会主席早就知道了几时几分这个重要的时刻，他們在这时候宣布休会十分鐘。他們站在院里仰头颺望着煤粉爐的五層樓頂。

北山坡上的工人家屬們也有不少人摸到了这一消息。杜大伯从坡上劳动回来，就向屋里喊道：“喂，你們出来看看吧，哈哈！”杜大娘婆媳倆急急慌慌地出来，她們也向工厂的大樓頂看望。

这时，突然地，那黑黝黝的凶惡的烟子，那每天浪費国家財富的一万斤煤粉，那侵噬人們心肺、糜爛人們眼睛的濃烟，那損害机器、燒毀变压器的媒介物，那破坏环境卫生和改变山河草木清秀面容的髒家伙，在一分鐘以內消灭了。这时候，工厂大樓頂，烟囱里冒着一股白色的跳动的气体，它是那么輕柔，可爱。

北山坡上的工人家屬們高兴地叫嚷着，互相傳告；开着会的总支書記、工会主席們鼓掌欢庆，打电话詢問；五樓頂的厂長和职工們欢呼起来。

“伙計們！”刘厂長用震动山河的声音說道，“大功告成了！我們打死了吃人的老虎；消灭了石景山的一大敌人！这是大家齐心努力掙来的一大功劳呀！为国家节约無数的財富，这

是迎接党的生日‘七一’最好的献礼！”

“对！”职工們嚷起来，“咱們給毛主席写信报喜！”

四十三、一架噴气式

跑煤粉問題解决了以后，向党献礼，給毛主席报喜。同时，也給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同志和燃料工業部陈郁部長写信报告了解决跑煤粉的經過。

就在这年的7月間，发电厂第一次評选劳动模范。通过这一具体事实，在职工当中树立起劳动光荣的思想。特等劳动模范刘德仁等在庆祝会上講了話，在宴会中喝了喜酒。

也就在这一时期，第一批老工人退休了。当他們每月还拿到百分之六、七十的工資和享受到許多其他优厚待遇的时候，便不由得想起过去的工人，在厂里干一輩子，到老来，不能为资本家当牛做馬的时候，就被一脚踢出厂子不管死活了。現在的情况，都是过去从未經歷过的！

1950年9月間，掀起了全厂的安全大檢查，这是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簽訂了集体合同之后搞起来的生产运动，檢查出2119条設備缺陷，各組在刘德仁小組帶动下，积极制訂公約，保証消除缺陷，开展了轟轟烈烈的消灭‘二么么九’运动。从此，生产設備上面貌一新，并且出現了空前未有的183天安全無事故的新紀錄。

但是，如果說普遍开展全厂性大規模增产节约运动，还是从1950年11月間开始的。那是由于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国运动，經過报告会、宣傳鼓动工作、讀报、

控訴、座談、捐獻、訂愛國公約……一系列的活動，結合着鎮壓反革命和取締一貫道等工作，在全廠職工當中大大提高了愛國主義的思想覺悟。

1950年11月23日的晚上，發電廠除去前夜運行工之外的所有職工，都集合在北廠修理車間的大廠房裏。他們靠着旋床、刨床、鑽床子，怀着無比沉痛和憤慨的心情，進行一個控訴帝國主義罪惡的大會。主席台兩旁，張貼着兩大幅漫畫：一幅是美帝、日寇拿着血淋淋的刀槍的凶像；一幅是被槍殺、鞭打、火燒的中國人民；牆上接着“血債血還”四個大字的標語。

要求控訴的條子，雪片一樣往主席台上送來。許多老工人回憶起在舊社會的悲慘經歷，把苦水尽情地傾吐出來。一位老工人叫陳玉忠的談到，庚子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洋鬼子們騎着馬到處殺中國人。一天，他和兩個姑姑在河邊玩，遇見了幾個美國鬼子，把他們三個全投到河裏。兩個姑姑淹死，他被別人救了出來。他大爺爺、叔叔拿着鐮刀要報仇，美國兵大批隊伍來了，又把大爺爺、叔叔等三人殺了。他父親叫他長大了一定要報仇。……他說：“現在，到朝鮮打美國鬼子，就是我一個人也要去！要報這血海深仇！”日寇來了，他挨打受氣，被捉到日本憲兵隊裏，灌涼水、汽油，用竹板刮肋條骨。血從鼻子里往外冒，……他有一個弟弟，他們省吃儉用，一個雞蛋也舍不得吃，供弟弟上學。小學還沒畢業被日本人捉去殺了。把頭釘在城門上，他看見也不敢哭；晚上去偷屍。人死了，衣服也被扒光。他背着弟弟走了一段路，心里越想越難過，說：“你哥哥和你一塊去吧！我的弟弟呀！”

……”他说到这里就难过的晕过去了。工人弟兄們听着都忍不住潸泣起来。

老工人高世英一上台就伤心的落下泪来。他說：“我剛生下来就鬧八国联軍，祖母和母亲抱着我逃荒，她們实在走不动了，要把我扔到河里。那会儿天津海河里漂着很多小孩子。父母到各处去討飯，回家后牆倒屋塌，沒法生活。我們在天津靠近外国租界住，受过意大利巡捕、英国兵、美国鬼子……的打罵欺侮……。到石景山来被日本鬼子打的鼻口流血，还用劈柴打的头上淨是大包。病了几个月，三天沒吃上飯，十一岁的小女兒揀煤焦子換了个窩头来，爷兒倆分着吃。熬到今天才能吃饱穿暖了。誰給的？——共产党、毛主席！这回抗美援朝，我十六岁的小女兒对我說：‘爸爸，我要报名参加志願軍！’我說：‘好，你报名去吧！’我又伤心又喜欢。伤心的是她过的苦日子！喜欢的是她今天有了勇气。……今后要不努力干，怎能对起前方流血的战士？怎能对得起毛主席！”說到这里，他激动的說不下去了。停了一会兒他还掙扎着要控訴。

煤粉爐老工人王正雨說：“我弟弟在天津当工人，下班后遇見美国汽車开上便道，压断了腿，还撞塌了房子，反說人和房子擋道。……后来我打漁为生，有个特务买了一斤魚，他把鱗、腸弄光，拿来找我，硬說不够秤。把我臉嘴全打破，回家告訴父亲，父亲一气得了病，不久就死了。当了房子才买的棺材。后来日本腿子逼着要买我的房，我那时在外边，等回到家，見門鎖着。老婆孩子一家人都不知到哪兒去了！我到过上海、旅大、青島，沒找着。到逃水灾的难民堆里去

找，也沒找着。一个十八岁的閨女，一个十二岁的小子，一个六岁的小閨女，都找不到了。真是弄得家破人亡！回想过去，受日本人、美国人的气，不解放，苦也沒地訴去。要不是毛主席的領導，做夢也夢不見今天！我五十岁了，从沒見中国人这样因結过，眼前咱們工厂还盖医院，盖大楼，盖子弟学校，給工人办业余学校……，美帝国主义今天又打朝鮮，还想要打我們。我們一定加油工作！努力捐獻，讓国家多买飞机大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朝鮮去！”

一位比較年輕的工人，也要求控訴，他叫董力偉，讓人們听听他的遭遇吧：“我哥哥被地主踢死。母亲要了十多年的飯，結果还是讓地主打死。地主还要杀我父亲，父亲逃走。家里十多天沒揭鍋；我活到二十多岁沒盖过被，尽盖高粮編的席子；吃的是柳叶、槐叶，是树叶全吃遍了。今天剛剛过幸福日子，美帝又要来侵略我們。难道你还想杀人、打人、强奸，拿中国人不当人嗎？我們要坚决消灭它！我报名参加志願軍的时候，我老婆不願叫我去，我問她：‘你父亲是怎样死的？’她哭起来。她父亲也是被帝国主义杀死的呀！……”

在整个控訴大会的过程中，所有参加会的职工，都引起对自己經歷的回忆，一方面痛伤不已，一方面激憤填胸。會場上被啜泣声和“打倒美帝国主义！”响亮的口号声籠罩住。从清华大学来的一些同學們也参加了大会，他們万分感动，激情地高呼：“我們的泪为工人流，我們的血也要为工人流！为工人索还血債！”

最后，党总支書記、工会主席和劳动模范刘清泉、刘德仁也都講了話。他們要求：化悲憤为力量，坚持崗位，努力

生产，开展爱国主义竞赛，支援前线，把美帝赶出朝鲜，保卫世界和平！

在抗美援朝宣传周内，发电厂沉浸在仇恨和激愤中。人们回忆起那些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统治下的血泪岁月，都不禁悲愤异常。提起来，真是苦啊！在日寇统治的时代，工人们身上披着麻袋片，拿洋灰纸袋围一条裤子，过着寒冬。挨打受气。还活着就被日本鬼子拖到小山沟里。发电厂旁边山沟里堆满了死尸，一群野狗和老鸱吃死人吃的眼睛都红了，见了活人也扑……。

若是诉不完说不尽的！血不能白流，泪不能白流！血泪灌溉的土地上，已经开放了鲜艳的革命之花，丰硕的胜利之果来了！

* * *

全体职工和家属们，认识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要性，立刻就表现在行动上。那就踊跃地报名参加志愿军，到朝鲜前线去打美国鬼子。得不到批准的，就一方面加油生产，一方面捐献物资，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在捐献的时候，每位职工都争先恐后。有的拿出银元、首饰、布匹，甚至有的把揀煤焦攒的钱也送到工会里要求捐献了。工会不收，劝他们拿回去，不行，不叫捐急的掉眼泪。

接着全厂职工连家属掀起订立爱国公约的运动。爱国公约分小组的、个人的和家庭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家属爱国公约主要是保证职工能更好地生产和生活。比如，她们订的爱国公约中除了自身参加社会工作、学习、劳动以外，还有对职工的保证：

.....

七天不吃重样飯，
三天衣服換一換。

.....

职工子弟小学的学生們，在抗美援朝宣傳中也起了很大作用。他們也都訂了爱国公約。保証以努力學習来支援志願軍叔叔。他們到工厂里进行宣傳。对生产上起着鼓动作用。例如，他們唱的有这样的歌曲：

.....

叔叔大爷齐努力，
煤耗降到零点七！
你們加油搞生产；
我們努力来學習！

.....

家屬們組織了生产小組，在山坡上开荒种地。她們把种的东西，都捐献给志願軍了。一次，有兩個妇女抬着她們种的大白菜、茄子到街上卖。一个招呼說：“同志們，买吧，一个茄子就是一个炮彈！誰买大白菜，这是爱国菜。”人們听見觉得很奇怪。她解釋道：“我們这菜是捐献买飞机大炮的呀！”人們这才明白。一次一个解放軍炊事員听她們招呼，也不問价錢，把四十多斤菜一下都包了。

劳动模范刘德仁得到獎金，那天正赶上歇班，他立刻騎上車进了城，买了毛衣、絨衣……都給志願軍寄了去。

就在全厂职工同志和全体家屬努力生产、积极捐獻下，1951年便捐獻了15亿（旧幣）还多，完成了捐獻給志願軍一架噴气式飞机的任务。

四十四、人变了机器也得变

1951年冬天，一个下午，3点多鐘，鍋爐車間党支部書記張利明像有什么急要事兒般地，从支部办公室，急急忙忙地走到南厂，爬上高压爐大楼。东寻西找，找到丙班班長刘光鈞。

“大个子！”支書招呼刘光鈞。光鈞正擎着墨鏡从爐旁火眼里观察爐膛燃燒情况，听見有人站在他背后叫他，便直起腰，回过头来。看見是支部書記，就靜等下文，神气里好像在問，“有什么要紧的事嗎？”

可是，張利明同志的主意忽然变了。他不願打乱光鈞的操作，把想說的話改了內容。他說：“沒什麼。想了解一下這會兒燃燒的情况。”

“挺好！”光鈞說，“这次来的煤好燒，保險灰中可燃物大大降低，完成煤耗任务沒問題！”

“那好。”利明隨口应答。可是光鈞覺察得出：利明不光是为了了解情况来的。他一定有重要事找我談。要不，急急慌慌地喊我声“大个子”干什么？他大概怕說了影响操作，連約定“下班談”都不肯。老張真是越来越会做工作了。不过，

要什么紧？什么事也不会影响工作的！我们要对国家、对人民负责！

張利明轉轉磨磨地总不离开三台高压爐。隔一会儿看看手表，到四点钟，前夜班运行工来接白天班的时候，利明脸上露出高兴的神色，好像盼到了什么节日似的。他又凑到光鈞身边，在馬达的嗚嚕嗚嚕運轉声中，高声向刘說着：“大个子，交了班咱一塊走，喂？”

“好嘞！”大个子还是滿不在意地回答了他。可是他心里說：你不叫着我，我也要到支部里去問問你：“啥好消息呀？說說咱听。”

光鈞故意躲开本班别的工人，和利明一道走在一起。利明比光鈞个子低半头，身体已經發胖了；穿一件厚棉襖，走路挺着腰板，稍微摆动。刘光鈞呢，正像人們称呼他似的高高的个子，背稍有一点兒駝，走路安穩，步碇兒很大；他迈三步的时间和距离等于利明的五步。他倆走在一起，看起来一个在快步走，像起五更赶集市似的；一个在慢步走，像在河灘上散步似的。但是，他倆誰也拉不下誰。

一出南厂大門，老張再也憋不住了。沒等老刘發問就告訴他說：“喂，党总支提出一个新問題，这个問題可是关系重大的問題呢！要是解决的好，那要給国家帶來極大的好处，总支叫我来和你商量商量……”

“嗨，你快說出来不就得啦！”光鈞听得不耐煩了。

“是这么回事，党总支确定挑选你班試燒低值煤，就是这样，叫我来和你先研究一下。”

“噢？”刘光鈞只說出一个字兒，腦子里就轉开圈兒了。老

張瞅他一眼，看見老劉臉上泛起一層紅潤，不知道他是為什麼這樣緊張，是高興嗎還是犯愁？習慣地進行着解釋：“如果試燒成功了的話，一年就給國家節約多少萬噸好煤啊！因為是附近鋼鐵廠剩下的煤，還可以節約很多運輸煤的車皮呢！黨的這個決議非常英明！我參加了總支這次會議……。”

光鈞的腦子是那麼好使，他一方面聽着利明的話，同時腦子轉了好多圈兒了。他想起了在轟轟烈烈抗美援朝運動期間，他在小組會上曾經提出過三次試燒低值煤的問題，沒有人支持，沒有被通過。他又想到這次有上級黨的號召，他明天就召集小組會；他甚至在琢磨動員和說服小組同志們的詞句呢！支書有點誤會，怕他這次接受不了，還在諄諄地進行解釋。

“這次，”老張說，“是在三反五反的基礎上提出的；是在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蘇聯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後，列寧同志在批准全蘇電氣化計劃的時候，提出：‘必須採用當地可取的石煤、泥煤和劣煤’的指示。”老張談到這些，老劉的思想完全集中了。他光聽老張的話，自己不再多想旁的，因為後面這些話是過去沒聽見說過的。他表示用心聽，還表示希望老張一直說下去，就稍微彎點腰，湊合老張，還答應着：“哼、哼，噢！”

“這次，是全國勞動模範劉德仁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回來，帶來了毛主席提出的‘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號召以後，黨總支才提出來的。”

“噢！”

“因為鍋爐丙班有黨員班長，所以挑選你們班先做試驗。”

党提出哪怕是燒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也是为国家节约财富！你看……。”

“保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听从党的指示！坚决完成任务！”光鈞的兴奋证明是高兴而不是顾虑什么。老張可樂了。

“走，咱到支部办公室仔細研究研究！”老張的步子加快。

“好！”老刘的步伐加大。

* * *

刘光鈞为什么这么願意燒坏煤？难道坏煤比好煤还好燒嗎？不是，坏煤是些石头煤、泥煤，是附近鋼鉄厂燒不了剩下来的一些硬塊塊、黑面面，放进爐里不仅冒不好火头兒，还兴許把火給压灭了呢！那，刘光鈞的想法是什么？难道他是傻瓜嗎？

不，老刘自从解放以来，心里可亮堂的很；尤其是抗美援朝、取締反动会道門以后，老刘的心气高的很，主意穩的很，眼睛明的很了。不像从前；从前倒确实做过傻事兒；那也不怪他，他是被迷雾罩住眼的年代上过当的。岳母哭求，老婆劝說，他想，在这一輩子得不到好处，將来到天堂再过点像人的生活吧。所以他才参加了一貫道的。光鈞想摆脱旧社会那种地獄生活，盼望着进入天堂。拼命干、打加班，一天到晚的不歇，还是掙脫不了灾难的命运！后来解放了，过去的反动宣傳使他不能一下接受真理，靠近自己階級的政党。党看出这种質地潔白的好工人，送他到干訓班学习，他才漸漸認識了党的偉大。經過学习，討論，訴苦运动，一些事实摆在眼前，他才漸漸明白了真理。但是，旧習慣影响太深了。当他入党以后，还不敢揭露一貫道的黑幕，不敢說出“無太佛

弥勒”五个字，下意识地惊心打雷劈了。后来，在取締一貫道的时候，一貫道的反动面目和欺騙把戏被徹底揭穿了，他才徹底覺悟过来。从那时候起，他沒有一件事不听信党的話，沒有一个政治运动不積極參加，生产上沒有一时不付出全部力气来干的。抗美援朝期間，他做了党的模范宣傳員，創造了很多宣傳方式，報紙上每條关于志願軍的消息、通訊，他都不放过，自己看了再讀給別人听。那些消息給工人弟兄們在生产战綫上極大的鼓舞。刘光鈞經常思慮，怎样才可以为国家大量增产節約，多买飞机大炮。这就是他的想法。何况又听說苏联也曾燒过低值煤呢！

“苏联能燒咱就能学会燒！”他开始簡單地想。

所以，支書張利明和他一談，他就同意了。第二天，一下班，他就召集了全組會議。他从抗美援朝講起，然后提出燒低值煤的問題来征求大家意見。

“同志們，”他滿有把握地結束了他的發言，“我想，大伙都会同意的吧？”

他的估計完全錯了。不用說“大伙”，就連一个同意的也沒有。等他發言完了，会場靜得可怕，連一点声音都沒有，老远以外的机器房隆隆的声音都隱約可聞。这屋里有二三十个人，好像是空蕩蕩的屋子一样。

“也好，”过了一兩分鐘，老刘又啓發大家說，“大伙都考虑考虑，琢磨个妥善办法也好。”

这时候，你看我我看你的，希望有个人代表大家出来說話。一陣靜默使他們彼此懂得心里的答案了。过了一会兒，14号爐司爐工刘登洋开了腔：“我看啊，先叫別的班試去，咱

們可別搖那分兒泥啦！”

平常表現挺薦的庄伯森接過去：“我說也是這麼着。不是咱們怕事兒，要是能辦的事項，咱拼着干啦。這個，沒听咱們值長說過嗎？咱這鍋爐的裝備就是燒好煤的。”

“燒好煤，”學徒工唐榮清接過去說，“鬧鬧還滅火呢，甭說……。”

“我說呀，”一個助手接過去，“要是燒低值煤改裝鍋爐，那可老鼻子啦。我說老劉，你想要費一大堆錢，改裝了再不能用，那不是白找麻煩嗎？”

你一嘴他一嘴的，反正是不同意燒低值煤。光鈞沒有想到小組會竟落這麼個結果，他等大家嚷嚷了一陣子之後，他說：“好吧，今天的會就開到這兒，散會。”

* * *

散了小組會，劉光鈞回到家里，簡直像做夢一樣。他沒想到班上的人們一致不同意他的意見。那麼，眼前擺着兩條道路：一條是，打退堂鼓，向支書彙報小組會的情況，這很簡單，好辦。不管支書和總支怎樣處理。或是讓別的班試燒，或是再來幫助動員本班。讓上級听听班上的意見，好多幫助，想主意，給辦法，以後事情發展看情況而定。還有一條道，不打退堂鼓，不完全依賴上級，進一步想辦法說服群眾。

“對了，就是這麼兩條道兒。”光鈞想，“前面一條簡單省勁，然而是被動，向困難妥協的；後面一條費勁、複雜，但是主動，向困難進攻的。我是一個共產黨員，走哪一條道，明顯的很！”

肯定了走哪條道兒，就進一步考慮做法。

他們这个鍋爐丙班，是怎樣的一个班呢？在光鈞調来之前，全班工人都不識字，在技术方面，工人是由低壓爐調到高压爐的，操作很不熟練，上班以后东一个西一个老是躲閃着不願到鍋爐附近去。落汽压、跑紅火没人管，一下班提了飯盒就走。光鈞調来担任副班長，他一看这个情形，一点沒有灰心，反而覺得有工作可做了。前些天听了志願軍到厂里来做的报告，在朝鮮戰場上，零下二十度、志願軍在冰天雪地里作战，一口炒面一口雪，蹲伏在战壕里日日夜夜地艰苦奋战。他听了常常翻来复去地想：“志願軍同志們为的是啥，为了誰們？他們的一切努力、奋斗牺牲还不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他又把那些革命先烈的事迹联系起来，把工人現在的生活和过去进行对比，很快就弄清一个道理：他們哪一个也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集体，为着国家、人民，那么，我們掌握着机器的主人，也应该貢獻自己全部力量才对呀！道理想通，工作的劲头就足了。覺得工作越困难，干着越起劲。他一心一意想把全班的工作搞好。想出許多办法，針對每个工人不同性格不同情况，使用不同的办法来帮助他們。他常想他們班上的同志，过去和他一样在旧社会受苦，受压迫，受欺騙太多了。提高觉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兒，他从他本身的經歷中也体会到，在沒有觉悟以前是很痛苦的，所以他的階級同情心使他耐心地長期地来帮助他們。他剛来这一班的时候，动员大伙学习文化，学习政治，工人梁存喜說：“我保証不学习，不开会！”光鈞听了，沒有多想就温和而严肃地說：“我保証你今后得学习，得开会！”

“嗨，走着瞧吧！”大家心里这样想，“两个保証，看哪个保

証實現，哪個落空吧！”

開始光鈞替大家記表單，慢慢地讓司爐自个記。這一下可把梁存喜懣住了。求別人也不幫他記，光鈞就拿着他的手教他怎樣記，慢慢地梁也學起文化來，早就忘記了他說的保證。光鈞擔任黨的宣傳員，每天下了班要讀一段報紙。他讀報的方式不是光念，是連講帶比划，有生有色的，每次不多讀，不多費時，揀最精采的如朝鮮通訊什么的讀一段，像講故事般的那么吸引人。先給全班建立起听報的興趣。所以他一說晚上開會他先讀一段報，梁存喜他們就不覺不由地湊合來了。既來了哪能听完讀報就躡走呢？於是，梁存喜不開會的保證也落了空。當然，光鈞還配合別的說服方法，另外在生活和工作中与大家非常接近，更是主要的原因了。他一上班，就要关切地从工人們的動作、神氣中觀察有沒有問題。一次，梁存喜面帶愁容，被劉光鈞發現了。問他，他不講；下了班，光鈞就一直跟到他家去看，果然他家里老婆孩子都病了。光鈞沒說什麼就回家拿錢來給梁存喜，叫他請醫生、買葯，梁感動極了。以後梁存喜心里有什麼事兒就找光鈞幫着解決。梁有個吃零食的毛病，常常到小鋪、小攤子上賒些零碎賬，到月頭兒上，要賬的便跟在梁的屁股后頭轉。光鈞沒短了替他打發要賬的，也不斷批評、規勸梁。光鈞有時候心里也起火兒，他對梁說：“你以為我这么稀罕替你还賬呀？我是怕你鬧情緒影響工作！”光鈞就这样以兄弟般的热情，關心對待梁和每一個工人，一天天辛苦地給他們講道理，解決困難，一個落后班就慢慢轉變了。

光鈞起初擔任副班長，正班長叫張永升，是個年紀比他

大20多岁的人。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性格陰暗，对生产敷衍塞責，对技术学习不感兴趣。因此，每逢开技术学习会他不是說有事就說忘記了，总不参加。刘光鈞就想了个办法，提議大家到班長家学习。“免得張师傅走大远的路，年岁大了，身子骨兒不够灵活，咱們湊合張师傅去学吧！”这样既照顧了班長的威信，又帶动他参加了学习。在工作中，張永升有时候对大家發出錯誤的指示，光鈞为了照顧他爱面子的毛病，就用請教的口吻說：“暖，我也鬧不太清，不过，我觉着也可以这么做，你看行不，張师傅？”然后提出自己对的意見，讓張批准。張永升一听，發覺自己的意見錯了，不好不承認真理，就說：“行，行！”当然，如果張永升硬是坚持錯誤，光鈞也会坚决和他斗争的。

光鈞由于从十二周岁就进厂来做工，到1952年，他已經二十七、八岁了。在鍋爐技术方面鑽的很透。同时，他很热心帮助别人。随时随地願意把他所知道的技术教給別人。有的人学技术不够刻苦，他还是耐心說服。他想：今天不学，明天不学，后天总会学的。开始是他找到別人家去教，后来大家就到他家来找他学了。学徒工唐荣清学习差，他仍旧慢慢地引导他。有一次，15号爐停了爐。光鈞想：机会难得，这次可以好好地教他，便叫着小唐进爐去，小唐却嫌热，不进去。光鈞說：“我病剛好还能进去，你这青年人进去更不要紧。我先进去，你后进去；出来的时候，你在前头我在后头。”說通了小唐，鑽进鍋爐里，光鈞給他把各部分都講了一遍。等一出来，再問他，他又都不会了。光鈞心里虽然也着急，可是仍然耐心地教育小唐。光鈞想：“新中国的青年，国

家要求他进步，他也总会进步起来的。”

后来，班長張永升調到別的班去了。光鈞担任正班長。他每天工作都做記錄；对每个人的情况分析也都記到他的小本上。一天的工作完了，到晚上睡下，必須先回忆一天来班上的工作，进行檢查一遍才睡的着。这已經成为習慣。他每天还要完成他担任宣傳員的任务，到支部去写宣傳員記錄簿子，即：宣傳了些什么內容、怎样宣傳的和有什么反映。因为他的宣傳工作做的很出色，他被評为模范宣傳員，也被选为劳动模范。

他向支部彙报工作，优点全是大家的，別人的；缺点他个人来承担、来檢討。

这样的領導，班上的工作还能搞不好嗎？大伙的干劲还能小的了嗎？一次，他提議大伙掏一掏烟子，因为烟子积的多，埋起“过热器”来。不用說里面，就是火門处都有一百多度。里面扔进木板子去，就“呼呼”地冒烟。人們进去也是蹙勁。光鈞平常行动像个老鷄，每到这时候就像生龙活虎一样，輕松活潑地講了一套兒：“志願軍在零下二十度一样作战……咱們，嗨！干吧！”說着自己伸了伸拳头，鼓足混身的鋼筋，迅速机敏地領头鑽了进去。接着有五个人也跟着进去了。还有一次，清理爐牌……，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不过，班上的干劲是在平常情况下掀起来的。如果遇上特殊情况还得經過严重考驗再說。所以，一提起燒低值煤来，大伙又都不同意了。

* * *

小組会上的思想动员失敗了，但是刘光鈞并不灰心。他

想：“按照党的指示：燒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也是为国家节约财富的道理，班上难道领会不了嗎？”于是，第三天他又召集了小组会，把这道理重复地講給大家听。但是大家又提出很多困难，还是不同意。

光鈞下班回家后，睡不着覺，坐在桌子旁边一直想了多半夜。他想既革命就不要怕困难，就要善于冲破困难……，第四天，他又在小组会上进行动员，他說：“革命是靠先烈們克服困難才有今天，万众一条心，黄土也能变成金，何况咱們这低值煤还含几千大卡的热量呢！过去沒有燒过，我們今天就要燒成功，工人阶级什么都能創造。”可是大家仍認為：“高压爐不同于低压爐，試不好就要影响負荷，北京就要停电，那还了得呀！”結果又沒把群众动员起来。

刘光鈞經過几次思想动员失敗后，他想到要打开僵局必須突破一点，做出样子才能帶动一般。那么，哪一点是可以突破的呢？他尽量回忆几次小组会上的情形：梁存喜並沒有多發言，也就是說沒坚决反对光鈞的意見。老梁最近一半年来，会上爱發言了，平常日子人們喊他大炮，是个直筒子脾气，当然有时候說話是着三不着兩的；可是有話总不会悶多久的。这次，他为什么不發言呢？老刘猜得出：老梁一向非常信服老刘，既然老刘提出来的問題，老梁想一定是沒錯兒。可是这个事不能冒冒失失地附合着說，因为过去低压爐試燒过，的确是失敗了，怎么还敢冒失呢！何况全班都反对老刘的意見。但是，老梁又知道老刘从来不說空話，凡是提出来的事他一定得办到。所以老梁也不冒然站起来反对。他光看着別人發言，自己却楞出出地張着嘴笑模活兒的不出声。这

次，直筒筒的老梁倒变成个稳健派了。

老刘在会上看的清楚，但是他不当场征求老梁的意见，他知道如果当场征求，倒会弄的老梁不用脑筋想就跟着那些发言的人们跑了。

下了班，老刘又回过头去这么一琢磨，心里就想到必须先突破老梁这一关。事情可能就好办点了。

这一天，老刘到老梁家来串门了。外表看来像个老鸹的大个子，有时候真是蛮活泼的，老刘还会唱两句京戏，像“打黄袍”呀什么的。他和老梁一家子很熟了。来到他家随随便便，先从生活上聊起，老梁的孩子过来要求刘叔叔唱了两句“打黄袍”之后，他很自然地引导老梁谈起解放前惨痛的遭遇，一直谈到今天的幸福生活。老刘便讲解起毛主席提出增产节约的号召，并且指出发电厂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键问题就在改烧低值煤来降低成本。

“你知道吗，老梁？”老刘兴奋起来了，他滔滔不断地讲下去，“烧低值煤，半年就可以为国家节约好煤十万吨！十万吨呀，同志！这些好煤用到其它重工业上去，对加速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会起多大作用！”

“你知道，煤是煤矿工人从矿井里辛辛苦苦地挖出来的；铁路工人又从老远的地方运来。一切国家财富都是工人、农民的血汗！”

“第二，烧当地可以取得的低值煤，不但节省了发电厂的运费，在国家运输车皮缺少的情況下，半年可以給国家节省三千多辆車皮，使这些車皮可以用到别的方面或者城乡物资交流上去。”

“再一点呢，燒低值煤可以大大降低电的成本，这对国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有很大好处。还有一点，工人給国家創造了財富，自己的生活也可以得到更好的改善……。”

这位党的宣傳員的确成了一位宣傳鼓动家了。梁存喜听着一声不响，忽而揚起手来搔搔腦皮，忽而干咳嗽兩声。从老梁的这些动作上，看出他的思想有些活动了。

“老梁，我看就这么先在咱們15号爐試試吧？”

“那，”老梁終于瞞出一句話来，“出了事故怎么办？”

刘光鈞一听，知道老梁有顧慮，馬上就回答：“出了事故由我来兜着。”接着又講了一些党对事故問題的看法和鼓励职工大胆創造的政策，老梁終于同意帶头試燒了。

* * *

第二天，光鈞和梁存喜在鍋爐外面弄了一堆低值煤試燒了一下。結果有一半能够燃燒。光鈞很高兴，对老梁說：“在爐外都能有这么多燒的着，在爐里再加上通風，不更有門兒了！就請求行政領導批准正式試燒吧！”但是別人还半信半疑，不敢完全相信和支持。

个别行政領導同志，当时也有顧慮，怕燒不成。有的技術人員說：“燒是可以燒，除非把鍋爐拆了重新安裝才行！”

光鈞在这些困难与阻礙面前，表現了坚强的毅力，一次再次地說服行政領導和技術人員，最后行政上提出：“影响負荷怎么办？”

刘光鈞說：“怕影响負荷，在后夜負荷低的时候試。”

这样，才得到行政上批准。在当天后夜，光鈞就組織梁存喜等人正式試燒了。一切都准备好，低值煤运来，装上15号

高压爐，刘、梁和助手們开始进行操作，打电话邀来技术人员、值長。这是个新的尝试，是生产战线上一个大战役的开始，陣綫拉开了，子彈上了槍膛，担任这个战役的直接指战員，士气也旺盛起来；但是軍部“參謀”們（技术人员、值長）来到就潑冷水，就說風涼話，因为他們沒有上过“戰場”，也不去認識这个战役的重要性，还是不厭其煩地說：“低压爐試过不行，你們还要試，非灭火不行！”簡直好像說，“你們非吃敗仗不行！”

群众剛剛动員起来，又来潑了冷水。刘光鈞当即对值長說：“我保証不灭火！”

“帶不上負荷怎么办？”值長又問。这是个严重問題。

“我保証帶6500瓩的負荷！”光鈞回答。

“你真能吹牛啊！”值長譏笑地說着一甩袖子走了。

沒有这样的“參謀”一样能进行战斗。刘光鈞班的第15号爐，开始試驗了。低值煤裝进爐膛，刘光鈞、梁存喜等打开爐門兒，隔着墨鏡，睜大了眼睛往爐里注意瞧着。他們几乎連大气也不敢喘，好像怕把低值煤吓着似的。

他們歪呀歪呀，歪一會兒爐里，又忙着操作，又看看汽温度数。他們心里“扑通扑通”跳起来。首先看到，低值煤火焰短，随后又發現汽温降下来。應該是420度，却降到380度了。这一下，班上的工人們又嚷嚷起来。

“不行，不行！快再換上好煤吧！”

“別試啦，別試啦！”

“还是人家值長說的对。嗨，值長嘛！”

这时，就連梁存喜也嚷起来，好像他有先見之明，多么

有理似的：“人吃白面就有勁，吃糠就不行，这么好个爐，燒这破玩意兒还行呀！”

“好啦，好啦！”刘光鈞对大伙兒說，“今天就到这兒，以后再說。”

* * *

第一次試驗失敗以后，不仅丙班同志反对，鍋爐房三班同志都开始反对試燒低值煤了。在这种情况下，刘光鈞急得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覺，但是当他想到毛主席率領革命队伍在長期革命中所經歷的艰难困苦，想到在朝鮮前綫英勇作战的人民志願軍的时候，便感到自己在和平环境下，对生产中的困难更應該努力克服。他想：“試燒低值煤就是在生产上的革命，如果一試就成，还要共产党員干什么？还算什么先进經驗？苏联現在燒低值煤，也不是从推翻沙皇那天起就燒成功的，也是長时期克服困难的結果。”

他随后又琢磨：过去三盤爐最高帶11,500瓩的負荷，現在为什么能帶24,000瓩的負荷呢？这說明对机器的要求和过去不同了，操作方法改变了，人能支配机器。于是他得出一个結論：“解放后人起了变化，进步了。人进步机器也得跟着进步！人有特性，机器、煤也都有特性，燒的煤改变了，机器的操作方法不改变能行嗎？”想到这里，刘光鈞的思想豁然开朗起来。

他肯定了这个概念，“人变了机器也得变”。过去人做机器的奴隶，現在必須从机器的奴隶地位解放出来，要做机器的主人！于是他便大胆地想，开朗地想下去。首先想到打破陈規，不能縮手縮脚、固守旧習慣，不敢改变操作方法，換

燒低值煤必須改變通風……，他想得十分興奮，腦門和渾身都發起熱來，由於操勞、思慮過度，他病了。

可是，他沒有把病放在心上。第二天，他帶病去找梁存喜，把自己想的道理對梁存喜講了一遍，光鈞的熱情和堅韌不移的意志，又一次鼓起梁的勇氣。光鈞第二次再請求行政上批准試燒。為了完成這一任務，他帶病上了班。上班以後，他琢磨火焰短、汽溫低的問題，認為必須改善通風才能燒好；必須鑽進爐膛去察看火綫。可是爐子壓了火，爐膛溫度還很高，他當時想：一切困難不能阻止我完成黨和國家任務的決心。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不鑽進爐子就找不到改善通風的辦法，也就完不成黨交給自己的任務。于是他繞到爐後，鑽進爐膛里，找出調整風門、加厚煤層的辦法。他爬出爐膛後立刻和大家商量，但是大家仍有顧慮，並沒有支持他的意見。可是，光鈞的堅強毅力又支持他作了一次試驗；結果，火焰高了。汽溫由380度提升到410度。劉光鈞試燒了一個後夜，早止交班後，他怕再出毛病，又接着干到中午十一點鐘才下班。下班後，他馬上和支部書記張利明一同到總支彙報試燒情況。

總支書記鼓勵了他，並且囑咐他們要繼續克服困難，從群眾的實際水平出發，低值煤不可一下摻的太多，要穩步前進。

火焰高了，汽溫升了，低值煤燃燒得很好，但是又發生了新的問題；爐膛里結瘤子、粘爐條、頂爐牙。全班同志只顧打瘤子了。打瘤子可不是個簡單輕鬆的活兒，用來槌瘤子的大鐵撬棍原來八十多斤重，像“三國演義”上關羽使的青龍

偃月刀似的那么重。后来换了轻巧些的也有四、五十斤重。人们耍起来，累得满身是汗，连饭都顾不上吃。

“嗨，这玩艺真够呛啊！”

“嗨，这不是打着灯笼找来的病吗？”

于是，大伙情绪又低落了。

刘光鈞在新困难面前没有低头，也没有着慌。他既然突破了火焰短、汽温低的难关，就不怕什么结瘤子问题。他冷静地研究了结瘤子的原因，发现负荷低的时候才大批结瘤。因此他找到了调整司火机速度的办法。结果，连结瘤子的问题也解决了。也就是说刘光鈞凭着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创造性的劳动，冲破了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试烧低值煤的胜利。

* * *

试烧先是在15号炉试验成功的，接着刘光鈞叫13号炉司炉庄伯森试烧，也成功了。他们丙班就剩下14号炉还没换烧低值煤，这时候，刘登洋沉不住气啦，他向光鈞要求说：“你让我这个炉也掺点低值煤烧行吗？光兴你们光荣啊？”结果高压炉丙班全班三个炉都换烧低值煤了。

试烧成功，是件了不起的大好事，能为国家节省大量财富不说，这种技术改革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人从做机器的奴隶变做机器的主人。”这是生产上一大跃进，一个大胜仗。这个先进经验必须推广，必须迅速地到其他各班推广，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在当时又有了思想阻碍。又出了怪事。方法在他们班上试验就成功，换了别的班就出问题。“老刘，怎么回事？我们按你们记的表单操作，怎么就出毛病呢？”下班班长请教刘光鈞。光鈞核对一下，表单上记的和风门开的大

小是一个样呀。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去問梁存喜，梁說：“誰知道呀？”后来梁的一句話叫光鈞听出了問題来。梁說：“你对表單，也是白搭。”刘一听这話里有文章。就对梁談，党支書張利明也找梁研究。梁还是裝糊塗。光鈞想了个办法，下班后不离开鍋爐房。他看看到底有什么鬼。他記得很清楚开几道風門……，他仔細一查看，下班同志接了班以后，就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他再一看日报表，和原来实际操作的情况也不一致，他肯定这是梁存喜的毛病。他立刻找老梁去。

“你动風門来沒有？”他問老梁。



“沒有啊！”

“怎么和在上班的时候不一样了呢？”

“那誰知道！”

“你不要騙我。你应该把經驗介紹給下一班。不应该在表單上記不真实的情况。乱改風門，使別班的人学不到你的經驗。”

梁还是不說，解釋了很久。梁忽然說道：

“咱班費了那么大勁，叫他們赶上咱們，咱們还光荣嗎？”

“啊！原来你是这

么保守、本位呀！”这话刘光鈞没有说出口，还是和风细雨地进行说服。他用算细账的方法说：“咱们抗美援朝，只是咱们一个班节约好呢，还是三个班都节约好呢？”只有推广了先进经验，在全厂甚至全国的发电厂都烧低值煤，才能给国家节省更多的财富，这才是真正的光荣。经过了刘光鈞的反复解释，梁存喜才打通了思想，其他各班的工人和最初反对烧低值煤的技术人员，也在试烧成功的事实面前受到了教育。这时候，党委便组织向全厂推广的工作，使全厂每一锅炉都逐步地燃烧了低值煤。据初步统计，1952年一年就为国家节省了十万吨以上的好煤，还可以节省三千三百多辆运输车皮，使燃烧成本较国家计划降低百分之四十还多。全厂职工也因此得了二十亿（旧币）的国家奖金，进一步的改善了生活。并且引起了这个厂一系列的生产改革。

刘光鈞后来被选为北京市的劳动模范和人民代表。他的事迹很快地传开了。他在试烧低值煤当中，由于过度紧张，身体不太好了，党送他到北戴河去疗养。有一份石景山发电厂刘光鈞先进思想的总结材料这样写着：

刘光鈞同志所以能试烧低值煤成功，首先是由于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生产建设上的辉煌胜利；但是与刘光鈞同志的斯塔哈诺夫式的劳动态度和坚强的工作毅力是分不开的。刘光鈞同志的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和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是促使他能智勇双全地取得试烧低值煤成功的主要保证。

后 記

《發电厂里五十年》是一本历史故事書。記述北京石景山發电厂自建厂到1952年职工生活和斗爭的故事。也可以算做一部首都發电厂簡略的“工厂史”。

这本书第一节到第二十八节，是从1905（光緒三十一年）年写到1948年。在这些年內，中国人民經過腐敗的清朝、北洋軍閥、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日伪的反动統治。工人們的生活和劳动是十分悲苦和凄慘的，但是，工人們的反抗斗爭是非常坚强勇敢的。这本书里面所記錄下来的，仅仅是星星点点，一鳞半爪的一些片断。

自第二十九节到第四十四节是写1948年12月石景山解放以后，翻身做了主人的职工同志們轟轟烈烈的生产情况和幸福的生活。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有昨天的艰苦奋斗，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回顧过去，就会更加珍重現在，才不至于“身在福中不知福”。这也是編写这本小書的一个原因。

在編写过程中，有發电厂党委会的直接领导和許多职工同志的帮助，本书才能編写出来。因此，这本书应该說是由張雨亭、王文斌、李錫銘、夏宝义、王志恒、刘德珍、刘光金、沈根才、陆增芝、張震、杜广信、李家宝等同志的集体

創作，我来执笔记录的更为恰当些。

有些地方，因为实在找不到更多的资料，写得很干枯、空洞，就像鍋爐房兩次罢工事件，当事人都找不到了，只是听到个别的傳聞記下来的，为了照顧真实起見，沒有作想像的补充和形像的描写。

本書材料来源，絕大部分是职工同志們的口述材料，除上述張雨亭等十二位同志以外，郭玉民、李寿祺、田时君、李常熹、苏允塘、張利民、褚有才、生成明、高世荣、李鳳鳴、李华庭、李宝鏡、杜凱、閻洪亮、楊其淦、閻义順、刘殿祺……同志也曾提供不少材料。只有第三十八节《修复半个天》，第四十三节《一架噴气式》和第四十四节《人变了机器也得变》等三节，是參照夏宝义同志写的《劳模刘德珍》（未發表）。王立行同志写的通訊《把咱們对帝国主义的血海仇恨化成不可摧毀的力量》（發表在1950年12月1日《首都發电厂》小报上）、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編写的《石景山發电厂刘光金先进思想的总结》等三篇文字資料，和一些职工同志的口述材料編写成的。

書里記述的都是真人真事，但是人名略有改动。

本書从1957年2月就开始着手編写，1957年6月写完上部；1958年4月开始編写下部，7月写完。書內记录的史实到1952年試燒低值煤事件为止。最近几年，厂內的变化就更大了，書中的主人公如王文炳、王俊恒、刘德仁……，早都成批的离开了厂子，有的去建設新电厂，有的去上大学，有的还去苏联学习。一批批新工人进了厂，接替了他們的工作，随着首都工农業的發展，厂內进行了兩期扩建工程，發電容

量增加了一倍多，广宁坎村山坡上的土房、破房一批批地拆除了，矗立起很多新楼（住宅区），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也一天天在变化，大礼堂、俱乐部、食堂、医务所、子弟学校、休养所、疗养院……先后建立。特别是自1957年整风、大跃进以来，生产加番还不说，发电厂工人搞起了综合利用煤炭等物的副业生产，搞起了机器制造，这还不算，最近又在厂子附近兴建一个比现在大十倍的高温高压自动化新电站……。厂子里整天热火朝天，真是翻天覆地干劲冲天，一天等于二十年。这里又有多少英雄人物、模范事迹该写啊！但是因为时间和能力所限，只好留待以后组织更大的力量再来续写了。

由于我缺乏历史知识和工人生活体验，一定会有很多重要的遗漏和错误的地方，希望读到它的同志们，多予帮助、指教！

潘芷汀

1958年8月

